

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

主稿 武文军
主审 王家珞

甘肃六十年代大饥荒考证

兰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编

甘新出 002 字总 108 号 (2001) 013 号

定价：16 元

PDG

前 言

—

历史是一面镜子。唐《贞观致要》中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一位西方未来学家也曾讲过这样的话：不总结历史教训，历史的悲剧就会重演。这些至理名言应当为人们所永远记住。今天我国出现了繁荣昌盛的新局面，人民的生活已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过去因工作中的严重失误，而造成的惨痛历史教训。1959年到1961年全国性的大饥荒大饥饿，就给我们提供了沉痛的历史教训。

对于这一时期的历史教训，我们党也曾多次作过正确的总结和分析。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写道：

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够，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 and 试点，因此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

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从一九五八年底至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左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些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了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①

中国共产党是最重视历史经验的，不仅善于总结和发扬成功的历史教训。对于造成三年大饥荒和人口大量死亡的惨痛教训，我们党已经分析了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纠正了产生这些错误的“左”的方针政策。然而经验教训并不是每个共产党员和所有干部都已经认识并避免重犯的。因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继续总结历史的教训是完全必要的。

六十年代的大饥荒，全民处于饥寒交迫的状态，有千万余人死于饥饿，这种惨景的出现，既有天灾的原因，又有人祸的原因。毛泽东曾定论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所谓“人祸”就是危害甚烈的左倾思潮和左倾路线。一九五六年以前，我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在这种情况下，从中央到地方出现了左倾冒进情绪，以为党和人民掌握了政权，就可以无所不能，甚至误认为我国已经进入了“自由王国”。不仅如此，还自封为绝对正确，不允许有对党的政策的批评意见。一九五七年发起的“反右派”斗争，使五十五万知识分子和干部遭受了不

^① 引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白之冤。自此以后，把对党和政府的任何批评意见都视为反动言论而予以以严惩，并且把这种禁止思维的现象还称为社会主义在思想政治路线上的伟大胜利。一九五七年底到一九五八年上半年，毛泽东主席反复批判一九五六年周恩来等同志反冒进的主张，反复强调：“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①

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编制大计划，高指标的风潮，随之出现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这一年的“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我国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都带来了严重破坏，工农业生产和整个经济建设蒙受了巨大损失。当时在粮食大增产和放开肚皮吃饭的背后，农田被荒芜或闲置，庄稼烂在地里，大刮“共产风”，粮食大浪费的现象十分严重，其他消费品的生产也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中，不断萎缩，这给中国的经济危机埋下了祸根。一九五九年，经济崩溃的局面业已出现，毛泽东主席和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开始纠正左的错误。但在庐山会议上，由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引发了毛泽东主席由纠左到又一次反“右”的转变，把彭德怀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全国百万计的党员和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三面红旗”更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当时不顾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失败，又把一九五九年当成是特大“跃进年”，主观主义、形式主义、说大话、假语之风继续恶性膨胀，阶级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成千上万的干部和人民被当作阶级敌人或“五类分子”予以打击或专政。大饥荒、大饥饿就是在这种左倾思潮的推动下发生的。

一九五八年，一些地区就出现了饥荒，一九五九年开始，中国几乎进入了全民饥饿状态，一些左倾路线肆虐的省份，饥饿和

^① 引自谢春涛著《大跃进狂澜》一书，3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

死亡尤为突出。一九六〇年安徽人口的死亡率高达 68.60‰，人口净减 384 万；河南人口的死亡率高达 39.56‰，人口净减 161 万；云南人口死亡率高达 26.26‰，人口净减 17 万；青海人口死亡率高达 40.73‰，人口净减 11 万；山东人口死亡率高达 23.6‰，人口净减 185 万；贵州人口死亡率高达 45.38‰，人口净减 101 万；湖南人口死亡率高达 29.42‰，人口减少 122.58 万；天府之国的四川人口死亡率竟高达 53.97‰，人口净减 277 万。^①

如此大规模的人口净减量在人类历史上都是惊人的，这一系列血淋淋的惨痛事实说明，左倾路线的危害是十分巨大的，这完全印证了邓小平同志对左倾错误的结论。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时明确指出：“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象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六十年代前后的“左”倾思潮和“左”倾路线，在甘肃总要火上加油、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甘肃省坚持“左”倾路线，使 12447 名知识分子和干部被错划为右派，还有数以十万计的干部和职工以及一些农民被划为“蜕化变质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进行了残酷斗争和迫害。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伊始，甘肃就高举“三面红旗”，想样样走在全国的前列，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在各个领域都制造大计划、高指标、高速度的气氛。一九五八年召开的省二届二次党代会修改了二五计划指标，把农业总产值年增长定为 23.51%，粮食总产量年增长定为 37.6%，棉花产量年增长定为 400%，地方工业产值年均增长定为 315%，这些增长速度是“一

^① 资料来源：《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49—880 页，各省、市、自治区人口变动统计，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 年出版。

五”期间增长的3—4倍，甚至10倍，并且要确定上共产主义工程——引洮工程。一九五八年八月以来，在不到四十天的时间里，全省实现了公社化和公共食堂化，供给制代替了按劳分配，“共产风”吹散了集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整个甘肃城乡掀起了吹牛皮、“放卫星”的热潮，其中有2910斤的小麦亩产卫星，一条70斤重的豌豆，一棵重4.5斤的辣椒，亩产16万斤的洋芋，全省在两个月内建起200000个厂矿企业，全省出现了10个万厂县。在大炼钢铁的运动中，提出30万吨铁，10万吨钢的指标，并且叫嚷“一斤也不能少，一天也不能迟”，抽调全省300万个劳动力到各个炼钢点劳动，大面积大秋作物烂在地里无人收，结果只炼出了1.4万吨不能用的废铁。

由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造成的破坏。一九五九年出现了民穷财尽的局面，饥饿浮肿和死人现象随处可见，大部分地区的农民一天吃不到半斤粮，有6万多人外流，数以万计的人饿死。当时甘肃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张仲良仍向中央隐瞒实情，谎称甘肃的形势大好，把反映缺粮和饥饿的人说成是“阶级敌人”，同时在甘肃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把数以万计的各级干部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城乡群众中也掀起了阶级斗争的高潮。一九六〇年甘肃可以说饿殍遍野、民不聊生，但省委仍在高唱经济繁荣、形势大好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高调，甚至还在继续倡导更大的跃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一九六〇年的年底。回甘肃探亲的干部看到了甘肃发生的饿死人的惨景，向中央写了反映信，才揭开了甘肃一些人欺上瞒下、草菅人命的铁盖子。

甘肃六十年代大饥荒的主要经验教训是：一是混淆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线。在非常薄弱的经济条件下，企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当时一些领导同志认为：中国一穷二白，甘肃更穷更白，所以要采取高速度、高指标和“跑步前进”的方式，才能摆脱贫困。但事实是欲速则不达；在向共产主义的目标跑步前

进时，违背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规律。二是在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上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当时甘肃的一些领导人，在认识上颠倒主客观关系，认为甘肃的落后，不在于物质基础的落后，而在于思想的落后，要革自然的命，先革思想的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在这种唯心主义的思想主导下，出现了一系列“左”倾蛮干的行为。三是把阶级斗争看成推动甘肃发展的唯一手段。一些人混淆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把不同意“左”倾路线的人都看成阶级敌人，把各种困难和问题都归结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于是无休止地开展阶级斗争，结果斗跨了经济、斗散了人心，斗出了民穷财尽的恶果。

今天，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全国的“左”倾路线得到了彻底纠正。甘肃的“左”倾路线和思潮地同样得到了纠正。全国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局面。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2000 年达到了 89404 亿元，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七位，我国的钢、煤、数字程控交换机、水泥、化肥等重要产品，已跃居世界第一位，原油产量已达世界第四位。在农产品中，谷类、肉类、棉花、花生、油菜籽、水果等均居世界第一位。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超过 1600 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这些重大的发展成就，都是在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指引下实现的，也是我们党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结果。然而在胜利和成绩面前，切不可忽视历史教训。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推行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的大有人在，虚报浮夸、欺上瞒下的不良作风也经常出现，作官当老爷，欺压群众，鱼肉百姓的腐败行为也经常发生，这一切都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六十年代的惨痛教训。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的讲话》中告诫我们：“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全党同志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

意识，不骄不躁，继续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到本世纪中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发工作。”我们要以江泽民同志这一重要论断为指针，要认真全面地总结我们的历史经验，为我国未来的发展不断提供科学的经验依据。

三

《甘肃六十年代大饥荒考证》是一组研究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甘肃经济社会状况的系列研究报告。研究的目的在于客观的、正确的、实事求是的总结这一历史时期的经验和教训。本着为历史负责为人民负责的态度，分清发生在甘肃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的是非界限，较全面地阐述形成“左”倾路线的历史根源和国际国内背景，从思想认识路线上总结出主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通过总结，告诫人们切勿重蹈错误路线的覆辙，使我们永远遵循客观发展规律，坚持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沿着三中全会以来党所开创的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奋勇前进。

《甘肃六十年代大饥荒考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属考证报告文稿，有五篇考证研究的文章。第一篇《陇上大饥荒及其历史教训》全面分析了甘肃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左倾路线的表现形式，重点考证和分析了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困难时期，甘肃人民群众的悲惨状况和人口死亡及增减状况，着重分析研究了造成甘肃六十年代大灾难的主要原因。最后从六个方面总结了应当吸取的历史教训，这就是：勿画空想社会主义蓝图；唯心主义哲学应当收敛；生产关系万能论必须休矣；防止阶级斗争斗跨经济；要分清经济规律和战争规律的差异；防止政治路线背离认识路线的陷阱；要有一个健康的吏制系统。

第二篇《吹牛吹出了灾难》，这篇研究报告揭露了一九五八年以来，甘肃搞虚报浮夸和“吹牛皮”、放“卫星”的主要表现，分析了这种浮夸作风带来的严重后果。这篇文章首先分析了浮夸

吹牛的理论观点，其中有：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左”比右好，“一天等于二十年”，紧张是革命的常规，等等。接着本文归纳了甘肃浮夸吹牛的几种表现，概括了如下几种类型：“思想要上天；人能成神仙；产量无限翻；赤手可移山；一天等于二十年；世界我为先”。在分析了吹牛的类型之后，就揭露和分析了吹牛造成的严重后果。这就是：“吹牛”吹得农业大崩溃；“吹牛”吹得产业结构大失调；“吹牛”吹得人力资源大耗损。文章最后联系了当前一些地方仍在搞虚报浮夸的行径，提出了不要忘记一九五八年以来吹牛浮夸的历史教训。

第三篇《引洮工程的反思》。这篇专门研究了甘肃一九五八年引洮工程引发的灾难和教训。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全国绝大多数省份都争相推出了体现大跃进的巨大水利建设工程。甘肃的引洮工程就是这类“跃进工程”之一。甘肃是一个干旱缺水的省份，甘肃人民渴望水利建设出现奇迹，这是应当理解的。但一九五八年在甘肃物质和技术条件完全不具备的情况下，却上马了引洮工程，工程总干渠 1400 公里，支干渠 14 条，全长 2500 公里，共计渠道长 4000 公里，等于兰州到北京铁路长度的两倍。当时甘肃省的领导人把它比喻为“山上运河”、“人间银河”。结果每月动员农民十万余众，凭镢头、铁铤和两只手，来完成这样浩大的工程，苦干了三年，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终以失败而告终。令人痛心的是在引洮工程上给数十万计的民工造成了严重的饥饿和痛苦，也死了不少人。今天我们大搞水利建设，也上马一些巨大的工程，但不能照搬引洮工程的模式，而应立足于当前的经济和技术条件，创造性地开展工程建设，特别是要避免引洮工程失败的教训。这篇文章对引洮工程的教训指出了三点：一是反科学的行径必然碰壁；二是运动群众必然遭殃；三是否定自然规律的存在必然失败。

第四篇《陇上公共食堂的兴衰》主要分析了一九五八年至一

九六一年甘肃公共食堂的各类问题。对农村食堂如何一哄而起，并遍及全省的缘由作了考证；对甘肃公共食堂的特点作了分析，这就是：低标准、瓜菜代；大机构、大舞弊；大浮夸、大压制。文章特别分析了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的严重历史缺陷，指出这种大锅饭式的共产主义生活方式是同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背道而驰的，是同当时农村极低的生产力水平和农民极低的收入完全相冲突的。对于食堂消亡的必然性作了分析，对人民群众解散食堂的行为给予了肯定。

第五篇《小秋收·增量法与代食品》，这篇文章集中分析了在三年困难时期，一些人欺上瞒下把人民群众引向非人境况的做法。在粮食奇缺的地方，在饥饿和死亡威胁广大人民群众生命的情况下，一些人竟倡导群众上山收集野菜、草根来充当食品，这就是所谓的小秋收。还有一些人提出了“增量法”，就是在面粉里面多加水，使做成的成品馍和饭菜重量增加起来，甚至吹牛说，一斤面粉可以做四十斤成品饭。这种自欺欺人的把戏，曾欺骗了不少的群众和干部。另外一种点子就是所谓的“代食品”。代食品五花八门，观音土、树皮、水里的藻类，地上的草根，还有场上的包谷杆、麦皮都可作为代食品。以上说的小秋收、增量法与代食品，都曾哄骗过当时的饥民，许多人吃了这类东西，不是全身浮肿，就是肠胃堵塞而死。从对农民群众的欺骗行为中，进一步揭露了左倾路线的虚伪和凶狠，告诫人们必须实事求是。

为了便于人们研究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之间的经验教训，这本小册子除了发表五篇研究报告外，还对反映当时历史状况的重要文献资料予以收集，这些文献是分析路线和政策问题的证据，其中有：甘肃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的指示；张仲良同志1957年在农村的蹲点报告；汪锋同志关于食堂问题向毛主席的报告；甘肃省委关于粮食工作给中央和毛主席的报告；甘肃省委关于徽县工作的报告；通渭县关于历史经验的总结；张仲良同志

在西北局书记处会议上的检讨；中央西北局关于甘肃工作问题向中央的报告。这些重要文献从正反两个方面可以为我们研究这段历史提供参考依据。

2001年5月本书作者



誓把英国远远地抛在后面

蘭市白銀市职工紀念“七一”向党献礼

1958年7月2日《甘肅日報》載。

小麦亩产3283斤

榆中来紫堡社試驗田高額丰产



本報訊 榆中县紫堡社主任、共产党员

周永堂，中共紫堡社第八、九、十队支部書記周世旺，率领试验社社员周永祥（共产党员）和周永三、周永高、周永丰等六人，经过精心栽培，于四月十四日中收，平均亩产三千二百八十三斤二两七钱多。富裕中农朱朝昌称颂周永堂等1957年丰产试验田的成绩，并说小麦再增产也只能增产百斤。在12日下午举行的庆祝会上他动情地说：“党的事实摆在面前了，我过去右倾保守思想太重，看不到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能创造奇迹，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教育，今后愿党检查评比时能够检查过这块试验田的妻子，并给她们俩面红旗”。其中一面写的是“先”主义的風格真正的革命派”。

1957年周永堂、周世旺、周永祥等同志曾組織，领导了小麦高额丰产试验小组，并获得了亩产三千三百八十八斤的成绩。但一些怀疑党和右倾保守思想严重的人竟说他们的成绩是假的。为了树立高额丰产的典型，为了彻底击败这些怀疑党和打垮右倾保守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周永堂、周世旺、周永祥三人今年种了一亩零四厘小麦高额丰产试验田。现在这块试验田的麦子收打巴芒，11日夜熟，紫堡社七十六名男女社员用了七个半小时，一株一株的数了小麦粒数，共是一百三十八万二千二百七十六粒。12日进行打场，打下的麦皮地铺满，九千余粒成谷一斤。曾打麦小麦量很多也只是二三百斤。怀念周永堂等1957年成就的朱朝昌亲身参加了打场和丈量土地。另一个社员周永祥说：“我参加了这次试验田的小麦在一天里，白天他参加收，打‘监督’着，夜间他守在旁边，防止人弄假”。

这块小麦高额丰产试验田，原来地底很薄，是今年麦子刚种时他又做淤垫打过，正棉花时又遭到过一次恶风暴雨。

1952年榆中县紫堡社社员周永堂、周世旺、周永祥等同志曾组织，领导了小麦高额丰产试验小组，并获得了亩产三千三百八十八斤的成绩。但一些怀疑党和右倾保守思想严重的人竟说他们的成绩是假的。为了树立高额丰产的典型，为了彻底击败这些怀疑党和打垮右倾保守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周永堂、周世旺、周永祥三人今年种了一亩零四厘小麦高额丰产试验田。现在这块试验田的麦子收打巴芒，11日夜熟，紫堡社七十六名男女社员用了七个半小时，一株一株的数了小麦粒数，共是一百三十八万二千二百七十六粒。12日进行打场，打下的麦皮地铺满，九千余粒成谷一斤。曾打麦小麦量很多也只是二三百斤。怀念周永堂等1957年成就的朱朝昌亲身参加了打场和丈量土地。另一个社员周永祥说：“我参加了这次试验田的小麦在一天里，白天他参加收，打‘监督’着，夜间他守在旁边，防止人弄假”。

周永堂、周世旺、周永祥等同志曾组织，领导了小麦高额丰产试验小组，并获得了亩产三千三百八十八斤的成绩。但一些怀疑党和右倾保守思想严重的人竟说他们的成绩是假的。为了树立高额丰产的典型，为了彻底击败这些怀疑党和打垮右倾保守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周永堂、周世旺、周永祥三人今年种了一亩零四厘小麦高额丰产试验田。现在这块试验田的麦子收打巴芒，11日夜熟，紫堡社七十六名男女社员用了七个半小时，一株一株的数了小麦粒数，共是一百三十八万二千二百七十六粒。12日进行打场，打下的麦皮地铺满，九千余粒成谷一斤。曾打麦小麦量很多也只是二三百斤。怀念周永堂等1957年成就的朱朝昌亲身参加了打场和丈量土地。另一个社员周永祥说：“我参加了这次试验田的小麦在一天里，白天他参加收，打‘监督’着，夜间他守在旁边，防止人弄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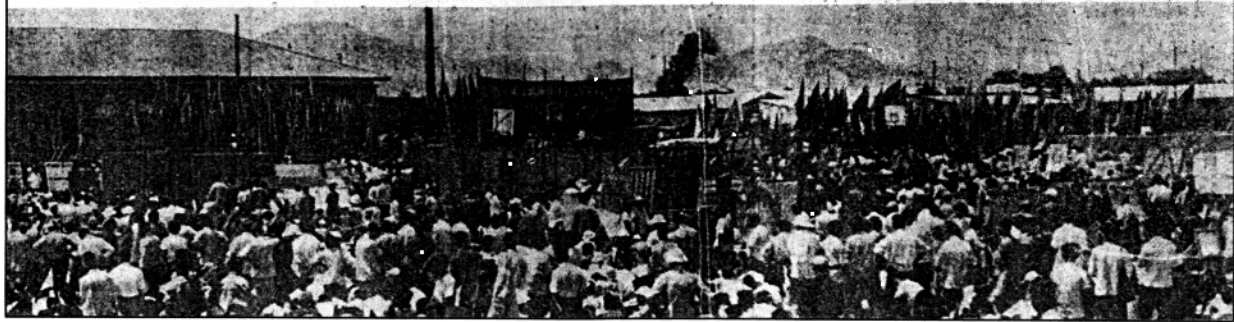
周永堂、周世旺、周永祥等同志曾组织，领导了小麦高额丰产试验小组，并获得了亩产三千三百八十八斤的成绩。但一些怀疑党和右倾保守思想严重的人竟说他们的成绩是假的。为了树立高额丰产的典型，为了彻底击败这些怀疑党和打垮右倾保守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周永堂、周世旺、周永祥三人今年种了一亩零四厘小麦高额丰产试验田。现在这块试验田的麦子收打巴芒，11日夜熟，紫堡社七十六名男女社员用了七个半小时，一株一株的数了小麦粒数，共是一百三十八万二千二百七十六粒。12日进行打场，打下的麦皮地铺满，九千余粒成谷一斤。曾打麦小麦量很多也只是二三百斤。怀念周永堂等1957年成就的朱朝昌亲身参加了打场和丈量土地。另一个社员周永祥说：“我参加了这次试验田的小麦在一天里，白天他参加收，打‘监督’着，夜间他守在旁边，防止人弄假”。



在党的领导下
3283斤
亩
周永堂

1958年7月《甘肃日报》制造小麦亩产3283斤的谎言。

省級宣教系統舉行興無滅資及躍進游行大會
萬人齊躍進 一心奔紅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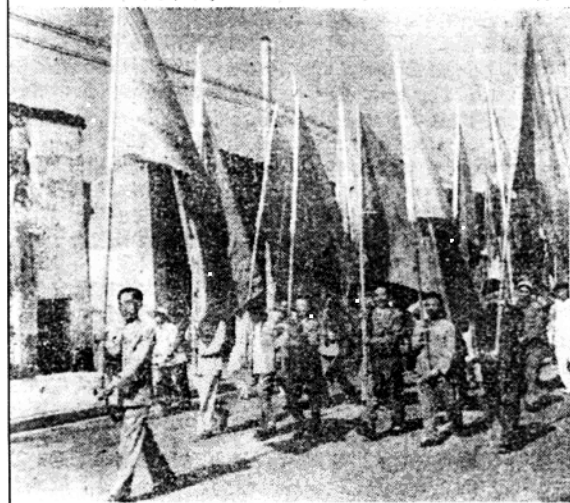


1958年7月15日《甘肅日報》：省級宣教系統大躍進誓師大會。



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在大会上講話。

迪民攝。



省級宣教系統的負責同志高舉紅旗走在游行隊伍的最前列。

黃對岱攝。

省委书记张仲良在大跃进誓师大会上讲话。载《甘肃日报》1958年7月15日。

湖北長春社放出一个高产大“卫星”

中稻亩产43869斤

新华社武汉29日电 湖北省应城县白湖乡长春社在一点〇一亩中稻田里制造了惊人纪录。这比安徽省繁昌县东方红三社中稻亩产四三〇七五斤九两高出四七九三斤十一两。

长春社的这块田是由第十二生产队队长杨采轩和青年突击队队长杨三海及社员杨林森等七人共同培育的。收割时，应城县委和人民委员会共同组织收组进行了验收。验收组成员包括应城县委办公室主任李加荣、县农林局科长万洪涛、应城县区委書記樊端阳、白湖乡党委书记孙世雄、农林局技术干部蔡实洪和邻近乡代表三十多人。他们亲自参加了割、捆、打、秤等工作，并丈量了

田的面积，结果证实这块田共产干谷四三〇八斤，平均亩产四三八六九斤。

这块高产田的种子全是去年挑选的胜利利，播种量二五〇斤，深翻这一二尺，结合耕田分四次施用了充足的底肥，分蘖后又根据禾苗需要追了两次肥，分蘖程度很高，据推算全田有取二八〇〇〇多穗，此外杨采轩等还采取措施使禾苗透光通风和防止倒伏，并经常打药除虫，使这块田始终没有发生病虫害和倒伏，成熟时每墩最多的有二十四穗，最少的也有七穗，穗长一般在二二公分到二十五公分之间，每穗平均有一七〇多粒。

四个老农兴奋而又惭愧地叙述了他们在这块田高产前后思想的转变情况。

“开始看到他们搞这块试验田耕得很深，肥料下得太多，秧栽得密，我对他们说：这块田要能丰收就砍我的头。谷子出齐时，我们思想才转变了，但还不相信能收几万斤。到收割那天，我们四个老农保守派就自己商量分工：杨炳清负责打捆谷，杨炳元负责挑谷，杨炳得负责打谷，我就负责看磅，谁知硬是打了四万多斤。”

正在应城县工作的中共湖北省委农业检查团孝感分团在验收后，代表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奖励这个一面红旗，鼓励他们乘胜前进，争取晚稻更大丰收。



引洛工程局渭河工区三大队三中队民工用“天翻地复土崩斗量”运土，在四十米的运程中，每人每天平均工效达二十五方。胡自观摄。

1958年宣传引洛工程的图片。



土地潜力无穷无尽 亩产多少事在人为



1958年8月《甘肃日报》刊载“土地潜力无穷无尽”的消息，并把许多田地里的麦捆收集在一起作为亩产的硕果。

1959年歌颂继续大跃进的美术画。

栽下的松柏萬古青
栽下的梅花雪裏紅
今歲年二
都跃进六億人民景無窮
七十六歲陳佩雲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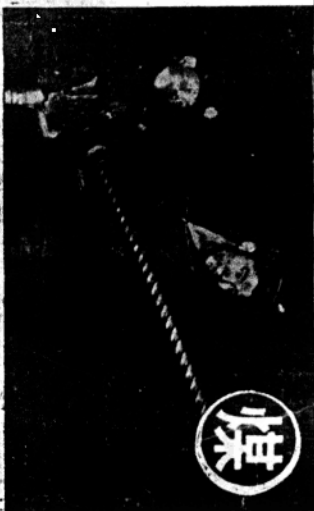
献岁图

陈佩云作



钢

1959年钢(不包括土钢)达到一千三百三十五万吨,比1958年增长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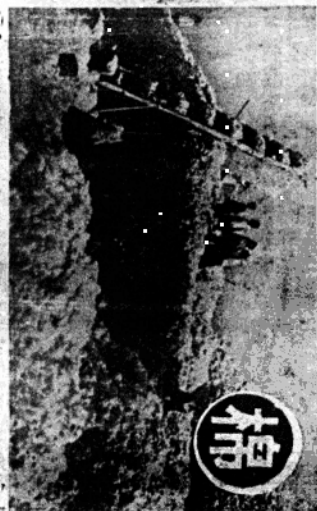
煤

1959年原煤达到三亿四千七百万吨,比1958年增长29%



粮

1959年粮食达到五千四百零一亿斤,比1958年增长8%



棉

1959年棉花达到四千八百二十万担,比1958年增长14.76%

1959年全国对四大帅,即钢、煤、粮、棉提出了超高的跃进指标。



永登水彩厂大抓职工生活，领导干部分别包干办好食堂。图为党委书记（左第二人）在食堂给职工带饭。

1960年7月18日《甘肃日报》宣传如何办好公共食堂的照片。



新開闢的靜寧永樂水庫全景。

(中共靜寧县委宣傳組攝)

1960年在饥荒最严重的静宁县组织饥民搞水利的镜头。



新蓋面粉厂工人大干巧干，出粉率比原設計提高一倍。
 这是工人们正在取用出粉的情况。 胡鳳攝

1960年全省出现大饥饿状态，这里用面粉厂的面袋来宣传丰衣足食。



西北民族学院党委为了办好食堂，安排好师生冬季生活，党委田田、委员深入食堂、宿舍，加强生活管理。图为党委副书记王慧玉和炊事员一起做烤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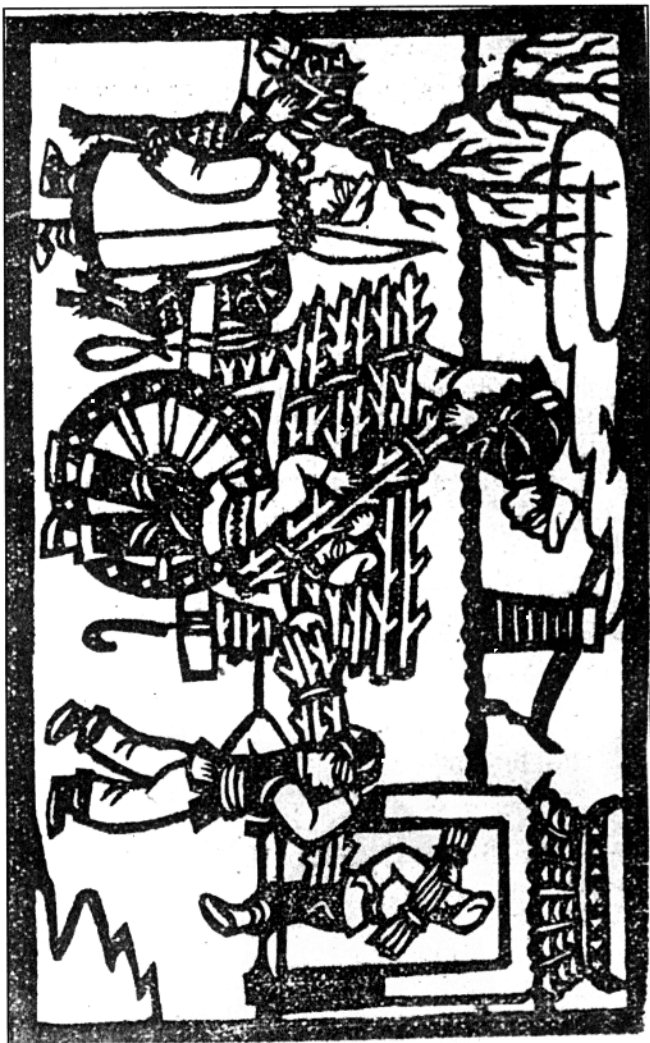
王佑民 摄

1960年宣传党委书记进食堂的资料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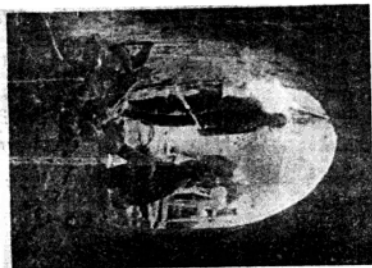
給食堂備足燃料

(剪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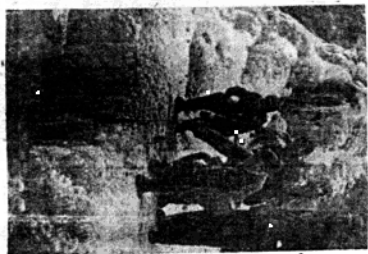
曹昌光作



宣传全民办食堂的剪纸画。



▲ 群众在井边取水，群众在井边取水，群众在井边取水。



▲ 群众在田间劳动，群众在田间劳动，群众在田间劳动。



▲ 群众在田间劳动，群众在田间劳动，群众在田间劳动。



▲ 群众在田间劳动，群众在田间劳动，群众在田间劳动。

1960 年各地饥荒极为严重，但仍然组织农民日夜苦干。以上画面是农民修水利的片断。



1960年11月用改革食堂炊具形式宣传食堂的好处。



1960年12月4日《甘肃日报》发表把制作淹菜作为主要方式来推广。

目 录

第一部分

考证文稿

- 一、陇上大饥荒及其教训····· (1)
- 二、吹牛吹出了灾难····· (40)
- 三、陇上公共食堂的兴衰····· (53)
- 四、小秋收·增量法与代食品····· (66)
- 五、引洮工程的反思····· (70)

第二部分

考据文献

- 一、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加强党对人民公社的领导的指示····· (77)
- 二、《甘肃日报》社论：欢呼全省实现人民公社化····· (79)
- 三、省委关于徽县工作问题的报告····· (84)
- 四、省委关于粮食问题向中央的报告····· (88)
- 五、省委关于粮食工作给主席和中央的报告····· (91)
- 六、中共甘肃省委批转《张掖地委关于检查纠正“平调”现象、浮夸现象和强迫命令作风的情况报告》····· (94)
- 七、中共张掖地委关于检查纠正“平调”现象、浮夸现象和强迫命令作风的情况报告····· (95)
- 八、张仲良同志在西北局书记处会议上的检讨（节录）····· (102)
- 九、中共甘肃省委关于省委领导工作中严重错误初步检查的报告····· (105)
- 十、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讨论甘肃问题向中央的报告（节录）····· (112)

- 十一、中共甘肃省委转发《汪锋同志关于农村食堂等问题
向主席的报告》…………… (118)
- 十二、江锋同志关于农村食堂问题向主席的报告…………… (119)
- 十三、通渭县委关于通渭的历史教训…………… (126)
- 十四、张仲良同志关于平凉市洪岳、下甲积峪两个
农业社进行大鸣大放辩论试点的情况报告…………… (139)

陇上大饥荒及其教训

甘肃二十世纪 60 年代大饥荒考证

1959 年到 1961 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经历了空前残酷的大饥饿与大死亡。甘肃是大饥饿的重灾区，陇上大地出现了惨绝人寰的悲剧：粮尽物绝，饿殍遍野，尸骨枕籍，人相吞食。而此时政策极左，人人处于“阶级斗争”的恐怖漩涡中。时已过四十年，但总结这段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昭示后人循历史正道，谋人民利益，意义匪浅。

一、死亡记录

甘肃严重饿死人的现象不是从 1959 年开始而是从 1958 年就出现了，1960 年则为死亡最高峰，1961 年继续饥饿煎熬，成千上万人饿死，直至 1962 年死亡率才降下来。

从 1958 年至 1961 年陇上大地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各类统计资料和历史文献的说法是不一致的。例如国家统计局的人口资料将甘肃 1958 年的总人口定为 1282 万，而甘肃省统计局与公安局的资料将这一年的总人口定量为 1308 万，比国家统计局的多 26 万；对 1960 年的总人口，国家统计局定为 1244 万，甘肃的统计资料定为 1254 万，又多出 10 余万。如果把甘肃各县志的人口统计综合起来，又同甘肃省统计局、公安局的总计不相一致。但这些差异是可以理解的，有些是以年平均人口作为总人口计，有些是以年末人口作为总人口计，还有些是因为统计方法和角度的不同，会出现一定的差别。这种差别不是十分大的，利用各类统计数字都不会太影响我们对大饥饿时期历史面貌的认识。例如国家

统计局对甘肃 1960 年的人口死亡率标记为 41.32‰，而甘肃统计局标记为 41.6‰，对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国家统计局的资料为 -25.79‰，而甘肃省统计局的资料为 -26.02‰，差别虽有，但很微小，不影响我们混合使用两类资料。

现在让我们看看总人口和总户数的减少情况：

1957 年甘肃省总户数为 2618180 户，总人口为 14531086 人，而到 1958 年总户数为 2327808 户，总人口为 13081007 人，与上年比，总户数减少了 290372 户，总人口减少了 1450073 人，总户数减少了 11.09%，总人口减少了 9.98%。1958 年户数的减少，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一部分户数划到了宁夏，另有一个因素是搞“共产风”，几户人并在一起居住，可能将原来的两户或三户变成一户统计了，但相当一部分户数的减少，则是由于死亡率增大构成的。1957 年甘肃人口的死亡率为 11.16‰，1958 年竟上升为 21.42‰，死亡率增长为 10.26‰。可见，在减少的 29 万多户中，有些是属绝户，而减少的 140 余万的人口中，至少有 11% 是由死亡造成的，因为 1958 年机械变动造成人口减少的因素是很小的，当年迁入还大于迁出的人口。可见，在死亡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饥饿而死亡的，因为当年从徽县等地上报省委的材料中，就有人口大量死亡的告急，主要是饥饿死亡的。当然不能忽视 1958 年死亡人口中的另外一些因素，比如说对右派、“白旗人物”的迫害造成死亡增加，大炼钢铁和各种繁重体力劳动折磨造成死亡增加，等等。

1959 年总户数为 2362648 户，总人口为 13281225 人，当年的户数比 1958 年增加了 34840 户，人口比 1958 年增加了 200218 人，1959 年人口户数的增加，不是人口增长的直接表现，而主要是 1958 年多户合一的“共产户”分离出来另立了门户，所以才多出了 3 万多户，而人口的轻微增加，主要是因为出生率较高造成的，当年的出生率是 19.47‰，而当年的死亡率则高达

17.46‰。可见，人口的减少主要是死亡因素形成的，而死亡的基本因素是饥饿。

1960年甘肃省人口总户数是2432823户，总人口数12549961人，总户数增加37万多户而总人口则减少了731264人，当年户数增加幅度为2.97%，人口总量减少幅度为5.57%。户数增加这一现象完全不能说是因人口的增加所致，而是一些大户分离，或小户分家的结果，而人口减少了73万多，则多为饥饿而死。

1961年甘肃人口总户数为2488060户，总人口为12108174人，人口总户数增加了55237户，增加幅度为2.3%，总人口减少了441787人，减少幅度为3.5%，1961年总人口的减少仍然为饥饿死亡所致。

从1958年到1961年，其中有三年期间总人口呈减少状态，除了1958年总人口减少的因素之一是把原甘肃的一部分地区划归宁夏回族自治区外，其余的人口减少和1959年的微增长，都包含着大饥饿造成的死亡因素，在总人口减少中，隐含着巨大的悲剧。

我们再看看从1958年到1961年甘肃人口死亡的状况：

1958年甘肃人口的死亡总数为272425人，死亡率为21.42‰，自然增长人数为133576人，自然增长率为10.50‰，1958年的死亡率比1957年11.16‰的死亡率，高出10.26‰，死亡率增长了近一倍，这是很惊人的。从1957年到1966年的十年间，甘肃省人口按照当时的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状况、生育状况和生育政策，死亡率在11‰，可以认为是正常的，而高达21.42‰的死亡率则是非正常的。1958年比1957年的死亡率增长了10.26‰，这个指数是非正常死亡，那就是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饥饿造成的死亡，大于一般年份10.26‰的死亡率，就是因饥饿或其它非正常因素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应为134211人。

1959年全省死亡人数为230375人，死亡率为17.48‰，自然

增长率却降低为 1.99‰，自然增长人数为 26271 人。那么，自然增长的人数和增长率为何如此之低呢？主要原因是由 1958 年的 31.93‰ 出生率锐降为当年的 19.47‰，死亡率几乎接近出生率，为 17.48‰。按照我们依照正常年份的平均值确定的 11‰ 的正常死亡率的指数来推算，其中 6.48‰ 的死亡率为非正常因素的死亡，也就是说在 230375 人中，至少有 86000 人为非正常死亡，我们可认定这些人的死亡是饥饿造成的。

1960 年是甘肃大饥荒的高峰年，当年死亡人数是 538479 人，死亡率为 41.69‰，自然增长率为 -26.02‰，自然减员人数为 336097 人，如此高的死亡率和如此可怕的自然减员数说明人们的生活境况已经到了十分悲惨的极限，我们仍按 11‰ 的正常死亡率衡量，非正常死亡率则为 30.69‰，可以推算，至少有 385158 人为饥饿而死的。

1961 年全省人口死亡数为 141528 人，死亡率为 11.48‰，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3.28‰，人口自然增员为 40492 人，当年全省总人口减少 441787 人。可以认为当年 11.48‰ 的死亡率是在正常指数内，而人口减少人数则为 44 万多。当年外省迁人甘肃的人口为 71784 人，而甘肃省迁移外省的人口为 248860 人，这 24 万多流入外省的人数大多因为饥饿而出走的，有不少人死在途中，难以列入死亡统计中，而在省内流来流去的人口达 259984 人，这些人口在省内的流浪和乞讨中也有严重的死亡情况，而这些死亡人数在当年的人口统计中被计入了迁移人口，而没有计入死亡统计，可见，1961 年甘肃省仍处在严重饥饿中，抢救人命的政策仍难以解决大面积饥饿的问题，因此，保守的计算约有 20 多万人死于饥饿之中。

总体上看，从 1958 年至 1961 年直接因饥饿造成的死亡人数约为 605451 人，当然这个数字是一个最低限度的估算数，而从 1958 年到 1961 年总死亡人数为 1182807 人，这些亡灵中的 90%

以上是和饥饿的命运在一起的。所以，曾有一些渠道估算，在困难时期，甘肃省饿死百万人的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

1960年前后的惨剧是遍演于陇原大地的，全省处处断炊烟，县县在饥饿，社社村村饿得鬼哭狼嚎，饥饿死亡全面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

我们再看看各地的死亡记录：

从1958年开始，甘肃许多地区就出现了很高的死亡率。当时的张掖市死亡率高达27.31‰，死亡人数达9848人。酒泉市死亡率高达32.43‰，死亡人数9072人。整个张掖专区死亡率高达18.25‰，死亡人数39515人，这个专区的高台县死亡率高达31.43‰，死亡人数5222人；山丹县死亡率高达40.79‰，死亡人数7096人。武威县死亡率高达26.53‰，死亡人数15254人。天水专区总体死亡率为33.73‰，死亡人数114331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76‰，人口自然减员12748人，其中徽成县死亡率高达67.24‰，死亡人数达23392人，自然增长呈-40.37‰，自然减员14046人。天水市人口死亡率达28.31‰，死亡人数8459人。武都县死亡率高达40.06‰，死亡人数15774人，自然增长率为-3.01‰，自然减员1186人。西礼县死亡率高达57.69‰，死亡人数29048人，自然增长呈-20.29‰，自然减员人数10216人。清水县死亡率高达53.54‰，死亡人数13566人，自然增长率为-9.22‰，自然减员2336人。平凉专区整体死亡率为22.46‰，死亡人数49317人，其中平凉市死亡率高达51.79‰，死亡人数8700人；镇原县死亡率达31.20‰，死亡人数8369人；泾川县死亡率高达50.52‰，死亡人数为14052人，人口呈-6.00‰的负增长，自然减员1670人，临夏回族自治州1958年整体死亡率虽不高，为15.62‰，但有些县却呈现出很高的死亡率，如东乡族自治县人口死亡率高达56.8‰。当然，1958年还有不少县的人口死亡率在20‰以下，有的在11‰以下，但从相当一部分地区

30%—58%的高死亡率看，却有不少县人口呈现负增长，说明1958年甘肃省不少地方还是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

1959年甘肃全省各地区人口的死亡情况也是严重的。死亡率比较高的有张掖市，死亡率高达19.32%，死亡人数是6787人。安西县死亡率高达52.89%，死亡人数为4315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6.92%，自然减员2887人。武威县死亡率为19.78%，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13%，自然减员667人。整个定西专区死亡率高达23.58%，死亡人数为53843人，全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呈-2.21%，自然减员5047人。其中定西县人口死亡率为25.94%，死亡人数为6098人，人口呈-1.97%的增长率，自然减员人数464人；陇西县死亡率高达45.13%，死亡人数为16429人，自然减员3781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0.39%；通渭县死亡率为37.09%，死亡人数为10229人，自然增长率为-19.92%，自然减员5495人。天水专区1959年整体上人口死亡率不太高，但清水县却高达23.81%，死亡人数达8041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73%，自然减员585人。整个平凉专区人口出现了-1.20%的负增长态势，自然减员2677人，其中镇原县达19.06%，死亡人数为4872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8.06%，自然减员为2061人；泾川县人口死亡率高达28.11%，死亡人数是10356人，人口自然增长率呈-5.97%，自然减员2200人；静宁县死亡率高达25.82%，死亡人数是12581人，人口自然增长率呈-8.05%，自然减员3922人。1959年临夏回族自治州整体上人口的死亡率在19.61%的水平上，其中东乡族自治县死亡率高达28.14%，死亡人数为3243人，由于当年该县的出生率高达30.77%，所以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未呈现负数。1959年甘南藏族自治州人口自然增长率呈-2.33%，自然减员834人，这个地区死亡率虽为18.64%，但因为饥饿的原因，人口出生率由原来的40%下降到16.32%。因而人口仍然是负增长。

1960年甘肃是大饥饿大死亡的高峰，全省的各地区都呈现出死亡的恐怖和死亡的惨景，张掖专区整体死亡率高达45.06‰，死亡人数103217人，自然增长率呈-26.78‰，人口自然减员61349人，其中酒泉市死亡率高达43.57‰，死亡人数16129人，自然增长率呈-28.21‰，自然减员10442人；张掖市人口死亡率高达60.46‰，死亡人数20296人，自然增长呈-45.62‰，自然减员15314人。安西县死亡率高达53.21‰，死亡人数20296人，自然增长呈-45.62‰，自然减员15314人；高台县死亡率竟高达72.04‰，死亡人数11262人，自然增长呈-65.29‰，自然减员10206人。此外，张掖人口呈负增长的有永昌县，人口自然增长为-20.77‰，民勤县为-35.30‰，武威县为-26.78‰，敦煌县为-8.09‰，酒泉市为-28.21‰，人口死亡率均在25‰—43‰之内。定西专区1960年人口死亡率为59.04‰，死亡人数137248人，自然增长呈-43.44‰，自然减员100979人，其中定西县死亡率高达64.21‰，死亡人数为14611人，自然增长呈-47.50‰，自然减员10809人；会宁县死亡率达38.34‰，死亡人数9182人，自然增长率呈-21.73‰，自然减员5204人；通渭县的情况更为可怖，全年出生人口705人，而全年死亡人数竟为42838人，当年总人口为209743人，死亡率高达204.2‰，人口自然增长呈-200.84‰，自然减员42133人；陇西县死亡率高达62.24‰，死亡人数为21536人，自然增长呈-51.16‰，自然减员17703人；榆中县死亡率为28.10‰，死亡人数6006人，增长呈-13.85‰，自然减员2961人；岷县死亡率高达77.10‰，死亡人数29489人，自然增长呈-64.80‰，自然减员24785人。整个天水专区死亡率达54.54‰，死亡人数165904人，自然增长呈-43.16‰，自然减员131291人，天水专区的一市七县全部人口自然增长呈负数，死亡率最低的天水市为24.78‰，最高的西礼县竟达94.53‰，自然增长最低的西礼县为-84.39‰，最高的天水

市为-8.44‰，这个地区死亡人数最多的西礼县有43793人。平凉专区死亡率为22.79‰，死亡人数为50253人，人口自然增长呈-7.79‰，自然减员17178人，其中静宁县死亡率高达54.19‰，死亡人数达24783人，人口增长呈-44.85‰，人口自然减员20513人。临夏回族自治州死亡率达53.61‰，死亡人数46906人，人口自然增长呈-36.64‰，自然减员32057人，这个地区的一市两县死亡率都很高，分别为临夏58.25‰，和政县52.67‰，东乡族自治县35.42‰。甘南藏族自治州死亡率达49.56‰，死亡人数18113人，自然增长呈-45.15‰，自然减员15041人，所有县市均为负增长，均出现大量自然减员。

1960年从全省各地很高的死亡率和巨大的死亡数量看，甘肃省在这一年是充满饥饿的一个年份，也是遍地堆放饿死者白骨的省份，几乎没有一个县市无饿死人的现象，这种惨痛景象是亘古罕见的。

1961年甘肃死亡率有较大的遏制，但是省内的一些地区和县市仍然存在着高死亡低增长现象，饿死人的惨状不时发生。例如金塔县人口增长呈-4.27‰，人口自然减员329人；张掖县人口自然增长呈-0.92‰；高台县人口自然增长呈-6.58‰，自然减员776人。整个武威专区人口增长呈-2.15‰，自然减员2539人，民勤县自然增长呈-11.83‰，自然减员2188人。定西专区的通渭县自然增长为-7.49‰，自然减员1538人；漳县人口死亡率高达31.13‰，死亡人数2447人，人口增长呈-22.85‰，自然减员1796人。秦安县死亡率达20.78‰，死亡人数5973人，自然增长呈-11.13‰，自然减员3200人。平凉地区的泾川、崇信、静宁人口自然增长均呈负数。甘南藏族自治州整体上人口增长呈-2.36‰，全州自然减员792人，这个自治州除夏河县外，其它六个县人口均呈负增长。

二、悲惨生活

我们阅读统计表上的死亡统计和死亡数字，觉得并不沉重，甘肃饿死的低线为 60 余万，饿死的高线为 100 余万。然而，我们透过这些统计数字，看看甘肃人民群众的生活现实，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极端悲惨的图景。在许多数据和历史资料中，对甘肃人民悲惨的境遇，都有所记载。且看《甘肃民政志》从 1957 年到 1961 年对甘肃人民悲惨生活的概况反映：

1957 年 5 月至 9 月，甘南、陇东、陇南等地既有山洪，又有瘟疫，出现严重死人现象。全省灾民上百万人。上半年中部干旱区人民缺粮面大，有些是吃变质的油渣，中毒身亡。仅徽县缺粮患浮肿、干瘦等饥饿症，死亡 1113 人。全省出现大量外流人口。

1958 年第一季度全省春荒灾民缺粮 60 万人，其中 1.2 万青壮年劳力因饥饿而外流，近 5 万人得了浮肿、干瘦等营养不良症，徽县、秦安因饥饿致病者都在万人以上，全省春荒死亡 5470 人，其中外流死亡 144 人，食物中毒死亡 33 人。

据 1959 年 9 月份统计，近 40 个县缺口粮，缺粮灾民 162 万，浮肿病 9.6 万人，外流达 7 万人，饥饿致死者 9631 人，有 2200 人因饥饿逃亡有去无归，尤其陇西、静宁两县饿死的人口更多。

据 1960 年 7 月份统计，上半年 100 余万人缺少口粮，新增外流人员 8.3 万人，流后外省的 6.9 万人。下半年，农民在集体食堂就餐，家中无任何存粮，因饥饿造成许多人气息奄奄，成千上万人死亡。

1961 年虽开始抢救人命，但因前几年的左倾政策伤了元气，饥饿和死亡情况依然存在，上半年统计还有 494 万农民缺粮，下半年虽得到缓解，但饥饿和死亡仍在继续。这一年全省人口比 1958 年减少近百万人。大饥饿一直延续到 1962 年，1962 年全省累计有 457 万人缺口粮，263 万人缺衣缺被。

1960 年前甘肃有些县的饥饿贫困已达到了空前惨重的地步，

甘肃通渭县是其中最典型之一，该县的县志这样记载：

1958年秋，全县共有284000人，比1949年增长22.5%，但在极“左”错误的影响下，加之频繁的自然灾害，1958年冬，全县出现严重的饥荒问题，不少农民以树皮、野菜、草根、禾芙充饥，身体浮肿，人口开始外流、死亡。至年底，外流625人，死亡3687人，全县实有44592户，279687人。1959年冬，饥荒更为严重，一些地方出现人相食现象，人口大量外流、死亡。至1960年初共外流19081人，死亡42024人，至年底，共死亡60210人，外流1140人。1960年春节前后，有些通渭籍在外地工作的干部向中央和中共甘肃省委书面反映了通渭的问题。于1960年2月开始，中央、省、地先后发放大量救灾款物，派大批干部赴通渭抢救人命，才使人口非正常外流和死亡现象逐步得到控制。至1961年底，全县人口比1958年减少78432人，绝户2168户，有孤儿1200余人，寡妇3000多人。3年多时间内，全县加上少量出生数共减少72150人，比1958年秋的总人数减少25.4%。

1960年前后，甘肃人民的苦难生活表现在各个方面，其中有：

1. 绝对贫困化。这段时期，甘肃多数地区人民的生活处于绝对贫困化状态，粮食指标由1956年450斤的标准逐步下降，到了1960年，全省人均日口粮实际不到半斤。在重体力劳动下，半斤粮是难以维生的。而在1960年一段时间，许多地区的公共食堂把口粮标准降至3~2两（16两为1斤），实际上多数人在喝大锅清水汤。还有一些地方完全断粮，公共食堂关门，农民不是被饿死，就是象野人一样四处流散。而生活的其它方面同样是极端贫困的。1958年搞“共产风”，几户农民归户住，许多房屋被拆，几户人拥挤在1户居民的院落里，住房破烂不堪，倒塌伤亡事故不断。衣不遮体的现象在甘肃农村几乎遍地存在，通渭、静宁、会宁、安西、张掖等县都曾反映，十几岁的姑娘和二十岁左

右的年轻小伙子没有裤子穿的大有人在，在甘肃的一些贫困乡确有夫妻二人轮穿一条裤子的。此类惨状直延续到70年代依然存在。1961年抢救人命过程中，解散公共食堂，实行分户吃饭，但因为锅、铲之类的金属品1958年被强迫炼铁了，而瓢、勺和其它用具街市上又没有，因此出现了无锅做饭，无碗吃饭的窘境。在不少农村曾出现全家用一只破碗吃饭的情况，有些家户在土炕上挖个洞洞，用野菜擦后作为碗来使用。相当多的农村贫困人家没有盖的，有的则把草杆堆在炕上，晚上钻在里面过夜。有关方面在调查中部干旱地区的贫困状况时发现，许多幼童在1961年前后仍然不知道“馍馍”是什么，因为多年来一直用稀糊糊来度日，从来没有吃过“馍馍”。

2. 人相食的惨景出现。人相食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这是饥饿到极限时人兽同化的表现。而在甘肃60年代确实发生了人相食现象。甘肃省委1960年底在逼迫向西北局作出的检查报告中，就反映1960年元月在甘肃发生了11起人相食的事件，报告这样说：“今年元月，公安厅报告发生了11起吃人肉的‘怪案’，不加重视，不作深入了解，即判断为反坏分子搞的鬼，要公安厅再查，就没见下文”。在甘肃通渭县也发生了多起人相食的现象，1984年我国的一家文学刊物《啄木鸟》就追记了通渭县某村一位父亲在死亡线上挣扎时，吃掉了自己5岁的儿子。在甘肃静宁县，一位奶奶竟然用菜刀杀死了孙子，将躯体的一半吃掉，后来被逮捕，1961年纠正左倾路线时被释放。有位当时在静宁县高界公社当工作组的干部亲自给笔者讲，这个县发生了一起贫农子女吃富农子女的惨案，他亲自作为难题去处理。这类惨案我们再不忍心追述，只是为那些至今仍用谎言掩盖真理的人们作些提示而已。历史应当永远记住人相食是人类的最大耻辱，但这种耻辱在极端饥饿状态下往往会现出，人类要消除人相食，必须首先消除极端的饥饿现象。人相食确实不只在甘肃发生，60

年代在全国一些饥荒严重的省份，也曾发生过人相食的惨象。高晓岩在《民族大浩劫的前奏》一文中曾记述了刘少奇为人相食而痛心的事例。1962年6月下旬，毛泽东通知刘少奇见面，主要是要谴责刘少奇坚持包产到户的问题，刘少奇走到中南海游泳池，热情地问候毛泽东，毛泽东却声色俱厉地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激愤地说“饿死了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可见，当时饿死人的，不仅仅是甘肃，人相食的惨景给全中国人的心灵造成了巨大阴影。

3. 全民大饥饿。甘肃1960年前后的大饥饿不是局部的。也不是有些人说的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1958年的大跃进搞得几乎民穷财尽，到1959年，已经出现了全面食物匮乏的惨状。当时极端困难的地区普遍出现吃草根、树皮、观音土、麸糠油渣，有的地方青苗刚出土就被挖光吃光，当这些所谓“代食品”吃光的时候，或坐以待死，或大流亡，多数人流亡不动，就只好想方设法找充饥的东西，当时连老鼠在一些地方也被吃光，至于狼、虎、兔这些野生动物也被一猎而尽。康有为曾在《大同书》中描述犬狐吃人的惨状，称“伏尸遍地而犬狐啖”。而1960年许多地方饿死的尸体，连吃他的犬狐也没有了，因为犬狐已被人吃光了。在城市除了个别官吏尚能吃饱肚子外，绝大多数人也挣扎在饥饿线上。1959年甘肃省委号召在城市的居民、学生、干部中开展所谓“小秋收”运动，就是动员这些人到山上把各种野生植物和树叶收集到单位以备食用。到1960年许多地方的口粮降低到半斤左右，不得不用“小秋收”拣来的这些野草、野菜、植物根当饭吃。当时在兰州的一些高等学校，食堂用树叶做饭的事是常见的。许多城镇的国营食堂几乎断炊，旅客们到一个地方吃饭是极其困难的，不少地方规定，在国营食堂买饭，除付出粮票、货币以外，还要出示介绍信、旅社发的餐证和工作证五种东

西，才方能吃一碗饭。尤其可笑的是，在粮路断绝的情况下，在甘肃出现解决口粮问题的“增量法”，所谓“增量法”就是将1斤粮做成重的2-3斤的食品。开始是在包谷面中增加一些水量，弄成状似稀糊糊的馍馍，美其名曰“发糕”，后来增量法完全成为草菅人命的口实，一些地方竟报告用1斤粮食，可做出40斤重的“增量”食品，那当然1斤粮就可以解决40人的供应了，甘肃的“增量法”直至1961年后半年才逐步消亡。

4. 劳动的折磨。1960年前后，公社完全采取军事化、集体化的劳动方式。尽管农民已经气息奄奄，食堂将近断炊，但仍然从县委到公社，到生产队，或派出工作组，或指定干部，迫使农民“大干快上”。当时几乎全省县县都提出了大办水利、大办农业的项目和指标，还有一些地方开展了毁林开荒的活动。甘肃的引洮工程在困难时期曾强行组织40余万农民进行劳动，有的就饿死在工地上，到1960年下半年，该工程的劳力大部分逃亡，工程不得不停下来。平凉地区在1960年曾提出了大开荒活动，学校命令停课，让成千上万的人去到盘岭等地毁林开荒，晚上将大片森林放火烧光，白天用泥土将树根盖住，谓之完成了多少亩开荒任务。当时居民、学生、干部中的口粮标准一降再降，各地也出现了大量城市居民浮肿，以至死亡现象。在许多县镇充满着饥饿的恐怖，成群乞讨者在街头抢食人手中寥寥无几的食品，有的为了争食而发生了凶杀惨案。由于劳动强度极大，而又在日夜奋战的口号下无限延长劳动时间，有不少人不是直接死于饥饿，而是死于苦役和疾病的折磨。不少人因吃“代食品”（实质上是非人食用的植物或矿物）活活胀死。有的因各种慢性病无医无药治疗，加之饥饿而很快死亡。有的因饥饿出现家庭崩溃，父子、夫妻因饥饿争粮，反目为仇，各奔东西，家破人亡。妇女在这一阶段遭受的灾难更为严重，许多人困饥饿而失去了生育能力。1961年5月9日，时已任甘肃省委书记的汪锋同志给毛主席的报

告中讲到，在临夏调查时发现妇女的病症是严重的，报告说：我们调查了新一号生产大队4个生产队的妇女病和妇女生育情况，第九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25人，闭经的12人，占48%；在通经的13人中，今年1月后才通经的8人；一贯通经的两人，1个是女队长，1个是炊事员；1959年以来只有脱产干部的家属生了1个小孩。第五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26人，闭经的21人，占81.2%；全队1959年以来没生一个小孩。第六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19人，闭经的13人，占68.4%；在通经的6人中3个是炊事员，两个是女队长，一个是脱产干部的爱人；1959年以来生了两个小孩，1个是大队保管员的爱人生生的，1个是生产队长爱人生的。第七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24人，闭经的16人，占66.6%；在通经的8人中，有4人是今年1月后才通的；一贯通经的4人，一是炊事员，还有一个是生产队长的爱人兼炊事员，1是脱产干部的爱人，1个生产小组长的爱人；1959年以来只有管理员的爱人生了1个小孩。从上述这个调查材料中，可以看出许多问题。

5. 阶级斗争的恐怖。1960年前后的困难时期，甘肃的政策极“左”，以阶级斗争为名，对广大人民群众形成了政治高压和政治迫害。当时的甘肃省委把反映真实情况和申诉饥饿现象的人都看成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甚至把人吃人的现象说成是反坏分子搞的鬼，把严重的饥饿现象说成不是工作问题，而是阶级斗争问题，对人口外流、浮肿、死亡等现象采取层层封锁，不报实情反而说成是农民瞒产的表现，普遍的开展搜粮、挖粮，搞恐怖活动，出现了逼死人、打死人惨境。仅张掖地区1960年2月24日的调查就反映出了骇人听闻的迫害群众事件，例如：酒泉县西峰公社香庄大队，在核实产量时，工作组干部陈鸿景召集了32人的开会，其中积极分子12人，会议连续进行了两天两夜，共斗了18人，其中小队长10人。他们斗的方法是：交待问题的坐在

房子里，不谈问题的拉到院子里，脱掉帽子，脱掉棉衣，结果无一人交待问题，在院子里站了17人，并把这些交给“红专队”管理，五更天地上，人拉大车，每车跟一名积极分子看守，吃过早饭又集合起来进行斗争。小队长于家康有病向支部书记请假，休息片刻，被陈拉下炕打了几个耳光，并将该小队长叫到庄外，用手枪对准于的胸口威胁说：“你不交待问题，就让你死到这搭”，该小队长吓得瘫倒在地。再如：山丹林阴农场生产股长朱贤庆带领一些人搜查了184户社员家，制造粮食上的恐怖。武威古城公社兰青带领干部在社员家中搜查粮食，每到一家，把社员的房门、面箱贴上封条，在社员的院内挖了417个坑，打了20多人，逼得社员贾海一家5人全部外流，逼得贫农社员徐生元上吊自杀。

在整个困难时期，甘肃省不断开展反右倾斗争，在干部中大抓阶级敌人，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1960年仅天水地区就反映揪出了反党分子617人，蜕化变质分子195人，甚至在水天和秦安还制造了两个“反革命集团”，后来查证这些所谓的“阶级敌人”均为冤假错案。特别是在困难时期，甘肃对言论的封锁和控制是极其严格的，凡是散布不满情绪或反映饿死人现象的人，均要作为反党分子或者戴上其他什么阶级敌人的帽子加以批斗。对于一些地方农民闹粮或抢食粮站的案件处理是极其严酷的，一般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有的还被处决，例如：甘肃泾川就曾对抢粮案件定为“现行反革命”，首要者被判重刑。困难时期对知识分子的高压是十分严重的，特别是对戴“历反”和“右派”帽子的知识分子，许多人被流放到最贫脊的地方去劳改。甘肃省的河西走廊有个叫“夹边沟”的地方，这里流放了许多右派，包括一些著名学者、作家，不少人就死在“夹边沟”。兰州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赵骊生在“夹边沟”劳改，变成了一个乞丐，当得知女儿1960年捡野菜从山坡上摔下死亡后，他披着一件破羊皮袄

千里迢迢、沿途讨饭、爬火车来到兰州，不久又被遣送到夹边沟折磨。

三、大灾难的成因

对中国发生的三年大灾难，我们一贯的解释是自然灾害和苏修卡脖子两种原因所致，当然这是加剧三年灾难的因素之一，但都不是主要原因。我们从自然灾害的角度来看，在甘肃几乎年年有灾害，尤其旱灾是经常发生的。先让我们看一看 50 年代至 60 年代的灾害记载：1950 年旱灾，全省 57 个县受灾；1951 年旱灾，局部水灾，56 县受灾；1952 年旱灾、雹灾、病虫多种灾，68 个县受灾；1953 年则发生了以大旱为主的重灾，有 72 个县受灾害；1954 年以旱为主、兼有雹、洪霜灾，受灾 84 县；1955 年旱灾较重、次为风暴霜冻，23 县受灾；1956 年旱灾为主，兼风暴洪涝、病虫灾害，受灾 79 个县；1957 年重旱灾年，全省半数县受灾。以上这些灾年虽有一些地方出现饥荒和人口外流，但却没有出现三年困难时期这样大规模的死亡和人口外流。而 1958 年到 1961 年四年间，虽有旱灾，但并不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例如 1958 年只有 34 县受旱，1959 年只有 40 余县受灾，1960 年有 47 县受灾，1961 年 60 县受灾，受灾的面积和数量并不比 1958 年以前大，但死亡却如此之惨重，这说明，灾害年年有，但并非灾年一定会大量饿死人，所以把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现象归咎于自然灾害完全是为了掩盖人为的罪过。至于苏联撤走专家与甘肃省及全国的“大饥饿”的关系更是搭不上边的。1960 年夏季，赫鲁晓夫确实撤走了在中国的约 200 个企业中工作的 1400 名科学家和专家，我们的解释是撤走专家是苏联变“修”的表现，也是反华的举措。苏联官方解释说，苏联专家在中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不管撤走的原因如何，撤走专家确实对苏联援建的工厂和基础设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一些项目不得不暂时下马。但是，中国的命运没有拴在 1400 余名苏联专家身上，撤走专家的

影响和中国缺粮关系更不大，甘肃省也撤走了几十名专家，但他们的撤离对甘肃省农业的影响几乎是不存在的，至于苏联要求中国急速还债，那主要不是给苏联运送粮食，因为中国还在不断地进口粮食，而甘肃省用粮食为苏联还债的事也未有记载。可见，自然灾害和苏联卡脖子这两个因素，绝不能构成甘肃百万人死亡的原因。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祸源在于 1956 年后半年开始从中央到地方推行的“左倾”路线，尤其是 1958 年确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造成中国贫穷、甘肃赤贫的三大祸源，是饥饿夺走百万甘肃人性命的三大舞台导演。

让我们先看看“左”倾思潮泛滥的大背景。1956 年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开展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反右倾运动。中央反的“右倾”主要针对周恩来、刘少奇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的倾向。1957 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反右倾，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的计划经济，有平衡有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而不平衡则是绝对的”，认为反冒进是向干部群众头上泼冷水。他在 1957 年 1 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指责反冒进，指出：“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现了右倾”。1957 年毛泽东采取引蛇出洞的办法，开展了反右派斗争，把 55 万知识分子和干部划成了右派分子，进行了残酷迫害，从此一切批评的议论被封闭了。这以后，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更为左倾，他提出了要“恢复促进委员会”，认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从 1957 年底开始，毛泽东就产生了采取大跃进的方式实现中国工业化的指导思想，他在 1957 年 11 月 18 日会议上说：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 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 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现在英国年产 2000 万吨钢，15 年后，可能达到年产 3000 万吨，

可中国在 15 年后则可以达到 4000 万吨，完全可以超过英国。根据毛泽东的跃进思想，中国编制了 1958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计划确定工业生产总值 725.6 亿元，农业生产总值 642.5 亿元，基本建设投资 130.69 亿元，钢 610 万吨，煤 14872 万吨，粮食 3920 亿斤，棉花 3500 万担，这些指标都超过了原来提出的控制指标。

1958 伊始，毛泽东就不断推行冒进政策，1958 年 5 月 5 日到 23 日，中央召开了八届二次会议，会议制定了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会议上确定了“一天等于 20 年”的建设速度。此后把我国钢的产量又调整为 1070 万吨，在全国各地开展了“拔白旗”、“插红旗”、“放卫星”的运动。将近 1 亿劳动力离开了农业生产和各条战线，开展了大炼钢铁的运动。这个时期又出现了一些离奇古怪的冒进口号，其中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办不到，只怕想不到”，“日夜奋战，铁水奔流”。“群众运动触山山倒、触地地崩”，于是在全国各地出了许多假“卫星”，吹牛皮、浮夸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1958 年 6 月 12 日新华社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放了一个亩产 3530 斤的卫星。6 月 30 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北省安国县南娄底乡卓头村社小麦亩产 5103 斤。7 月 23 日，《人民日报》发表河南省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发射”“小麦高产卫星”的消息，宣称小麦亩产达到 7320 斤。8 月 13 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麻城县麻溪乡和福建省南安县胜利乡“发射”旱稻和花生“高产卫星”，亩产量分别达到 36900 斤和 10000 多斤。9 月 18 日，《人民日报》又报道，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发射”的“中稻高产卫星”，亩产量高达 13 万多斤。当时的假“卫星”和浮夸风弄得中央领导也信以为真，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撰文说，自己亲眼看到了番禺县亩产 100 万斤番薯、60 万斤甘蔗、5 万斤水稻的“事实”。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发表题为《驳粮食增产有限论》的文章，认为广

东的粮食亩产 3000 斤或 4000 斤以至 10000 斤是可能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撰文论证，如果植物能利用射到 1 亩地的太阳光能的 30%，稻麦的产量就有可能达到 40000 斤。毛主席在各地视察时也受到了假“卫星”的欺骗，例如毛泽东 8 月 4 日视察河北省徐水县时，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毛主席：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作物要拿到 12 亿斤。毛主席说：“你们夏收才拿到 9000 多万斤粮食呢！秋季要收 11 亿呀！你们全县 31 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张国忠回答说，要换机器，另外一个干部回答要制酒精。毛主席说：“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也行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毛泽东在群众放的一些“卫星”的鼓动下，头脑也更发热了，他在 1958 年一次会议上讲，“超过英国不是 15 年，也不是 7 年，只需 2 到 3 年，2 年是有可能的”。1958 年的 9 月 2 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讲，“为 5 年接近美国，7 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在毛泽东鼓动大跃进的同时，又展出了从制度上提前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蓝图。1957 年冬和 1958 年春，毛泽东就提出了办大社的问题，4 月间，中央正式发出小社变大社的意见。7 月 1 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做《在毛泽东同志旗帜下》的演讲，首次公开了毛泽东对未来社会的总体方案，这就是：“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此后各地自发地创办人民公社。8 月 6 日，毛泽东在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公社视察时明确表态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毛泽东在山东历城县北园公社视察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8 月 13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好”的号召，全国普遍开展了大办人民公社的运动，

有的地方一个月实现了公社化，有的地方半个月、甚至十天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中央北戴河会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明确提出，人民公社要加快社会主义的建设速度，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做准备。《决议》还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当时毛泽东还倡导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主张公社应当实行平均分配，认为工资制是向资产阶级让步，应当改为供给制。随后全国一哄而起，大办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

1958年的“三面红旗”，高指标，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和共产风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损失，也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1959年10月中央对大跃进带来的问题有所觉察。毛泽东在11月的郑州会议上指出，必须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中国现阶段还是社会主义。八届六中全会后各地对人民公社进行了整顿，对一些地方的平均主义、共产风进行了批评。但是，这些纠正措施没有触动“左”倾路线的根本问题，高举“三面红旗”仍然不动摇，有些地方还在搞特大跃进，经济继续遭受破坏。1959年春天，全国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已经形成，全国在粮、油、副食品及其他生活用品方面十分短缺，缺粮成为全国的普遍现象。4月底至5月初，湖北、河北、广东三省向中央报告粮食缺乏情况十分严重，200万人口的武汉市一度粮食供应不上，河北省有30多个县缺粮，广东省全省库存粮只够几天用的。6月份全国粮食形势紧张，各大中小城市和工矿区的粮食挖空了库存，随调随销，食油供应近于脱销。中央决定从6月至9月停止对农村供应食油。1959年2月轻工部向中央报告：纸张、缝纫机、保温瓶、食糖、乳制品、搪瓷面盆、搪瓷口杯、胶鞋等都供应不上，原来不紧张的肥皂、火柴、皮鞋也脱销，沈阳、唐山、广东出现了买不到碗的问题。上海也反映，从5月份后，居民猪肉供应连6两也达不到（当时16两为一斤），5月份，浙江

省的肉、蛋供应减少了60%—85%。1959年春天，全国农村普遍出现了饥饿、逃荒、死亡现象。山东省的馆陶县，仅到邯郸一地逃荒的就达13000多人，云南大批农民因饥饿而浮肿，广东省崖县、南雄、罗定、钦县等地，不但患浮肿病的达10930人，而且饿死了134人。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中央原确定要纠正“左”的错误，但九月的庐山会议因为彭德怀的意见触犯毛泽东，彭德怀等人被划为反党集团，在全国开展了反右倾运动。于是“三面红旗”更神圣化了，左的冒进政策进一步恶性发展，全国经济继续遭受破坏，人民的灾难愈陷愈深。

甘肃省1958年至1961年三、四年的大饥荒、大灾难就是在全国这种背景下形成的。

1955年升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张仲良一贯推行极“左”政策，他不仅亦步亦趋的随着中央一些人的“左”倾口号起舞，而且在搞左倾冒险政策和开展大迫害活动中，还有不少发明创造。此人1957年就在甘肃大肆迫害知识分子，有12447人被错定为“右派”，其中将2369名“右派”发配到河西夹边沟劳动改造，其中有很多知识分子因饥饿、疾病和高强度劳动而死亡。与此同时，在全省各地开展大揭露、大批判，揪斗了一大批反映农村真实情况的知识分子。张仲良还连篇累牍的发表《农村见闻》、《蹲点报告》，掩盖农村的真实情况，把所谓“闹粮”的人进行揪斗，搞残酷斗争。

1958年，在大跃进运动中，张仲良主政的甘肃省委，不仅全面推行了中央的“左”倾路线，而且还进行了新的“发明创造”，例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是甘肃的创造。1958年召开的省二届二次党代会，会议修改了“二五”计划指标，提出了一系列高指标、大计划的“宏图”，把农业总产值定为年均增长23.51%，粮食总产量年均增长37.6%，棉花年均增长400%，地方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315%，这些增长速度，是“一

五”增长速度的3至4倍甚至10倍，并且确定要上马“共产主义工程”——引洮工程。在大跃进运动中，省委组成“检查评比促进团”，到各地搞冒进和浮夸，对“吹牛皮”、放“卫星”的单位和个人插红旗，对坚持实事求是的单位和个人戴上“白旗”帽子进行批判，“检查团”走到哪里，“卫星”就放到那里。当时在甘肃编造了许多虚假的“卫星”。甘谷县在新兴乡和四十里铺乡放出小麦亩产2827斤和2910斤的“高产卫星”；陇西县丈峰乡声称有一条60斤重的黄瓜；文县碧口乡报称有一条70斤重的豌豆；兰州雁滩乡传出结了一颗重4.5斤的辣椒。这场放“卫星”的浮夸风，越吹越大，越吹越离奇。武山洛门镇传说在一棵杨树上嫁接苹果，产量达千斤；礼县盐官乡一个农民把十多亩地里生产的洋芋堆放在一亩地里，经县、区领导“验收”，声称亩产16万斤，还公开进行了报道宣传。这些离奇的传闻，使许多人包括农业专家坐卧不安。省农科院的小麦丰产实验，当时亩产也只有600-700斤，放不出“卫星”，被指责为右倾保守的典型。

在工业方面也大搞浮夸，1958年1-3月，公布办厂1000多个，3-5月又建厂3500多个，5-6月全省厂矿企业数达220000个，出现了十多个“万厂县”，二十多个“千厂乡”，五十多个“百厂社”。当中央1958年8月提出钢产量1070万吨后，甘肃省委闻风而动，宣布甘肃要炼铁30万吨，钢10万吨，并且叫嚷，“一斤也不能少，一天也不能迟”，为此全省抽调了300多万劳动力，绝大多数是青壮年农民，到各个炼钢点去劳动，广大农村的大秋作物成熟在地里无人收割，结果只炼出了1.4万吨不能用的废品钢铁，而在这种情况下甘肃省委还继续提出到1959年要炼80万吨钢。因此，甘肃省在大跃进中，在各个部门都大搞浮夸，一时间出现了县县脱盲化、沼气化、滚珠轴承化，在教育领域也竞相放卫星宣布在甘肃的70个县，办了74所大学。

在1958年大浮夸的过程中，人民群众受尽了苦难，局部地

区出现饥饿、浮肿和死人现象，到1959年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但甘肃省委还在为“三面红旗”大唱赞歌。不少食堂出现了停炊、农民饿死的情况，但仍高唱“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公共食堂是心脏”。1959年7月，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去参加“庐山会议”，省委第二书记霍维德主持省委工作，随即给中央写了甘肃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说：“全省除兰州市外，在45个县、市中，完全没有问题的有19个县、市，部分有问题的19个县、市，严重缺粮的7个县、市，即武威、民勤、陇西、岷县、静宁等县和张掖市。严重缺粮地区的人口共154万。这些地区一般（一天）吃不到半斤粮。全省患浮肿病的有9.6万多人。据统计，因缺粮和浮肿病致死的有2200多人，非正常流入邻省的人口约有6万多人，本省境内各县互流的还有1万多人。有些地方生产陷入停顿状态”。这份报告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批判，被认定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提供炮弹”，随即甘肃省委把霍维德等同志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并在全省开展了反右倾运动。全省共受到批判斗争的有1.009万人，受到撤职留党察看，开除党籍处分的省、地、县级干部65人，县级干部285人，经过1959年的反“右倾”，甘肃省的“左”倾思潮更是甚嚣尘上，虚报浮夸继续升级，各地的公共食堂，人民群众虽恨的咬牙切齿，但做为“社会主义的心脏”却继续受保护。在粮食问题上张仲良把持的甘肃省委不断行骗术，先扬言1958年甘肃粮食产量为222亿斤，后又说200亿斤，最后说185亿斤，1959年秋天又说是110亿斤。1959年又提出甘肃粮食要产400亿斤，后来又修改为370亿斤，最后又修定为270亿斤，实际上100亿斤也不到。在粮食奇缺的情况下，还向农民高征购，更加剧了人民群众的灾难。

从1959年到1960年甘肃的粮荒越来越严重，人口外流，浮肿、饿死的人数不断增加，而当时以张仲良为首的甘肃省委却指

责反映这种情况是右倾机会主义，粮食问题是阶级敌人制造的，对饿死人的现象，用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来搪塞，甚至把人相食的现象说成是坏分子在捣鬼。张仲良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他当时说：“甘肃58年粮食落实数字是120亿斤，比1957年增长41%，粮食真正紧张的只有7个县，主要是不会过日子，疏忽大意，对粮食问题抓晚了，对仓库也没有管好”，又大肆鼓吹1958年炼钢的成就，说我们“58年炼了5万吨钢，建设了一批小高炉，培训了1万多名技术人员和工人，既炼了钢又练了人”，对大跃进的成绩是“得大于失”，“把大跃进的成绩说成得不偿失是错误的，有得有失的看法也是不对的，大跃进的成绩和缺点不能等量齐观”。可见张仲良的极“左”思想是根深蒂固的，这种极左思想一直延续到他1960年底被降职为止，他的左倾思想和他对人民群众的冷漠与无情，是造成甘肃大灾难的重要指导因素。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甘肃在困难时期出现的全民大灾难和百万人的饿死现象，它的大背景是中央“左”倾路线在甘肃的反映。总路线和大跃进是“左”倾路线的集中表现，这两个东西在全国直接掀起了破坏经济规律的各种盲目行为，浮夸风、瞎指挥、强迫命令、“放卫星”这些离奇古怪的东西，都是执行大跃进和总路线的具体表现。1958年人民公社的建立，是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的重演，它超越物质基础而变革生产关系，把经过百余年都难能施行的供给制、食堂制等等，把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的设想，竟拉到经济十分落后的历史时期来实践，这必然会造成生产关系的大破坏，进而破坏生产力。

在同样左倾路线的大背景下，为什么甘肃等一些省份受害最重呢？这主要是因为甘肃省委的主要领导是左倾狂，想通过跃进和超高发展的形式给自己捞取政治资本，而甘肃的基层干部和相当多的中上层干部，有不少人缺乏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科学意

识，容易在上级的冒进口号蛊惑下和群众运动的鼓动下，头脑更加发热或迎合错误思想，或积极推波助澜、助纣为虐，或虚报浮夸、弄虚作假，置人民的死活而不顾。如果本省的各级领导中的大多数能坚持实事求是的路线，能真正从甘肃的实际出发，能关心人民的痛痒和疾苦，上面的错误决策会得到抵制，至少会大大减弱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可悲的是这样的领导干部在甘肃虽然有，但人数不多，力量很小，最终没有阻止错误路线和政策给甘肃人民造成的灾难。

四、吸取前辙之鉴

五十年代后期的极端主义冒进政策，引发了六十年代的大悲剧，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其教训是十分沉痛的，我们应当吸取前车之鉴，总结历史经验，以防历史悲剧的重演。根据甘肃的情况和全国的一些共性问题，我们应当引出如下的经验教训。

1. 勿画空想共产主义蓝图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其所以能出现，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从中央的领导层到地方的一些领导干部，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作了曲解，用落后的小农式的幻想代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或者说冒充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把在全国范围内的蛮干，描绘为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表现形式。毛泽东本人自参加革命以来，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成份很浓，他早年很崇尚康有为的《大同书》，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发挥了儒家关于“大同世界”的理想，提出了一整套空想社会主义的蓝图。在他所设制的“升平”式的社会方案中，未来的社会是一个无差别的平等的“大公社”，世界没有国界的差异，人类没有种族的差异，社会没有阶级的差异，经济上没有贫富的差异。在他的“公社”里，大家都有活干，大家都有衣穿，不管工农商，均为公共事业服务。在这类“公社”中，人们实行供给制。妇女有孕者，进入本院，婴儿出生送育婴院，到受教育年龄相继入小学院、中学

院，凡人无家者入扶贫院，人若有病，公费入医疾院，老年人都进养老院，人去世后都进老终院。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也提出了中国要走大同世界，他认为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应该是肯定的，问题只是康有为“没有找到一条到达大同世界的路”。在1958年八届八中全会上，毛泽东亲自推荐《三国志·张鲁传》等五本书，他对汉末张鲁推行的“五斗米道”中一些做法也很欣赏，其中就有“置义舍”，即住房免费，“义米肉”，即吃饭不要钱等做法都加以肯定。后来在讨论人民公社问题时，他说过这样的话：“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论，我们要实行”。1958年办人民公社时，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曾把康有为的《大同书》和马克思主义《哥达纲领批判》，一同送给徐水县的干部。可见我们的人民公社就是按照空想社会主义的模式设计的。

人们出于对剥削制度的憎恨，就产生“大同社会”的社会理想和社会方案，认为在这样的社会里，所有财产都是公共的，产品的分配都是平等的，人们的劳动是自由的，社会的分工几乎不存在，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差别。这种社会理想最能吸引劳苦大众，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也会发生共鸣。马克思虽然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但他在设计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时，空想社会主义的成份还是不乏有之，例如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描绘共产主义社会时，就这样讲：“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会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以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①

我们大办人民公社时，许多善于引证马克思早年空想社会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十卷，第28页。

义理论的人，却对马克思关于实现共产主义需要充分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很少钻研，以为只要有理想就能够实现。这就是所谓“不怕办不到，只怕想不到的”唯心主义哲学。1958年以来，空想社会主义左右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同志，也激发了农民的空想意识。河南范县提出了从1958年到1960年要过渡到共产主义。他们对共产主义作了这样的描写：

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
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
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
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毛泽东对范县新乐园的报告很欣赏。他这样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以行的”。

甘肃省对追求这类空想蓝图的步伐是不慢于河南范县的。果然在全省范围内主持干部群众大写共产主义的美好远景，仅诗歌有数万首，其中敦煌群众的一首歌唱人民公社的新诗很有代表性，在这首新诗里人民公社被命名为“桂花园”，诗曰：

迈步走进桂花园，一枝更比一枝鲜，
人人都说农业社好，谁知公社更非凡。
上天梯子立得牢，一步更比一步高。
生产思想齐跃进，共产主义早来到。

在贫困的甘肃，自1958年以来，“共产主义”的阴影一直伴随着人们，一有机会人们就动手搞空想式的共产主义。自1963年底开展“社教”以来，在一些地方又开始搞“队并队”“社并社”的活动，收缴自留地，取消评工记分，实行“按口分红”，而且在各地培养共产主义的样板。文化大革命期间，甘肃省接过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提前过渡”的口号，大搞平均主义、大锅饭，在工业、农业领域一度淡化商品意识，实行无偿调拨，无偿贡献，全省各地普遍出现了“穷社会主义”和“穷共产

主义”的典型。我们要牢记这些沉痛教训，要根据国情、省情，建设实实在在的社会主义，再不能用空想共产主义的思想，把人们引向大破坏的邪路。

2. “大”字哲学应当收敛

所谓“大”字哲学是指我国左倾路线泛滥时期，一些人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制度变革上一步登天、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1958年以来这种“大”字哲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甘肃省曾被这种“大”字哲学把经济带到崩溃的边缘。

“大”字哲学在甘肃以至全国的建设实践中表现为五方面的含义。

一曰大。1958年从提出“大跃进”的口号以来，什么都认为越大越好。其中有“大炼钢铁”，全国动员9000余万人齐上阵，甘肃动员100万左右的人到山山沟沟去炼钢，可谓“大”也。1958年初又开始在所有制上讲大，先是要“小社并大社”，紧接着“大办人民公社”，两个月之内全省都大办了人民公社。而人民公社的性质也非大不可，即“一大二公”。在全国和甘肃都出现过“县联社”，即一县一个社，可谓“大”也。一家一户开灶太小了，于是出现了大办“公共食堂”，将全村人归到一个大锅里吃饭，谓之“共产主义供给制”。1959年饥饿已经威胁了人民的生命，又提出“特大跃进”，甘肃还提出了“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直接用“大”来否定自然规律。此外，甘肃无休止地宣扬“大干快上”，而没有看到“大”字后面对自然界和物质条件的藐视。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都提出“大打人民战争”，且不知经济工作、文化工作、政治工作与游击战争时期大不一样。

二曰高。“大”字哲学的另一表现为高指标和高速度。指标高到什么程度呢？甘肃1958年的主要经济指标以3倍到10倍以上的速度增长，粮食亩产由200斤提高到2000斤，后又出现了

10000斤以上。甘肃一贯好称“高速度”，速度高到什么程度，高到人难以相信的程度，例如将手工业的年增长速度规定为400%。而且对扫盲、办学、普通话普及、卫生事业等都提出了高指标，诸如100%的实现这个“化”，那个“化”。

三曰快。认为中国一穷二白，甘肃更穷更白，越穷的变革意识越强，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因而认为一切以快为好。中国当时普遍讲“一天等于二十年”，甘肃一些地方提出“一天等于一百年”，可谓快也。不仅经济发展要快，而且社会制度的变革更要快。毛泽东在1958年讲赶上英国不需要十年，而是三、四年的事，赶上美国只需七年。甘肃也不甘落后，不少地方提出“两年超英”，“五年超美，三年实现共产主义”。在这个“快”字后面隐藏着奇奇怪怪的弄虚作假。例如，1958年宣布甘肃的人均占有粮食已达到200斤以上，实际上低于1957年的水平，而1960年的农业产值只有1957年的67.62%，说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从1958年到1960年已经三年，不仅没有看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影子，而看到的是民不聊生。

四曰多，“大”字号人物非常喜好“多”。1958年以后一直提倡“多快好省”，反对“少慢差费”。谁的人数多，产值多，搞的虚假数字多，就冠以“革命左派”，“英模”人物，成为一再提拔的对象，而谁的数字少，或者说实话，就犯了弥天大罪，成为“少慢差费派”、“促退派”、“观潮派”，大祸就要临头。于是乎，在全国、在甘肃，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数字奇迹。“人多是好事”，“热情高、干劲大”，从而出现了高至30‰，甚至100‰以上的出生率，多年把中国的人口累增到近十亿。产值多是伟大的表现，于是乎全国的产值以近似10倍之速度增加，甘肃一些地方上报的产值和产量竟高于全国水平。全国有9000万人去炼钢，甘肃出动百万人炼钢。“大”字领导和“大”字“哲学家”把追求“多”作为政治生命，但客观上要出现“多”是有难度的，于

是把“多”完全建立在骗局上，建立在自欺欺人上。如甘肃1958年号称农业产量222亿斤，结果连百亿斤都不到，至于那些亩产万斤的“卫星”，10天变成无盲县，一月抓出了几百名“反革命”分子，一年办了1000多所大学，纯粹是胡编乱造的“天方夜谭”。追求“多”的流毒一真蔓延到改革时期，有些钻营“政绩”的人仍在以“多”为法宝，图谋升官发财。甘肃出现了不少因数字升官的脸谱。“多”与“少”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有时候“多”是发展的表现，有时候则成为发展的障碍。例如追求人口多，在一定时期出现了人口压力，破坏了发展。追求产值多，开荒多，一度破坏了生态，只有产值而无效益，不能持续发展。况且主观上的“多”，思维上的“多”同现实的距离很大，一些人在计划、宣传上说的很多，但物质的发展程度不是意志和心愿完全左右的，于是就只好放弃实际统计，而在办公室里编“多”，把弄虚作假推向高潮。人为地追求“多”，到头来不是“多”而是“少”，不是上升而是下降。以甘肃为例，1958年在农业上什么产值产量都定额很多，结果出现了连年下降连年减少的局面。如1960年的产值只有1957年的67.62%，下降了32.38%，粮食减产35.24%，油料减产52.76%，棉花减产18.7%，大牲畜存栏数减少30.49%，生猪存栏数减少65.16%。^①

看，这就是追求“多”的结果。可见，“大”字哲学中的重要分支“学科”——“多”字哲学害人匪浅，是应引以为戒的。

五曰超。“大”字哲学家和“大”字号领导好讲超高或超越。所谓“超”，在纵的方面要不断超历史水平，超现状；在横的方面要超左邻右舍，在周围的同类中要鹤立鸡群。中国在1958年提出“超英赶美”，在全国掀起了“比学赶帮超”，在许多指标上

^① 《甘肃四十年经济简史》，159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要超解放前几十倍、几百倍。而在一些省份，出现了赶超的奇迹。甘肃在1958年奉行的是“登天”战略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胆子战略”，于是在放“卫星”上不断要比左右舍超前，在全国第一颗亩产5000余斤的卫星放出后，在甘肃各地随之出现6000斤、1万斤，5万斤，30万斤的超卫星“奇迹”。1958年有些省份宣传说，他们在四十天内实现了全民普通话。甘肃省很快超过了这个水平，宣布10天全省人都讲普通话了，陇上的各类方言已“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了，可悲的是在21世纪已经到来的时候，陇上的方言仍遍地皆是，不要说推广普通话已达标，就是各县区的内部，一乡一村都有自己的方言，领导去听汇报，还要有方言翻译。可见，当时的“超字战术”，说穿了是“超字骗术”，“超字权术”。经济的现实并未超，历史还在照旧进行。而超学哲学带来的另一种明显的后果，就是经济社会的后退和历史的后退。1958年以来的“超字战术”造成全国经济大衰退，人口大死亡，社会贫穷的大扩展，这才是“超字战术”的真实后果。说到此，目前一些地方领导和学者善于为一个地方制定“超越战略”，或“跳跃战略”，或“超前战略”，或“跨越战略”。越穷的地方这类战略越多，越“理直气壮”。理由是“不跨越，不超越，先进的地区在发展，我们永远落后”，这是立论者的根本论据。但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遵循的是马克思所称的“自然历史规律”，在其条件不俱备时，人们“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一个法令来废除自然的发展阶段”。^①

在经济发展的现实中，确实有些地方出现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如改革以来的深圳和目前的上海，确实有超常发展水平。但这些地方的高速发展绝不是领导者的“超越战略”带来的，而是因国家整体上政策倾斜，大开放格局形成，国内外巨额投资以及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言》，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科学技术力量的聚集等因素造成的。一味制定和追求所谓“超常规战略”、“超越战略”的有不少省、市、县至今举步维艰，历史没有按领导者和学者的意志而超越，而却在伴随着物质条件顺势发展。主观上不超越，客观上已形成更多的条件，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发展水平，而且还是持续的发展。

从1958年以来的沉痛教训中，引出的另一个借鉴是要革除“大”字哲学，坚持“实”哲学，一味的讲“大”字必然带来大话、空话，带来大破坏，甚至大灾难。领导者且不能置人民安危而不顾，用“大”字化妆自己。

3. 生产关系万能论必须休矣

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发展决定社会制度的变迁及社会形态的性质，这在马克思前和马克思同时代的人中已有共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了这样几个科学概念，即：生产力，指人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推动社会发展的物质力量和物质因素；生产关系，指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形成的经济关系；上层建筑，指经济关系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马克思还揭示了三者之间的关系，指出生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要求决定生产关系的变革程度，而生产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会引起全部上层建筑的变革。为了交待这一唯物主义的常识，我不厌其烦地转述了上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六十年代的大灾难的教训之一，就是我们的国家从上到下违背了这一常识，把生产关系的变革放在决定地位，而贬斥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和对生产关系的制约作用。

“生产关系唯一论”从1956年就开始了。毛泽东针对刘少奇、周恩来的所谓“右倾”，批判了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观点，提出了一个相反的理论，就是先合作化后机械化，认为先有合作化，才能大规模地使用大机器。而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目标“就是

逐步改变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①

于是在1956年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合作化，在初级社还未站稳脚跟的情况下，又快速建立了高级社，就是所谓全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所有土地和重要生产资料都归集体所有，生产资料再不分红，全部分配制度采取评分记工的办法。1957年毛泽东大讲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和决定作用，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具有无比的优越性，能够允许生产力以与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尽管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全国出现了“哑雀无声”的局面，毛泽东却认为思想政治战线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进一步变革生产关系已再无阻力的。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就是要通过变革所有制的形式，“提前过渡到共产主义”，而这一年，把生产关系的变革，所有制的变革放在决定地位，力图通过快速变革所有制，早日实现共产主义。1958年以来毛泽东关于“社以大好”的指导思想，开始是小社并大社，后来在全国兴办人民公社，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出现了23384个人民公社，占全国总农户的90.4%，到年底全国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是超越生产力发展进行所有制变革的典型。在公社里，土地、耕田、农具与其它公共财产，全部属于人民公社所有，后来农民的自留地及林木、牲畜等财产，转为公社所有，谓之“消灭了私有制的残余”。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在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中不断增加全民所有的成份，在劳动的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方面，实行所谓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公社普遍开办公共食堂，集体吃饭，还推行各种形式的供给制，在人民公社建立后，力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23页，197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种超越生产力水平，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所有制形式，大大地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对生产力带来了巨大的破坏，1960年前后的大灾难，同这种快速变革生产关系息息相关。但这一沉痛教训，并没有被接受，到了1963年又开始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又认为越大越好。到文革期间，又提出“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和穷过渡的口号，同时无休止地批判唯生产力论，这说明“生产关系唯一论”成为“左”倾路线推行者的顽症。这些血的历史教训，要求我们必须把生产关系的变革建立在生产关系的可靠基础上。邓小平同志“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是我们变革生产关系的正确理论，应当长期坚持。

4. 防止阶级斗争斗垮经济

阶级矛盾的是社会矛盾的一种类型，但不是社会矛盾的全部内容，阶级斗争是在阶级社会中存在的一种斗争方式，而阶级社会的各种斗争并不都是阶级斗争。我国六十年代的大灾难，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抹杀社会矛盾的多样性，把社会矛盾简单化，把阶级斗争普遍化。甘肃省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突出，把生产力的落后状态，把人民群众的谋生要求，把干部作风败坏引发的矛盾都归于阶级斗争。1957年部分农村发生口粮问题，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等人认为，“粮食问题是阶级斗争问题”，是地富反坏分子在捣乱，于是在农村开展了大批大斗，结果掩饰了农村缺粮的现实。1958年在大跃进运动中，几乎天天在搞阶级斗争，把那些钢产量上不去的地方和单位，都认为是阶级敌人在捣乱，就大批大斗，用挂“白旗”插“红旗”，来促进钢铁的高指标。1959年和1960年在甘肃出现了大批人口死亡和人相食的现象，当时的甘肃省委否认人相食是饥饿所致，认为是反坏分子在破坏，竟提出了在甘肃存在土改不彻底，反右不彻底、肃反不彻底的估计，在全省城乡开展了增划右派、反革命和地主富农的运动，把相当一部分饥民和诚实的干部划成阶级敌人。从后来甄别平反的情况

看，这期间所说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敌人全是虚幻的、捏造的。但是人为的制造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恶习在甘肃并没有因为1960年的大灾难而终止，相反在“四清”运动和文革中，阶级斗争的“烈火”烧得更旺，这个时期的阶级敌人除了死亡剩下的“地富反坏右”外，大部分则是贫下中农、广大干部、教师和各类知识分子。从甘肃情况看，批斗不仅没有促进大发展，而且形成了巨大的破坏。我们必须反思，昔日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在许多方面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背离了真理。我们一度只承认在阶级社会，只有阶级性，而无人性，不断批判所谓“人性论”，结果把人们的“和平”、“勤劳”、“善良”、“忠实”、“友爱”等优良品格全部批完了，树立起来“猜疑”、“仇恨”、“陷害”、“谋杀”、“六亲不认”这些光怪陆离的东西。一度把生产问题、经济问题、困难问题、对外关系都说成是阶级斗争，从而把社会主义描绘成四处受敌、四面楚歌的局面，甚至还给进口机器和旧社会的土地这些属于生产要素的东西也戴上阶级的帽子，也要批判，而把农民养鸡、养羊、养猪说成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进攻，于是出现了把猪羊鸡鸭杀光的穷社会主义的现象。今天回顾起来，我们的国家，特别是甘肃省多年来的贫穷落后和愚昧状态难以扭转，我们认为，所谓阶级斗争在这里起了兴妖作怪的作用。

5. 要分清经济规律和战争规律的差异

1958年以来，我国经济遭到的严重破坏，一个重要的教训是：无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把某些军事规律和战争形式搬到经济过程中来。我们在1958年以后，经常听到对任何工作“要打一场人民战争”，“要发动群众打歼灭战”，“打一场大炼钢铁的人民战争”，“打一场消灭‘四害’的人民战争”，“打一场兴修水利的人民战争”，“打一场抗旱减灾的人民战争”，“打一场平田整地的人民战争”，等等。在把经济和战争等量齐观之后，往往不顾客观实际，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役使成千上万的群众从事

某些活动，以为人越多，建设会搞得越好，工程会完成得越快。在人海战术中，基本上否定科学技术的作用，藐视科学技术的力量，倡导人有两只手，“人多拾柴火焰高”，大批“白专”道路，强调“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不断地鄙视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批判“洋奴哲学”，提倡各种土法作业。在经济战线和生产战线推行人民战争的方式后，把自然规律和生态规律置之脑后，把人的意志看成了顶天立地的决定因素。有一首所谓民歌就充分表达了1958年大打人民战争的狂热情绪。民歌曰：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

在把经济当成战争去打的过程中，生态遭到了严重破坏，小麦种在山顶上，水稻种在湖中心，“五小”工业并起，围湖造田掀高潮，毁林挖山学愚公。这种愚蠢行为，弄得山河悲鸣，苍天叫苦。

我们一定要汲取1958年以来用“人民战争”方式开展生产的教训。在冷兵器时代可能是谁的人数最多，在战争中取胜的希望最大，但也不尽然，智谋在战争胜败中的因素也很大，以少胜多的战争实例是举不胜举。而现代战争是用更先进的武器作对抗，人的数量在战争中的作用那就非常之小了。既然如此，如果把打仗的方式搬到经济工作中，那更是荒谬绝伦了。当然，1958年前后，以战争对待经济工作是有其特殊原因的，因为我们党是通过游击战争和人民战争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这就形成了一个错觉，好象用人民战争的方式也可以实现现代化。这一沉痛的教训我们必须永远牢记，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一定要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要重视科学技术和人才的作用，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6. 防止政治路线背离认识路线的陷阱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社会主义胜利的目标，党和国家的政治路线是极为重要的，尤其在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情况下，党的政治路线指导和影响着全国人民的一切行动。但是正确的政治路线，必须建立在科学的认识路线的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政治路线必须建立在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要不然，政治路线就会成为少数权力人物的政治愿望和政治游戏。

六十年代的大灾难，是同1956年开始党的某些政治路线背离唯物主义认识论有必然联系的。1956年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消除贫困，发展经济。刘少奇等人坚持从中国当时的实际出发，提出我国的主要矛盾是解决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毛泽东等人则提出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随着把三大改造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要内容。三大改造认为是一场所有制领域的阶级斗争。改造得越彻底、斗争得越激烈，社会主义就来得越早。1957年把中国的主要矛盾，看成是思想政治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制定了反右派斗争的政治路线，知识分子遭受了一场大劫难。1958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也是当时的政治路线，它完全否定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历史的、自然的、文化的客观条件，是在唯心主义指导下制定的政治路线，在贯彻这一路线的过程中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进行了大扫荡。甘肃首先提出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张仲良创造的“要革自然的命，必先革思想的命”、“无雨大增产，大旱大增收”，就是这种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写照。

错误的政治路线，在推行过程中会遇到巨大阻力，而权力人物为了实现某种政治愿望，必然采取高压强制手段推行这种路线，这样以来就出现否定事实，编造谎言，提倡大话、重用奸佞人物的行径。而相反对那些说实话，办实事的人予以打击，给那

些脚踏实地，办实事的行为予以指责，从而使错误的政治路线向恶性方面发展。由此可见，我们在制定政治路线和执行政治路线过程中，都要坚持科学的认识路线，遇到政治路线背离客观实际，离开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背离人民意愿时，就要用事实，用真理加以校正，切忌强行推行四处碰壁的政治路线。

7. 要有一个健康的吏制系统

1958年以来的大吹牛和1960年前后的大灾难，其基本原因是人祸而非天灾。真乃“祸出萧墙”。而人祸主要是我们干部和领导层的恶劣作风所造成的。为什么错误如此之严重，灾难的面积如此之大而难纠正呢？这不得不看我们的官吏面目。

集体化和公社化时期，选择干部的主要标准是出身好、阶级立场坚定。而当时对干部的政治立场放在第一标准，所谓立场就是坚定地毫无疑问的执行上级的指令。真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都要执行。因此，许多地方在贯彻执行政策上出现了教条主义、命令主义，甚至出现对群众的残酷迫害，什么“为人民服务”，只是宣传而已。不少干部对群众搞“阶级斗争”恐怖，一不小心，就把某些群众划到“阶级敌人”、“敌我矛盾”一边。

当时，把说假话，掩盖矛盾，制造阶级斗争的恐怖作为干部政治觉悟高的表现。应当说要做一个好的领导干部首先要做人，要有高尚的人格，完善的人性。而当时我们的有些领导干部被政治口号腐蚀得“人性异化”。例如，甘肃省委的主要负责人看到各地上报饿死人的现象就反感，否认饿死人的事实，要求下面在“正常死亡与非正常死亡”上划界，以抹杀饥饿而亡的事实。尤其当公安部门报来11起吃人肉的案件时，竟说这是坏分子在搞破坏。地、市、县也有不少领导在死人面前无动于衷，大谈“大好形势”，困难只是一个小指头。只有到了丢乌纱帽时，才不得不露出点人性来。如张仲良在1960年被迫作检查时才表示了痛心。他说：“去今两年给了很大的破坏。农民遭到很大损失，伤

了元气，大量死人，妻离子散，绝了后代”。“现在确实很痛心”。有一些地方的干部，在粮食奇缺的情况下，竟贪污私分公粮，关掉了食堂，让群众活活饿死，还有一些干部，面对群众的饥饿，他在花天酒地、挥金如土。后来开展“四清”运动，追查所谓“四不清”干部时，在全国竟有几百万多吃多占的干部，在甘肃竟有数万名在人民灾难中“懒”、“馋”、“占”、“贪”、“变”的干部。

毛泽东曾发现过干部的作风和品德问题，特别是随风倒和搞浮夸的问题，为此他曾提倡我们的干部要学习海瑞、敢于骂皇帝。而这不过是口号而已，后来学海瑞的干部一个一个被打倒，而讲大话、假话的干部则更吃香了。由此可见，建立健全我们的干部制度和选吏制度是十分重要的，要形成一个良好的干部能上能下的晋升机制，要有选贤任能的一整套干部标准和制度，要使我们的干部在做人做事上都体现出人民公仆的品格。

吹牛吹出了灾难

1960年前后的陇上大饥荒，是同1958年以来的浮夸风和大吹牛形影相随的。在竞相创高指标，放“大卫星”的鼓噪声中，造成经济结构极度紊乱，人力资源耗损殆尽，财富大浪费，生产大破坏。灾难就由此而生。

一、奇怪的“理论”导演出竞相吹牛

1958年是“吹牛风”空前绝后的年代，出现谁吹得越凶谁越光荣的局面。但是，决不要误认为1958年中国人疯了，或出现了整体更年期或什么突发性疾病。而我们仔细加以考察和分析，这是由领导层的偏激认识和奇异的理论导引出的异常现象。

1955年到1956年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竞相提高计划指标，贪多求快，急躁冒进的倾向。针对这种冒进造成的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金融财政紧张，职工急剧增加的状况，周恩来等人提出了压指标，反冒进的主张。但当时的反冒进的口气很缓和，周恩来总理为了不给群众的热情“泼冷水”，在讲话中往往表达出一种既反左又防右的风格。例如，周恩来在1956年1月30日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指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许可范围，不勉强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这一段话，对共产党人来说并非新奇，因为它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对问题的辩证分析的一般方法论。但在实践上，周恩来等中央一些领导人确也采取了限制左倾冒进的措施。从1956年2月开始压了各专业会议上报的计划指标，5月，周恩来指示再不能继续“反右倾、反保守”了，6月，又下马了一些基本建设项目。

然而，对周恩来等人的看法和作法，毛泽东却看在眼里，气在心里，他有另外一套理论在心中酝酿。1958年伊始，毛泽东火山爆发似地开展对反冒进行为的声讨。他在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指责，1956年的反冒进，是一个方针性的错误，它给群众泼了冷水，招致了右派的进攻，使我们的工作受到了很大损失。尤其令人惊讶的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新的定义。他说“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还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在经济建设里面，“真正的左比右好”。当时对周恩来1956年6月20日主持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和李先念在1956年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作为反冒进的错误材料印发，供批判。为了丑化周恩来等人，会上还印发了战国时代楚国文人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认为反冒进的人就像反登徒子的宋玉，其方法论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同时，毛泽东正告，反冒进者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今后不许再提反冒进。

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左比右好”，这些令世界各国共产党人惊奇的理论一出现，在我国国内开始改写马克思主义篇章了。原来向干部普及的关于“世界是物质的”，“客观决定主观”，“正确的认识来源于实践”等观点不仅黯然失色，而且成为大跃进路上的思想拦路虎。为了扫除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仍穿着马列主义的服装，这一年又抬出了马克思的半句话来大肆渲染，这半句话就是“一天等于二十年”。这半句话出自马克思给恩格思信中的一个比喻，认为在革命运动的各个时期，解决任务的速度和效率是不一样的，有些时期运动只能采取缓慢变化的方式，也就是“进化论”的方式，有时候在条件成熟时，可能出现快速完成任务的方式。他这样写道：“在伟大的历史发展中二十年等于一天，虽然以后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

马克思这里讲的“以后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是指在人类实现了共产主义的历史阶段，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改造进入了所谓的“自由”王国，这时，一天所干的任务是过去若干年甚至二十年才能办到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绝不能被认为是马克思的基本理论。类似的话列宁也讲过，列宁曾经说，在十月革命以后，俄国人每做一个月的工作，“等于我们历史的十年，甚至于二十年”。当然，我们也不能把列宁的比喻看作基本理论来加以运用。

在把“一天等于二十年”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的大舆论环境下，甘肃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大显身手了。其中一个著名的论断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办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到，一定能办到”。甘肃省委的主要负责人1958年1月与《中国工人》杂志记者谈话时讲：“紧张是革命的常规，紧张是大大地好事”，同时提出了一个公式叫做“要革自然的命，必先革思想的命”，认为人们改造自然的障碍不在自然界本身和客观的物质条件，而根源在于思想，在于思想上敢不敢的问题，只要思想问题解决了，人都能敢想、敢说、敢干了，改造自然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省委主要负责人的这一“大理论”的感召下，各地区竞相创造新的理论和新的公式。1958年7月，平凉地委在“大革思想命”的口号下提出了一个办事公式，这就是：“要把不能办、不去办、办不到的公式，变为能够办、马上办、办得到的公式”。这些理论产生的一个重大后果是引导人们搞浮夸、说大话、吹牛皮。因为客观的自然条件和物质条件发生变化要经过一个极其艰苦的改造过程，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创造客观条件。如果不承认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而把人们的思想凌驾于自然规律和物质条件之上，那就只能靠空想、梦想和各种大话来解释自己的奋斗目标了。可见，吹牛皮的理论基础是极端唯心主义，甚至是唯我主义。

二、陇上吹牛五花八门

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下，从1958年的第一季度开始，在全国不断掀起了“放卫星”的高潮。6月12日，新华社报道，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放小麦亩产3530斤的卫星，紧接着，6月30日河北省安国县卓头村社又放出了小麦亩产5303斤的卫星。7月2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河南省和平农业社亩产7320斤的卫星。随之又有广东番禺县亩产100万斤蕃薯的卫星。还有些科学家预言，如果利用好太阳的光能，稻麦亩产可能达到40000斤。除农业上的卫星外，工业、科教文化等领域都有许多卫星。在全国大吹牛的背景下，“陇上儿女”也不甘落后。从1958年春天起，甘肃各地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大卫星、大牛皮。其类型大体上有如下几种：

1. 思想要上天

1958年全国流行着一首人要上天当玉皇的民歌：“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甘肃的一些人藐视天廷，想当玉皇的愿望同这首民歌所表达的一样强烈。从省委到各地县委，以及民间百姓都竞相编造思想要上天的神话，除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外，还有诸如“群众想移山、山走；群众想踏地，地动；只要革了思想命，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人可以让地球服、海洋降，强迫宇宙吐宝藏”。这类上天入地的豪言壮语曾铺天盖地笼罩陇原大地。

2. 人能成神仙

1958年，在甘肃出现了许多人能成神仙的口号、谚语和事件。当年的《甘肃日报》和各地的小报都不断公开报道了人成仙的谚语、口号和所谓“民歌”。有一首发表在《甘肃日报》上的民歌这样讲：“手执钢锨驾火箭，驾起青龙上云端，三山五岳听我令，玉皇下马我上鞍”。当年，《甘肃日报》还报道了一位哑巴

变成文化战士的奇迹，是采用顺口溜的形式来报道的：

“各位父老听我言，
有件事儿把它传。
临洮县的店子川，
东行五里宋家山，
有个哑巴羊世忠，
他是扫盲英雄汉。
他虚心学来苦心练，
一字一句记心间，
时间没过两月半，
识字已经过一千，
他会写来又会用，
文化战线走在前。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
今天哑巴开了言，
甜水吐出比蜜甜，
你看稀罕不稀罕，
党的恩情万古传。”

我们打开甘肃省内各地的报刊，或翻阅一下当年的各种文艺作品，不少“艺术品”多讲牛郎织女下凡来，看到陇原大地比天宫好得多，还有陇原儿女到月宫与嫦娥欢庆放卫星的情节，嫦娥已后悔当年奔月的行为，而很想返回大地，下凡在董志塬或河西走廊参加大跃进。

3. 产量无限翻

1958年的大吹牛在农业和工业产量上表现得十分可怕。1958年7月23日新华社暴出了惊人的消息：“中国夏收作物空前丰收，小麦总产超过美国。”在夏收前后，甘肃的各个地区也竞相发出农产品放卫星的消息。榆中县来紫堡实验田放出了高产

3283斤的卫星，过了七天，这个社又放出了一个小麦亩产4000斤的卫星。8月份甘肃省的领导提出了一个亩产无限的响亮口号：“土地潜力无穷无尽，亩产多少事在人为”。紧接着，在全省各地出现了亩产5000斤到10000斤的若干卫星。康乐县宣布，全县人均粮食已达到2000斤，临夏宣布，全地区1958年平均亩产已达到了5000斤。在工业上，全省放出的卫星更多，1958年元月，兰州市就宣布，五年内总产值要增长9倍，郊区要达到乡乡有工厂。1958年7月，静宁县介绍了如何变成万厂县的经验，宣布半年已建成了13422个工厂。当然，甘肃的农业卫星比外地有些放出的卫星稍逊色，例如河南在8月份就出现了玉米亩产12800斤的卫星，湖北辰春社放出了中稻亩产43869斤的卫星。然而，工业的卫星，甘肃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甘肃省有关部门宣布，到1958年的6月，全省的厂矿数猛增到220000个，全省出现了10多个万厂县、20多个千厂乡、50多个百厂社。

4. 赤手可移山

1958年，甘肃大浮夸的一个理论就是“人手论”，认为每个人都有两只手，这两只手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够改天换地。7月9日，《甘肃日报》发表的一首诗，对人的双手作了高度赞美：“英雄渠，工程大，过黄河，穿石峡，我们民工有双手，什么困难都不怕。”1958年8月31日的引洮工程表彰大会对人的双手更赋予了神奇的力量。其口号是“鼓足干劲，山动弹；铁臂一挥，水上山。”当年有一篇在《甘肃日报》发表的《谈干劲》的文章，认为干劲就在于：朝气蓬勃，生龙活虎，排山倒海，乘风破浪，无坚不摧，无攻不克，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道。

5. 一天等于二十年

1958年，以至1960年甘肃把“高速度”的口号喊得惊天动地，各条战线都出现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秦安县从1958年1月就宣布，在一年内实现五化：水利化、绿化、地堰

化、山地步犁化、良种普及化。平凉地区有关部门宣布，1958年1月，平凉已出现了800条幸福沟，所谓“幸福沟”就是把原来破烂不堪的水沟水渠变成花草树木遍地的新园林。定西1958年7月份宣布，全专区已变成无盲区，人人都成了文化人。1958年1月，兰州大学的领导宣布，苦战五年建成共产主义新兰大。1958年1月17日，省委作出决定，对所有的规划都要高速度完成，其口号是：“十年规划，五年完成，三年指标，一年达到。”1960年初，甘肃已出现了全面饥饿的状态，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并没有停下来。《甘肃日报》发表社论说，“为实现今年更好、更全面的继续跃进而斗争”。在全省要掀起“一跨、二革、三超、四比、五成”的运动，要求全省人民都要“立跃进思想，抓跃进措施”。

6. 世界我为先

1958年开始，中央提出十五年赶上英国，后来提出“赶上英国不需要十五年，可能是三四年”。“七年可赶上美国”。而在甘肃，“超英赶美”的口号喊得更加响亮，在1958年7月份，兰州市和白银市都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活动，口号是“誓把英国远远地抛在后面”，报道了甘肃压倒英国的许多“巨大成果”。其中有：“七一”前夕，甘肃农具制造厂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自燃汽油机；白银市建筑单位用废橡胶试制成功的橡胶沥青除苏联以外，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不会制造；兰州市石油公司制造的三用自行车不仅在陆上水上行走，还可在二三百公尺高的空中飞行；兰州大学化学系的师生试制成功的140种新产品中，其中有八种贵重化学药品已压倒了英国，正在试制的三百余种产品要誓把英国远远地抛在后面。当然，超过英国的产品不只这些，当年超过美国的产品在甘肃也是不乏的。

三、吹牛吹出了大灾难

人们常说的浮夸、弄虚作假和吹牛皮，其含义有相同之处，

都是属骗造专家为了窃取某种职位或利益而进行的造假蒙人行为。但浮夸、造假和吹牛三者之间，吹牛可算造假蒙人行为的“最高”层次。浮夸，是把小的说成大的，少的说成多的；弄虚作假，是以假充真来蒙人；吹牛则是不顾任何客观事实，而纯粹海阔天空地乱吹胡诌了。我们的分析表明：1958年的吹牛同1960年的大饥饿成正比，那个地方吹得越凶，那个地方的灾难越重，死亡人口也越多。甘肃吹牛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结论。

1. 吹牛吹得农业大崩溃

1958年的大吹牛给甘肃农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由于在农业单产上大吹牛，号称出现了千斤亩，万斤亩，10万斤亩，从而使各地干部群众出现放弃对大面积作物经营的倾向，千军万马在制造的“卫星田”上作文章，认为种好几亩“卫星田”粮食也多得吃不完，何必在更多的地上吃苦呢。当年夏收时，许多地方的小麦和夏粮无人抢收，腐烂在地里，秋天洋芋毁在地里的更多。据粗略统计，1958年甘肃有占耕地面积25%的庄稼毁在地里，无人问津。

农业上吹牛的另一后果是高征购，挖空社队粮食。既然每个社队报表的产量都是成倍增长，那对国家的贡献也应成倍做出，于是就普遍开展了高征购。甘肃1958年估产185亿公斤，后来修正为120亿公斤，其实丰收的1956年甘肃总产才38亿公斤，1958年实际低于这个数字。但1958年、1959年都在连年提高征购指标，1958年征购入库占粮食总产量37.5%，1959年征购入库占总产的47.6%。实际人均占有粮不到100公斤，但省委宣布1958年人均有粮780公斤。在有些地区和县社，农民的粮食实际60%的被征购了，到1959年已空空如也。

农业上吹牛的另一后果是放开肚皮吃饭，刮粮食共产风，造成巨大浪费。甘肃在夏收以后，到处传达毛主席视察徐水县时说的一句话：“一天吃五顿也行嘛！”于是在一些地方无控制地用

粮，尤其是一些地方还设立了大路食堂，供过路人吃饭。当然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早日到共产主义”。山东范县1958年率先建立了“道路上的饭铺”，以显示已经到了共产主义。毛主席在1958年12月还肯定了马路食堂。毛主席在对陈寿著《三国志·张鲁传》写的批语中说：“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

表面上大吹农业卫星，实际上农业生产大滑坡，大伤元气。据统计，到1960年甘肃“继续大跃进”的年头，农业总产值只有1957年的67.62%，同期，粮食减产了36.45%，油粮减产了52.76%。

在农业大滑坡大崩溃的状态下，出现了陇上大地的“大饥饿大死亡”。那个1958年号称人均有粮2000斤的定西地区，人口死亡率升到23.58%，有5万多人死于饥饿。号称1959年全区亩产5000斤的临夏地区，1960年人口死亡率上升为19.61%，有万余人死于饥饿。那个号称1958年建了13000多工厂已经完全工业化的静宁县，1960年人口死亡率达到25.82%，实际死于饥饿者约8000余人，出现了多起“人相食”的怪案。曾生产出一只豇豆重达70斤的文县，生产出一只黄瓜重达60斤的陇西县，生产出一只辣椒重达4.5斤的兰州雁滩乡，一棵杨树上嫁接苹果产量达千斤的武山洛门镇，亩产洋芋16万斤的礼县，无一免遭饥饿煎熬。这时，高产卫星一个个不见了。由于大吹牛，甘肃人口从1959年到1961年减少90余万，约百万人死于饥饿。

顺便说一下，就是在大饥饿大死亡的悲剧裹挟甘肃大地时，陇上高层领导也忘记不了吹牛。1960年1月8日《甘肃日报》谎称：“在公社化后的短短一年内，全省一万四千四百五十九个生产队，普遍赢得了增产增收的巨大胜利。原来的富队更加富裕；原来的四千一百六十五个比较穷的队，已经摆脱了贫困面貌，跨进了富队行列”。

2. 吹牛吹得经济结构大失调

吹牛的年代，在经济领域不是吹平均号，而是有些领域泛泛吹，有些领域则重点吹，有些领域则大吹特吹。1958年11月，毛泽东在郑州工作会议上重申了“三大元帅”、“两个先行”的主张。“三大元帅”：一为粮，二为钢，三是机器。毛泽东的本意是以极大的勇气开始纠正“三面红旗”招引来的太多的问题和矛盾，纠正两个急于过渡，但他却不愿放弃继续进行大跃进的初衷，以致造成了比纠“左”还“左”的“左”。农业上的粮食元帅怎么升帐，主要靠高产卫星。工业领域的钢铁元帅的升帐靠全民大炼钢和高指标的鼓动，至于机器的升帐，主要靠想像的奇迹来实现。引起经济结构严重失调的是“钢铁元帅”。中央为了向英人挑战，不断修改钢铁指标。1957年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原确定5年内把钢的产量增加到1200万吨，这已经比八大二次会议的指标提高了许多。而到1957年11月底批判右倾保守之后，则把1958年钢的年产量确定为610万吨，1958年3月则把钢的产量定为624.8万吨，1958年5月份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这个指标是不够的、保守的，于是就把指标提高为1070万吨（或1150万吨，宣布为1070万吨）。

甘肃省在落实“钢铁之帅”升帐的目标上是一马当先的。省委于1958年9月4日要求全党全民紧急动员、大炼钢铁，宣布当年要生产30万吨铁、10万吨钢，而口号是“一斤也不能少，一天也不能迟。”当年甘肃动员了60%的劳动力参加大炼钢铁，许多县参加炼钢的人员都在10000人以上。报刊上连篇累牍地报道出铁出钢的“胜利消息”，连那些没有铁矿的县也组织“远征军”到数百里外去炼铁。如宁县动员1.2万人，8700辆架子车，到数百里外的华亭县去炼铁；秦安、礼县组织1万多人到徽县炼钢铁；山丹、永昌等县在城墙上挖洞装矿石点火炼铁，装一“炉”就上报出铁5000吨。省、地、县各级干部走出办公室在球

场、后院建炉炼铁；大、中学校师生停课炼钢铁；解放军分赴各地支援地方炼铁。按照这种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大炼钢铁，实际上炼出的90%以上是废渣，废料，成千上万吨煤碳烧毁在各种形式的土高炉中。与此同时，还掀起了收缴废铜烂铁的运动，农家的铁镐、门环、铁铲、镢头之类的金属品一扫而空，用来弥补炼钢的成果。全民炼钢的结果引发了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调，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被抽光，轻工业日用品的生产被严重忽略，而“钢铁元帅”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从而整个1959、1960、1961年出现了各种消费品和生活必需品全面紧张的局面，不仅粮食奇缺，连肥皂、铁镐、铁铲、纸张等各类日用品都供不应求或中断了供应。

3. 吹牛吹得社会财富和人力资源大耗损

1958年以来，由于严重的浮夸风和吹牛皮，从而造成了社会财富巨大浪费，仅甘肃煤碳的浪费就超过100余万吨，而由于放卫星，忽视对农田的经营管理，竟使近一半农作物毁在田间，还由于为了炼钢拆城门，拆庙宇，拆各种建筑物也造成了数亿计的财富的损耗，尤其在全省各地布建的各种幻想工程更是白白把社会财富填进了无底洞，仅引洮工程一项就浪费了国家1.5亿元的投资，白白花费了6000多万劳动工日。

从1958年开始，对人力资源的浪费更是惊人的，经常开展百万人上阵炼钢，百万人上山修水利，百万人在田间除四害，一切生产和非生产活动都采取军事化的组织方式，取消了人们自觉自愿进行生产经营的一切方式，成千上万劳动力被驱使干那些毫无价值和效率的劳动。整个劳动战线和劳动过程对干部群众采取高压甚至暴力手段，对参与这些运动不积极的人往往要扣不同的政治帽子。从1958年到1960年12月，全省有24万名工人、农民和学生被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和被戴上其它政治帽子。有4万名干部遭到严重的迫害，戴上了不同的政治帽子。武都县

1959年就反映，当地干部采取军阀作风对待社员，经常任意打骂，不给饭吃，有个生产队从元月到3月连续死亡27人，有的是饿死，有的则是被干部打伤且经常扣饭而死亡的。1957年甘肃省人口死亡率为11.16‰，1958年则上升为21.42‰，死亡率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的折磨和政治运动的迫害。当年因饥饿致死的人是不多的，1959年人口的死亡率为17.48‰。当年的高死亡率除了因饥饿致死者外，还有一部分是死于过度劳动和政治运动。1960年甘肃人口死亡率升为41.69‰，人口总数减少了336000人，这主要是由于饥饿所致。这些劳动力资源的损失，甚至生命的殒落不能不说与1958年以来的吹牛有直接关系。

四、不要忘记吹牛的教训

1958年的吹牛是空前绝后的，这种吹牛一直吹到1960年底才有所觉悟。然而不是党内的人都赞同吹牛的，就是在1958年的吹牛高潮中，胡耀邦同志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在1958年第二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报告中就反对吹牛。他说：“敢想敢说敢干既然需要和实事求是结合，也就要求我们必须养成谦虚谨慎的优良品质，科学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只有那些永不自满，不断前进的人，才能在探求科学知识的道路上做出更大的贡献”。

1959年我们党内对浮夸和吹牛造成的恶果认识清楚的人就更多了。1959年7月4日刘少奇在庐山会议上作了如下的发言：“去年大跃进，吃了前年的库存，预支了今年。凡事不要轻信。要有办法使人不说假话。一股风批右倾保守，拔白旗，使人老在帽子的威胁下，说老实话的人，去年不好混。领导看好的多，估计偏高。去年二类苗比一类好。红旗队低产，白旗队高产。十一、二月大吃大喝时，老农已提警告：今年不可乐观。大家挨饿给武汉调粮，去年的错误，对经济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决不可小视。”

但可悲的是，1959年庐山会议的后期，又把反左转为反右，说

老实话的人又遭到了攻击和批判，而浮夸和吹牛者又光彩了起来，自此以后，浮夸和吹牛风又在继续上演，党和人民的事业因为浮夸和吹牛而受到的损失是难以估计的。

大吹牛的 1958 年，离我们已经有 43 年了，但是 1958 年的浮夸和吹牛所形成的作风却阴魂不散，至今国内许多地方曾出现所谓“数字政绩”，也就是编造的政绩和吹牛的政绩。近在眼前的事例是《人民日报》2001 年 3 月 1 日报道：四川剑阁县六个乡镇的领导为了创政绩，竟在数字上弄虚作假，上报的猕猴桃、优质梨种植和毛兔存栏数分别夸大了 63%，47%，80%，其中武边镇实际只有 51 只兔子，却上报为 158 只，田家乡只有 13 只兔子，却上报为 300 只。据报纸披露，还有一个贫困地区还放出了一系列“数据卫星”，粮食平均亩产 1875 公斤，每亩鱼池产鱼 4.6 万公斤，谎称全乡人都脱贫，人均收入 2200 元。当人们问这些乡村干部为什么要编造这些数字时，他们的回答是：“我不说大些过不了关，甩不掉脱贫的帽子。”浙江湖州国有企业双林酒厂累计亏损 4000 万元，该厂厂长却虚报利润表，谎称年年盈利，骗取了 19.9 万余元的奖金。虚报浮夸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俯首皆是。例如，在人口统计上，为了取得计划生育的先进单位，一些干部就编造所谓“一孩率”、“节育率”、“计划生育率”等方面的指标欺上瞒下，仅广西省 1990 年——1998 年因弄虚作假竟有 76.77 万人漏报出生户口。全国浮夸和吹牛的情况经常发生，陇上人家的情况也并不乐观，笔者曾走访过几个甘肃的小康村，竟发现村内有大量贫穷人口，有的人家流亡在外多年没有归乡，村干部也不知道这些人的去向。我们还走访过号称有百万产值的乡镇企业，有的企业已多年停产，只留有一个看门人守着几间厂房，但在上报的材料中却被描绘为当地工业发展的一面红旗。因此，中国人永远要汲取 1958 年的经验教训，一不注意，浮夸风和吹牛皮的闹剧会再次上演。

陇上公共食堂的兴衰

“共产主义是天堂，
人民公社是桥梁，
公共食堂是心脏。”

这是1958年至1961年流行于甘肃各地的三句话，不少公共食堂的墙壁上都写着这三句话。在公务场所办集体食堂的事古已有之，何以1958年以来，竟把公共食堂抬高到“心脏”的地位。从这个时期过来的人，对这个“心脏”是畏之如虎的。这里对1958年至1961年间的公共食堂作些考证。

一、陇上公共食堂的兴起

去过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参观的人，都知道五、六千年前，在大地湾一带生活的原始居民都在一个大灶周围吃饭，这可以算是甘肃最古的公共食堂。私有财产和单偶家庭出现以后，人们就一家一户吃饭了，这是人类生活方式进步的表现。这种历史上沉淀下来的进步，到大跃进年代显得十分“落后”了，不革它的命就是一种非常背理的态度了，从而铺天盖地的公共食堂就出台以取代那数千年一贯制的吃饭方式。

公共食堂在甘肃的兴起同在全国的兴起是同步的，而全国的公共食堂不是独立出现的，而是人民公社出现的伴生物。

1958年3月，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就主张把小型农业合作社变为大社，会后掀起了并社的热潮。到同年8月，有些地方把几个小社并成大社称为人民公社，农村中出现的这一所谓“新事物”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和支持，报纸上出现了毛主席说“人民公社好”的庄严号召。在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上正式作出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甘肃省闻风而动，省委于同年8月16日向全省

发出了建立人民公社的通知。公共食堂作为生活集体化的重要标志，也在8月份开始组建，办食堂的速度是十分迅速的，甘肃的每个县差不多都在一月之内办起了1000个以上的公共食堂。例如通渭县1个月建立公共食堂2759个，平均每个生产队有201个食堂。据统计，甘肃从1958年的8月到10月三个月完全实现了食堂化。

办公共食堂伊始，就把它作为一个政治原则来对待。因为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就把食堂作为人民公社生产和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决议”中对食堂的要求标准是很理想化的，其中这样讲：

“要办好公共食堂。要保证所有的社员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干净卫生，并且适合民族习惯和地方习惯。公共食堂要有饭厅，要经营好菜园、豆腐坊、粉坊、酱园，要养猪羊、养鸡鸭、养鱼等。饭菜要多样化，要有味道。要同营养学家商量，使食品当中包含有生理上必需的热量和养分。对老人、小孩、病人、孕产妇和哺乳的母亲，在伙食上要给以必要的和可能的照顾，并且允许某些社员在家做饭吃。公共食堂要实行管理民主化。食堂的管理人员和炊事员要选择政治上可靠的人员担任，最好经过民主选举。”^①

这段话对农村公共食堂的要求和希望是很美好的，如果食堂真如此的话，那就是天大的好事，人们会真正感到食堂是上“共产主义天堂的梯子”，可悲的是在当时物质财富极为匮乏的中国，对食堂提出这样的要求完全是一种“虚拟的经济”。事实上全国几乎没有一个食堂有如此的生活水平，而甘肃的经济条件更为恶劣，不可能做到“吃得饱”、“吃得好”。至于要建立粉坊、豆腐坊、酱园之类的事，是需要以粮食为基础的，在粮食断绝的情况

^① 见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58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决议，各报均转载。

下，要食堂搞这些以粮食为原料的副食品生产那简直是“缘木求鱼”。关于同营养学家商量要农村公共食堂的食品有必需的热量和营养成分，这是离开农民实际十万八千里的空洞高调。在农业遭到破坏，粮食日益短缺，公共食堂以瓜代菜，以树皮、树叶和草根为食的情况下，冒出一位营养学家在饥民面前讲食品的热量，那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关于对老人、小孩、病人、孕产妇和哺乳母亲的照顾，在现实中是完全相反的。二十世纪60年代的死亡统计中，恰好这类人是最先饿死的，因为在一个粮绝物尽的环境中，人人面临着饿死的威胁，尊老爱幼、扶弱济困这些道德格言是苍白无力的。当然，在大饥荒年代确实也出现过一批冒牌的“营养学家”，这就是那些鼓吹“增量法”、“代食品”以及老鼠洞可找粮的人物。

开办公共食堂的过程实际上是对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破坏的过程。普遍的作法是在村里确定一个房屋较多的人家，把他的房子打通，挖掉土灶，把原来的锅灶和设备也都铲除，再找几个大铁锅和简单的灶具一安放，公共食堂就此定案。紧接着把千家万户的小铁锅小铁铲收集起来放在炼铁炉里熔化，以增加大炼钢铁的指标。同时又把许多人家集中在一户人家的房子中去居住，这些人家的原住房或挂托儿所的牌子，或挂敬老院的牌子，或挂什么工厂的牌子，农民家户饲养的鸡、猪、羊被集中起来，作为公共食堂的副食，供集体享用，不到月余宰杀尽净。农民种植的树木归集体，很快砍伐作柴烧，自留地的蔬菜也被集体共产。食堂一开办，农民的自留地、自留畜和其他财产一夜之间化为公产，农民自我经营的积极性丧失殆尽，连农民如何过日子的权利也被公共食堂吞灭。

甘肃的公共食堂从开办那天起就有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的问题，大体上存在如下几个特点：

1. 低标准、瓜菜代。甘肃1958年的粮食丰产都是吹起来

的，实际上社社都缺粮，因此在食堂开办的时候曾提出过“放开肚皮吃饭”，但多数社队不到一、两月就发生了粮荒，因此很快就把食堂的定量标准降在了1斤以下。就是在1958年，有些地方的公共食堂在年底就发生了断粮现象。例如甘肃的徽县在1958年12月份，一些农村就断粮，浮肿病蔓延。当时统计，因浮肿而死亡者744人，该县的石柱、江洛等八、九个社的人因缺粮而吃树皮、草根，食堂只能供应大锅清水汤，后来连清水汤也不能供应了。到了1959年，全省食堂的定量标准基本上都在半斤以下。到1960年连半斤的标准都维持不了，有些食堂的标准降到名义上的二两，有些食堂干脆关门，让农民自生自灭。

2. 大机构、大舞弊。当初办公共食堂的理论是解放妇女、节约劳动力，但实际上开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一个劳动力浪费和营私舞弊的过程。一般一个公共食堂都要有七、八个做饭的强劳，还有四、五人要专职搞柴草和燃料，还要设保管粮食的保管员、算帐的会计员、主持食堂事务的管理员，另外还要抽出一部分劳力搞所谓养猪、种菜的副业。据甘肃平凉地区在事后的统计，有些村20%的主劳都放在了公共食堂上，在困难年景，公共食堂是个肥缺，人们都想挤进食堂占一个岗位，混个饱肚子，然而食堂用人的标准是有倾向性的，一般是队长支部书记及其亲属兼管理员和会计。其它食堂工作人员也是从乡村干部有亲戚关系的人中挑选。在这类办公共食堂的大军里多有营私舞弊多吃多占现象，在浮肿病人和死亡者的队伍里，队长、管理员及会计是不占位置的。

3. 大浮夸、大压制。在3年多的农村公共食堂的历史上，一直存在着浮夸和弄虚作假。当时，绝大部分食堂不顾群众的饥寒交迫，不断虚报食堂生活上升的成就，甚至把野菜烂菜装在口袋里，放在食堂的储藏室里，给检查团谎称是待用的面粉。有些生产队尽管猪、鸡杀尽了，群众连肉的影子都见不到，但食堂管

理人员和社队干部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往往要绞尽脑汁，从其它村子借来几头猪或几只鸡放在食堂的院子里，以示群众的“丰衣足食”。甚至把吃食堂期间浮肿、饿死人的现象说成是“地富反坏右的捣乱”。群众在吃公共食堂的过程中充满着血和泪，生产队长、支部书记和管理人员贪污浪费了粮食，群众怒而不敢言。许多地方的食堂动不动采取扣饭、罚跪、捆绑、抽打等方式来对待有不满情绪的社员。当时甘肃临夏的群众就称公共食堂是罚庭，食堂成了惩罚社员的中心场所。

二、陇上挽救公共食堂的大表演

在甘肃，农村公共食堂从开办的那天起，就滋生了许多灾难，人民群众一片怨声。例如，1958年到1961年期间的“共产风”就是在开办食堂中加剧的。既然在一个大锅里吃饭了，还讲什么社员个人的财产和收入呢，一切财产交到集体共吃共用。以泾川为例，全县平调（也可称共产）的总值达当时价格计算的1400多万元，其中土地10000多亩，房窑73000间，牲畜4400头，农具69000件，粮食46万斤，现金86万元。特别是大炼钢铁中把农民的4万多口锅变成废铁收缴，投入土高炉中。还在“消灭家庭”的口号声中，搞什么生产、生活军事化，住居大换班，大搜大查，翻厢倒柜，封门扭锁。被查出的东西包括自行车、皮袄、金银、鞋袜全部归公，农户真正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为了活下去，只好盯着公共食堂，过度日如年的生活。^①

甘肃从1958年开始，粮食产量存在大浮夸。据1960年12月省委新班子对张仲良的旧班子揭发，1958年粮食产量公布为222亿斤，后来说是200亿斤，最后定为180亿斤，1959年秋天落实为120亿斤，1960年落实到110亿斤，浮夸了一倍。1959年粮食产量提出400亿斤的口号，后来怕吹牛过大，降为370亿斤，再

^① 《泾川县1960年8月30日给省地委和西北局的报告》，原件：甘肃省档案馆91—10—338卷。

修定为 270 亿斤。粮食产量越核越少，口粮安排过低现象陆续扩大，大部分地区在 6 两以下（16 两为一斤）。

由于粮食极其短缺，从 1958 年春天起，甘肃一些地方就发生外流、浮肿病和死人现象。1959 年、1960 年发生问题的面越来越大，情况越来越严重。1960 年 12 月 9 日中央西北局“关于讨论甘肃工作问题向中央的报告”中称“当前人民生活严重困难，几百万群众处于饥寒交迫状态，肿病死亡现象还没有停止，农村生产受到严重破坏”。^①原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向中央的检讨中也承认“农民遭到很大损失，伤了元气，大量死人，妻离子散，绝了后代”。^②在这种惨痛的背景下，食堂该是收场的时候了。但不然，这一荒诞的“新生事物”却一直在陇原谋求长寿。在食堂关门，断炊数月，大量农民逃亡，浮肿和饿死加剧的情况下，陇上的领导层，仍然要高举公共食堂万岁的大旗，千军万马为鼓吹公共食堂，挽救公共食堂而奔忙。

怎么挽救呢？

大唱公共食堂好的赞歌，大造食堂是社会主义命根子的舆论为手段之一。

1960 年 12 月 14 日，有位作者配合政治形势写了一首《赞食堂》的诗，其曰：

人民公社象初升的太阳，
公共食堂闪耀五彩的虹光，
亿万颗心迎着太阳的光芒，
赞歌喧腾在每一个城镇村庄。
公共食堂是幸福生活的家，
它把幸福种子在人们心田里撒下；

^① 1960 年 12 月 9 日《中央西北局关于讨论甘肃工作问题向中央的报告》，文件收入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甘肃农业合作制重要文献汇编》第一辑。

^② 《张仲良同志在西北局书记处会议上的检讨》，原件藏甘肃省档案馆，编号：1—办 1—2—640。

它卸下了妇女身上几千年的重压，
摆脱繁锁的家务奔向集体化。
万岁，我们亲爱的党！
致敬，我们的红管家！
办好食堂促生产，
生产指标跨上了千里追风马。
公共食堂是一朵跃进的鲜花，
花红千里飘香万家；
社会主义阵地一天天更加坚强，
红色的土地上结出了灿烂的金瓜。

在数百万人饥寒交迫，一些人还可以在食堂喝些稀糊糊，很多农村食堂已经关门，大批人死亡的情况下，有人竞写这类诗，高唱“公共食堂是一朵跃进的鲜花”，令人齿寒。

保护食堂的舆论除了赤裸裸编造赞歌外，就是从省委、市委、县委到公社党委下发“巩固”、“办好”食堂的文件。把食堂提到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来认识，把对食堂的一切“诽谤”看成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视为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挽救食堂的第二种手段是抓典型，搞所谓典型引路。甘肃省当时抓了很多“办好”食堂的典型，各县社层层都在抓典型。《甘肃日报》1960年12月报道的庆阳县董志塬公社周家庄生产队就是省里抬出的典型之一。该生产队的经验是：干部亲自抓食堂，选好干部办食堂，腾出生产队用的好房子办食堂，贯彻计划用粮，节约用粮，节约归己政策。周家庄的经验只在选办好食堂“娘家人”，评选食堂模范，每半月检查一次，把66间房子腾出，以及把稀的做稠等形式上谈问题，而丝毫没有触及到该不该增加口粮标准，粮食又从哪里来的问题，无非仍在无米之炊上给人上

政治课。^①

第三个手段是抓管理。食堂处于奄奄一息状态，关键在于生产遭到破坏，农村没有粮食所致。但这时期的领导层不能作这样的论断，而要从管理上找原因。于是，甘肃省层层开始抓食堂的管理问题。地方报纸连篇累牍报道抓公共食堂管理的典型。1960年12月4日《甘肃日报》报道了甘肃清水县龙山公社榆树生产队采取多种措施加强食堂管理的经验。其经验主要是组织生产队辅助劳力开荒、种菜、养殖，“发展家底生产”。同一天《甘肃日报》又报道了靖远靖安公社“公共食堂大家办，群众生活群众管”的经验。其经验内容有：管家队伍最重要，心红手巧办法多；种菜养猪种饲料，家底雄厚生活好；食堂用粮巧计划，先算后吃水长流；大家的事大家办，群众生活群众管；执行政策是大事，解除顾虑节约粮；改革灶具讲卫生，食堂干净喜人心；政治到食堂，干部下伙房。”^②

看来，这个生产队的经验是全面的，但依然不能解决没有粮食怎么办好食堂的问题，安西县委也推广了他们的经验，就是从县、公社直到生产队由“党委书记挂帅，以办好食堂为中心，全面安排人民群众衣、食、住的问题”。天祝县清河大队推广了他们在食堂推行“五定三包一奖制”的经验。五定是定人员、定标准、定土地、定牲畜、定制度。三包是包产、包工、包投资。一奖是办的好的食堂要奖励。中共酒泉市委也系统推广了他们的经验，其要点是：

“城乡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是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实现生活集体化的中心环节。无数事实证明，要办好食堂，就要加强党的领导。中共酒泉市委组织厂矿、企业、机关、学校、部队等单位，分片包干，帮助群众办好食堂的作法是很好的，这是

^① 1960年12月14日《甘肃日报》《周家庄生产队食堂的经验》。

^② 见1960年12月4日《甘肃日报》报道。

进一步加强党对食堂领导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措施，是迅速把食堂办好的一个创举。”^①

临夏市全力推广陈井公社杏树庄生产队的经验，其经验要点是充分发动群众，以食堂为单位，一个个检查，一个个落实，全面安排好食堂用粮、蔬菜和燃料等，扎扎实实安排好社员生活，保证兵强马壮，迎接明年春季生产。这个生产队特别强调，在安排生活时，要大张旗鼓地宣传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今年抗旱斗争中显示出来的无比伟大的力量，用回忆对比等办法，加强对社员的思想教育，调动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办好食堂的积极性。^②

综上所述，甘肃省在二十世纪 60 年代为挽救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是下了大功夫的。但不论采取怎样的措施，因为粮食匮乏，仍然无济于事。而且在挽救食堂的诸多措施中多为突出政治措施，什么党委书记下食堂，回忆对比，发动群众，大力宣传三面红旗等等，都是脱离物质财富的多寡与有无而进行空洞说教，因而不可能解决群众的疾苦问题。

三、公共食堂的消亡

1958 年甘肃就出现饥荒，1960 年甘肃省饥荒达到了最高点。据后来甘肃省统计局与公安局公布的资料，当年人口死亡 538479 人，死亡率高达 41.69‰，人口自然减员 336097 人，人口自然负增长 26.02‰。各地粮食断绝，人口外流和大量死亡的情况十分严重。

通渭县在《关于通渭的历史教训》中这样描述 1958 年以来当地的粮荒状况：

“大计划、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上面逼、下面吹、弄虚作假，以致人口大量死亡和外流。1958 年粮食计划亩产 200

^① 见 1960 年 12 月 4 日《甘肃日报》报道。

^② 见 1960 年 12 月 26 日《甘肃日报》报道。

斤，总产 3.8 亿斤，实际亩产 61.5 斤，总产 11576 万斤，而上报为 2.6 亿斤，征购 4360 万斤，实入库 4154 万斤，占总产量的 36%；1959 年计划亩产 140 斤，总产 2.4 亿斤，实际亩产 49 斤，总产量 8386 万斤，而上报为 1.8 亿斤，征购 5400 万斤，实际入库 3958 万斤，占总产量的 47.2%。由于产量逐年下降，征购任务逐年增加，实际上两年没有给群众分配什么东西，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坏，人口外流和死亡一年比一年严重。早在 1957 年征购粮入库中，有些地方的粮食就已经很紧张，动员群众卖陈粮，吃陈粮，只分现金，不分粮食。1958 年春季，碧玉、第三铺、义岗等地就发生了人口外流和死亡现象，到 1959 年情况就更严重了，当年冬季，全县 162 个大队中，有 102 个大队三个月没有给社员打过口粮，有些地方社员 40 天没有吃到粮食，以草根、衣草、树皮充饥。”^① 由于粮食极度短缺，群众对食堂无法依赖了，于是就出现了抢偷粮食之风。

甘肃省公安厅党组和兰州铁路局党委 1960 年 12 月 7 日给甘肃省委的报告指出：“由于一些地区对群众生活安排存在问题，因此抢夺、拿、偷窃粮食的事件剧增。1960 年 1—10 月共发生 782 起在各火车站抢夺、偷窃粮食的事件。陇西、武威、高台等地，群众生活问题比较严重，流动人员最多，因此经常有数十人最多达到 200 人迂回车站，待机偷窃或抢夺运粮的货车。仅当年 11 月份就发生在火车站偷窃事件 310 起。据不完全统计，仅在陇西文峰、洛门、乌江等 5 个公社、11 个生产大队中，到车站抢夺、偷窃粮食和百货的社员达 1371 人。文峰东普生产队共 74 户，就有 64 户到东站抢夺偷窃过粮食。”

1961 年中央开始组织工作团检查甘肃工作问题，甘肃饥饿的实际情况开始被揭露，张掖地委 1961 年 1 月 15 日反映：“张

^① 引《甘肃省农业合作制重要文献》第二辑，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8 年出版。

掖地区农村人口中发病死亡仍呈上升趋势，1960年底有病人107844人，1961年元月又有新发病人5420人，1960年11月份，死亡5038人，12月份死亡6006人。”山丹县反映：“由于粮食短缺，1960年全县有2200人外流，4000余人饿死。巨联生产队因总支书记虚报有贮备粮食72万斤，实际是空的，结果该队饿死82人。这位虚报浮夸的总支书记被提拔为公社副书记。他还因查产斗争，违法乱纪逼死人命82条。”^①平凉地区在1961年元月11日在给省委的汇报中反映：“最近不少地方的人口外流，疾病死亡，盗粮抢粮以及牲口严重死亡还未停下来，自去年12月以来，不到一月，外流人口达1835人，非正常死亡1100人。到元月10日浮肿病人有11400多人，干瘦病静宁一地就有2300多人。去年11月以后，已死亡大家畜2900多头。”1961年元月20日，张掖地区关于安排群众生活的报告中指出：“西北局会议后，张掖的形势有好转，但粮食仍是严重的；疾病还在蔓延，全区发病人数已达14万人，人口继续死亡。元月上半月，已死4348人。特别是连年发生严重问题的地方，一无蔬菜又无代食品，社员几乎全部躺倒。”

在这种饥饿和死亡严重威胁的背景下，甘肃省已开始批判“左”倾路线，抢救人命。但当时新的省委班子和各地更换的新班子，都对公共食堂的弊病还未认识，无论是甘肃省委向中央呈报的初步检查，还是中央西北局关于甘肃工作问题向中央的报告，都没有提到公社食堂的弊端，也没有解散食堂的任何动议。少得可怜的救命粮，仍然多数拨到公共食堂。

在甘肃，真正揭露农村公共食堂的弊端的事是汪锋同志1961年4月底在临夏调查时开始的。汪锋在临夏新集公社新一号大队对食堂进行了调查，其中一个生产队40户社员190人在

^① 引自《渴望真话—刘少奇在1961年》，珠海出版社1998年9日出版。引自《关于山丹县委扩大会议情况的汇报》，原件存省档案馆91—4—743卷。

公共食堂吃饭，除了一个 50 岁的单身汉表示吃食堂随大家外，全体社员都主张打粮回家吃，停办食堂。汪锋同志给毛主席的报告中写到：

“群众对食堂真是怕极了，恨透了。群众说：‘交朋友交个管理员，吃馍喝汤不作难’；群众说：‘灶事员的肚子，饲养员的热炕，队长，管理员没定量’；群众说：‘勺把子上有刀子’；群众说：‘食堂是饭厅（打饭的地方）、法庭（炊管人员不顾群众困难，甚至打人、骂人、态度恶劣）和花厅（队长、管理人员专找漂亮年轻的妇女作炊事员，就在食堂里乱搞）。’例如，六队队长马培继和食堂管理员拜景义，贪污多占，克扣社员口粮，利用社员口粮诱奸、强奸妇女 13 人之多；1960 年在这个食堂吃饭的共死了 39 人。群众对这件事愤恨最大。这两个食堂确已成为破坏社会主义、阻碍生产发展和党群关系中的疙瘩了。”^① 其实汪锋同志的结论同胡乔木、刘少奇同志的结论是一致的。胡乔木在韶山的调查报告中说：

“公共食堂，多数人不愿意办，据韶山片六个大队统计，一百五十三个食堂，一千一百一十六户中，主张办常年食堂的只有五个，占百分之三点六四；赞成搞公饭私菜的六十五个，二百五十一户，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四；部分人主张、部分人不主张办的食堂十八个，一百五十二户，占百分之十七点四；坚决要求散伙的食堂六十五个，六百七十四户，占百分之五十七点六；在主张办食堂的人中，有不少人是为了应付。这个统计说明，当前农村中的大部分人，是不愿办食堂的。”

而刘少奇 1961 年 4 月 17 日在宁乡天华大队调查食堂后的讲话中明确表示：

“公共食堂是 1958 年 10 月 1 日一声喊办起来的。那时候社

^① 《关于生产安排和粮食调出问题的请示报告》，原件存省档案馆 91—10—350 卷。

员不是自愿的。办了几年觉得不方便，不利于生产，绝大多数主张解散食堂，坚决要散。我们反对、不准，行吗？如果我们仍然坚持，那就是脱离了群众，一切从上级的意图出发，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要看到在食堂问题上，我们同群众的尖锐矛盾，直接影响工农联盟。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不只是靠命令维持的。群众对共产党失掉希望。那是很危险的！”^①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到，各级领导多数对农村公共食堂的严重问题有了共识，食堂是一哄而起办起来的，它并不是所谓社会主义的新事物，而是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假共产主义，食堂成为浪费劳动力和公社粮食及其他财产的主要场所。公共食堂还给一些干部多吃多占，享受特权提供了条件，公共食堂给群众带来了灾难性后果。看来，解散食堂势在必行。甘肃从5月6日临夏新集公社的两个食堂解散开始，一些地方陆续停办了食堂，到7月底，除了个别生产队的食堂尚未解散外，全省百分之九十的生产队都解散了食堂。正如汪锋同志给毛主席的报告中写到：“食堂解散，大快人心”。甘肃农村的公共食堂就这样寿终正寝，它给我们留下了无穷的思虑和教训。

^① 引自《渴望真话—刘少奇在1961年》，珠海出版社，1998年9日出版。

小秋收·增量法与代食品

1959年夏收刚过，甘肃许多地方就粮食告急，饥饿已经笼罩陇原大地。这时有人又“敢想敢干”了，提出了一个刮植被的主张，就是在秋天组织群众到田边沟壑、山坡梁峁采集各种植物的根茎叶以补充食品的不足，甚至认为这就是当然的好食品。其论据是，民国十八年人们早就食用这种食品了，可惜以后人吃饱肚子了，变修了，把这类“传统”丢了，现在要拣起这一“光荣”的传统了。当群众问一位公社的党委书记：“小秋收收什么，山上那些东西人能够吃？”书记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凡牛能吃的人都能吃，人也是动物，有什么了不起。”过去，人一直觉得自己高贵，以为已经脱掉了尾巴，这位党委书记的精彩解释则一扫人的威风，把牛和人放在了同一个圈里，面对这种解释人只好涕笑皆非。

甘肃省的“小秋收”运动也带有“全民性”，除了数百万农民不分男女老幼大刮地皮外，还动员城镇的工人、学生、干部停工停产停学，满山遍野扫树叶、挖草根、拣野菜，抓野生动物。在小秋收的过程中，植被遭受了一次大浩劫，但人们的饥饿问题并没有解决，许多人吃了这些牛的饲草甚至牛也不吃的饲草，活活涨死、毒死。看来，小秋收的成果对挽救饥饿的作用微乎其微。

甘肃虽穷，但一些人蒙骗群众的点子却是不乏的。果然解决吃饭问题的良策又出台了，这就叫“增量法”。“增量法”好比在一张牛身上剥八张皮，要把一斤粮做成2斤、10斤不等的食品。出点子者说这不叫“无中生有”而叫“有中生多”，“是唯物主义，不是唯心主义”。是怎么“有中生多”呢？办法有两种，一

种是挖掘“小秋收”成果，把那些树叶草根和白土之类的东西，在面里多掺些，使“食物”的重量多起来。另一种办法是在水上做文章，在面里大量掺水，让氢二氧一（ H_2O_1 ）在面里去发挥超重的作用。“有中生多”是按发明者的意图实现了，确实不断传出“增量法”的奇迹，竟出现将一斤面做成40斤食品的“成果”。然而，老百姓的胃并未解决问题，依然饥肠咕辘，浮肿、死亡照样有增无减，“增量法”彻底破产了。

伴随小秋收、增量法而来的是“代食品”运动。“代食品”顾名思义就是食品的代表或代理。人没有食品，没有饭吃了，而食品的替身和代表出场了，于是人开始吃“食品的代表”了。

“代食品”在1960年也按政治运动来搞，各级党委一度当作头等大事来抓。甘肃省委1960年向全省发起了开展代食品的运动，地、市、县闻风而动，召开三千会、四千会安排搞“代食品”。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关于对青海代食品问题的报告中批示说：“制造代食品是一件大事，务望抓紧。”^①可见，制造代食品确被提到各级党委的主要议事日程。从甘肃平凉、定西等地区给甘肃省委的汇报看，大部分劳动力都卷入代食品运动。平凉的报告说：“搞代食品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60%以上”。号称全区晒干菜、腌菜共23109000斤，小秋收晒野菜25753000斤，采集野生草籽39545000斤，每人平均18斤。

当时，把搞不搞代食品上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例如，对定西地区的报告中，就点名指责“认识不清”、“有抵触情绪的社员”。通渭县某公社一位生产队长说：“吃饭要靠粮食，靠树叶能顶啥！”靖远菜滩公社的一位社员说：“人是吃饭的，不是吃草的。”榆中县中连川公社的一位生产队长说：“我们这个生产队年年受灾没收成，搞代食品有啥用呢？”这些言论被当作反动言论，

^① 见省档案馆91—9—203号资料，《西北局关于财、粮、贸工作的指示·通报》卷。

当作对代食品运动的破坏来对待。于是乎，就开动舆论机器为代食品唱赞歌。例如镇远县的四干会一致表示，对“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有了明确认识。临洮县在搞代食品运动中，采集野生草籽 662233 斤，干菜 562202 斤，黑燕麦 353414 斤，还出现了从老鼠洞搜粮的奇迹。临洮一社员竟从老鼠洞里控出了 161 斤粮，当然这是粮食，就不是代食品，而堂而皇之地可以说是增产粮食的重要渠道了。通渭县榜乐公社孟川队组织了四个代食品加工组，制成了八种加工工具，每天加工 160 斤代食品，每人每天能吃到二两代食品。编造材料的人还以群众的口吻说：“只要勤动手，饭菜到处有”，说搞代食品是节约粮食，过好日子的好办法。在这种形势下，全省成千上万的饥民被强制扫树叶，挖草根，寻鼠洞，人们的生活变成牛羊的生活，甚至不如牛羊的生活。

不能完全否认代食品在延缓饥饿和死亡方面的作用，但代食品正面作用完全被神化了，在吃代食品的过程中充满着痛苦和眼泪。而百分之九十的代食品根本不是人能吃的，而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的人不得不去吃它，结果非死即肿，尤其儿童肠胃脆弱，死亡的机率更大。至于说代食品“改善了群众的生活”，这是最大的谎言和欺骗。成千上万人死于代食品，人们对代食品是深恶痛绝的。

甘肃省的代食品是粗糙的野草野菜和树叶之类。青海省则弄了一些有生物学和化学常识的人登台为代食品进行“科学”造势。青海省委给中央西北局的报告说，他们的代食品很高级，其中有人造肉、小球藻和链孢霉，含有脂肪、蛋白质，可做饼子、花卷，味道香鲜可口。并且宣称人造肉在西宁每日可生产 40—50 斤。青海省机械厅宣称有 183 个浮肿者，吃人造肉 7 天后，146 人消肿，农垦厅职工医院给 15 个浮肿病人用小球藻浓缩液，21 天后，浮肿消退，血浆蛋白增高，基础代谢升高，精神食欲好转，等等。青海的这些代食品专家说的人造肉、小球

藻、链孢霉之类，同近几年农村人工培植木耳、菌类食品具有相似之点，但现在的条件和技术水平是1960年无法比拟的，而目前上市的菌类食品是副食品的一种，并不是代替粮食的。青海省推广宣传的所谓新代食品又说是食品，可以“改善生活”，又说是“培养液”可以治浮肿病，到底是什么东西，说不清楚，不过是宣传而已。笔者近期对青海省当年吃人造肉、小球藻的情况询问过老干部，他们异口同声说：那是为配合政治运动骗人而已，这类东西丝毫没有起挽救青海人性命的作用。1961年抢救人命开始后，青海的代食品神话也就收场了。

在回顾60年代代食品运动时，我们沉痛地感受到，人毕竟是人，如果一到灾年，不是把人当人看，通过调运、进口、生产等方式为人寻找适应其生理、生命特征的食物，而是把人同动物划等号，让人去食用同动物一样的有机物，那等于对人落井下石。

60年代的代食品运动还从反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启示，这就是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人们如果有粮食以外的食品供给，那不至于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的悲剧。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人们获得多种多样食物的新方式。人们把生产粮食的传统农业称为绿色农业，而在绿色农业之后，出现白色农业，就是以微生物工厂化生产蛋白质的形式，生产出新的食品。这种白色农业同当年青海省推广的小球藻是不能比的。这种现代意义上的白色农业，是以蛋白质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微生物工程为基础，以基因工程全面综合利用组建的工程农业。如果这类工程农业很快发展，传统的绿色农业出现减产和灾害，人们真正会有新的“代食品”来补救了。

引洮工程的反思

1958年全国的幻想工程很多，甘肃不甘落后，幻想的工程、惊人的卫星几乎县县都有。据考证，当时最时髦的理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甘肃的处女作。产生这种理论的省份焉能够在设计幻想工程上落在别人的后面呢？果不出所料，一项幻想银河落地的工程问世了。

这项工程叫“引洮上山水利工程”，简称引洮工程。亲历过这一工程的人，一听说“引洮工程”四字会不寒而慄。

甘肃是一个干旱缺水的省份，尤其甘肃中部的十多个县几乎年年闹旱灾。渴望水利建设这是甘肃人早有的愿望。国民党时期，有人就提出过引洮河水到华家岭，变旱地为水浇地的主张和方案。但因技术落后和经济基础薄弱的原因，始终没有进入实施阶段，不过纸上谈兵而已。1958年据说中国人可以藐视自然界的一切了，这是一个“让高山低头，使河水让道”的时代。在这种背景下，引洮工程的大戏上演了。

这一工程有人叫山上“银河”，有人叫山上“运河”，设计者，更确切说是“设想者”的胆量惊人。工程总干渠1400公里，称山上“运河”，支干渠14条，长2500公里，共计4000公里。这一长度的铁路也是少有的，从兰州到北京不过2000公里而已，兰州到上海不过2300公里而已。为了使这项水利工程象“银河”或“运河”，确定不是引洮河的一部分水，而是拦引当时流量为35亿立方米的全部水量。工程的水面宽要达40米，渠底宽16米，水深6米有余。水流量要达到1500立方米/秒。幻想者事先没有作详细考察，只是描述了这一工程的壮观，说它要辟山岭

2000多座，跨河谷沟涧800多处，填土方15亿立方米以上，还有上千座水闸桥梁等建筑物。更为理想的是在引洮工程的沿线要造天上日月，当时称为“葡萄串”或“满天星”式的无数水库。当然，1958年来说，上述这一切伟大的指标是不在话下的，有人说三年完成，有人说一年可以了，否则是“右倾保守”。

为了把甘肃人对这项幻想工程的幻想提得更高，就组织一些编造专家来写“民歌”，写得越神奇越为“优秀”作品。甘肃的省报和各地的报纸及广播电台，连篇累牍地宣传这项工程的幻想。当时没有电视，老百姓还不能直观吹牛者的形象，但电影片是拍了的。我这里从千百首对引洮工程幻想的“民歌”中摘录了一首，供我们重温幻想的历史。歌曰：

扛起镢头唱起歌，翻山越岭到洮河；
洮水引上董志塬，搭上船儿游银河；
万丈高山险又陡，千年岩石挡路口；
十万民工从此过，岩石低头水长流。

为了早日到“共产主义”，为了相信“群众运动”，这项工程从1958年6月就开工了。当然，对工程未作认真勘测，对完成这项工程的技术、资金和物质条件也未予以过多的核复。在这样的年头，不考虑这些物质、技术条件才是正常的，考虑了就会反常，领导者会掉乌纱帽，知识分子会成为“阶级敌人”。而当时有一点是充分考虑了的，就是如何搞人海战术，打一场“人民战争”。于是就把工程完成的基点放在组织民工上工地上。当时，采取强制性措施，从定西、平凉、天水三个所谓受益区（实则受害严重区）抽调大量农民，以县、社队组成兵营式的劳动单位，按团、连、排加以编组。农民的生产工具主要是镢头铁锨，当时架子车很少，算是先进工具了。水利工程的口粮是各地农民自带，有些是从全省各地平调来的。所有民工都吃大锅饭，睡大工棚或临时窑洞。工程的“战天斗地队伍”，有些月份达16万人，

至少也有 10 万人之众。

工地上充满着“阶级斗争”火焰和强制性劳动气氛。据活下来的民工回忆，当时的主要劳动是挖山、挖洞、砍树、填沟、拆房子、背土、砸石头，每天要求“日夜奋战”，工时有时长达 16 小时，往往通夜都要抢战。工地上的打人、体罚和斗争会是一浪高过一浪，累死也不能说一句“落后话”，说了就是反革命，不说死了叫“殉职”阵亡。1958 年那年因为有放开肚皮吃大锅饭的政策，民工可以吃饱肚子。到了 1959 年春就供应不了了，饥饿威胁着成千上万的民工，口粮一减再减，有的减到每日每人半斤以下，有时干脆停火。有时用野菜、树皮和各种非人食品“充饥”，有时连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工程上干瘦、浮肿、死亡的人数不断增加。到了 1960 年，民工为饥饿所迫和过度劳动折磨，大量逃亡。工地上除了高音喇叭还在发出“战天斗地”、“引银河上山”的喧嚣外，只有饥饿和恐惧，只有斗争和迫害。

灾难已经降临，引洮工程已经是此路不通了，但甘肃的领导仍不丢面子，要把这项创巨大“政绩”的工程决心搞下去。口号叫做“挣死牛不翻车”，我不知道挣死的“牛”是指什么，从实际情况看恐怕是甘肃的老百姓，不是那些自称“公仆”、“孺子牛”的“牛”。然而，不能说甘肃的领导不聪明，他们怕工程上人太多，粮食供应断线，一旦造成饥饿死亡人数增多，被上面知道真情，“政绩”就难创了。于是从 1960 年 7 月开始，进行三次民工精减，也就是把人海战术的场面缩小一些。引洮工程局曾这样报告精减人员情况：

全工程 6 月末共 100633 人，计定西专区 60473 人，平凉专区 16273 人，天水专区 23887 人，截止 6 月底，民工减后实留 30500 人，计定西专区减回 44373 人，留 16100 人；天水专区减回 16087 人，留 7800 人；平凉专区减回 9673 人，留 6600 人。

留下的 30500 人继续在死亡线上为省内的领导创“政绩”，

走掉的 70133 人，并未回到极乐世界，而是由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仅就回去的路途上充满着痛苦与折磨。当时送民工回家时，也未忘记人民公社的“军事化”，成立了精减办公室，制定了行军纪律，安排了行军时间，设立 9 个接待站，还有收容救护车。但实际上回乡民工有的命运很不济。按工程局压缩的数字看，民工病亡者是很多的。工程局的报告说，中途产生病号 500 人，造成行军困难，承认“在几次精减工作中，都发生了死人事故”。同一报告说三次精减死亡 21 人，2 人是途中被坏人打死，劫走了钱财，19 人是因暴食暴饮而死。又举例说定西有一民工，一次吃炒面 4 斤，生韭菜 1 斤，活活胀死。这位民工的 4 斤炒面从哪里来，质量如何，1 斤生韭菜是谁称的，这一切暂且不问，为什么对他的结论是“活活胀死”，而不定性为饿死呢？60 年代是抓言论罪的时代，“饿死人”的字眼是一个政治上忌讳的字眼，“社会主义不存在饿死人的现象”。从中国历史上看，饥饿的年代不少人在饥饿到极度时，肚里不知饥饱，不得不吃非人食品而胀死。形式上是胀死，实质上是饿死。且不要以为定西这位民工是非常富有的，也不要以为他有武松的大肚皮。让他不要在九泉之下背“胀死鬼”名声。留也惨，去也悲，当民工回到“农业第一线”时，第一线的人多数处于饥寒交迫状态，有的食堂供应几两粮，有的停火断炊，农民在自生自灭，不少回去的人食堂连稀糊糊都不给，有的仍未逃脱饿死的厄运，有的带着病残的身子回来，既不能劳动又不能自理，连家庭成员也感到多了一个包袱。没有人追踪引洮民工以后的命运，但命运不佳者比比皆是。

此工程到了 1961 年 6 月，由于劳力逃跑和难以补充，粮食特别缺乏，不得不完全停工。当然停工时已经撤换了左得要命的省委书记张仲良及其同伙，新任书记开始纠偏。那么，这项伟大的银河工程到底给甘肃人民带来了多少幸福呢？

可以简单地说，这项冒进工程对甘肃带来了巨大灾难，三年

时间耗费了数以百万计的劳动力，浪费了大量资财，破坏了沿线的生态环境，造成人民群众的痛苦和死亡。1962年甘肃省委《关于引洮工程下马给党中央、西北局的报告》中这样描述：

引洮工程于1958年6月开工，事前未经过认真地勘察测量和请示，就仓促“上马”，施工期间常年动员民工10万以上，最多时曾达到16万人。1960年6月以后，由于劳力、粮食发生困难，逐渐减少施工量，到1960年6月以后，留部分人员维护古城水库和清算退赔。开工三年多来，先后完成土石方1.6亿立方米，仅占第一期总干渠工程30%。共花了劳动力6000多万工日（不包括后方支援工日），使用国家投资约1.5亿元，耗费了大量的水泥、钢材和木材。在此期间死亡民工×××，伤残民工400人，已经完成的工程，至今一无效益，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给全省人民带来了很大损失，给党在群众中造成了极不良的影响，教训极为深刻。

改组后的省委发出的这份报告比过去省委关于引洮的各种报告、指示诚实多了，基本上符合这项劳民伤财工程的实际情况。但有些情况仍是禁区，例如工程上的死亡人数用某某某（×××）位数来标，据当时通行的保密制度，老百姓死了多少是不能用真实数字来表达的，据说，让人知道死了多少人就是对社会主义抹黑了。而这里关于死亡人数用×××表示，并未对社会主义抹多少“红”。×××是三位数，但区间的绝对数差别很大，最少可能是100人，最多可能是999人。这三位数是指工伤致死，还不包括饿死者，如果把饿死者计算在内那不会是×××了，也许是××××了。不管怎么说，当时的省委能如此明确否定这项冒进工程，不能不说是甘肃人民的又一项救命措施。

引洮工程的“圆寂”离我们有38年了，但它在甘肃的冒进史上是名声大作的，它在甘肃人民心中是臭名昭著的。人们把它同古罗马奴隶修建罗马水道、斗兽场，中国封建社会修万里长城

视为相似的劳民伤财工程。不过古代的这些工程还算修成了，为后人留下了名胜古迹，而我们的引洮工程则失败了，留下的是人们的白骨和怨恨。不过我国有一些“学费”论者，对此工程的灾难是百般掩饰的，他们认为这样的工程造成这样的损失，是为社会主义事业交了“学费”，应当说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是一个指头。尤其自西部大开发以来，引洮工程的实施又提到议事日程，有人就更为1958年的那类引洮工程辩解了，意思是当初这项工程虽然失败了，但动机是好的，如果修成了，是功在千秋的事。这类辩解太缺乏常识了，无条件而凭理想拉出的劳民伤财工程，同有条件讲科学而准备实施的建设工程，怎么能同日而语呢？不能从名词的相似而类比工程的意义。即令是今后已经真正建成了一个引洮工程，我们也不能为1958年的那个令人痛心的引洮工程作辩解。1958年的引洮工程是脱离甘肃经济、技术的条件而凭主观愿望上马的工程。不要说这样巨大的工程当时根本无财力完成，就连主要的技术问题都一片茫然。省委的报告说这项工程“技术上对防治大滑坡和处理大孔性黄土渠道渗陷等主要问题，都未得到解决”，而今后我们所议论的引洮工程，则是在甘肃物质、技术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后列入议事日程的工程。前者是冒进工程，后者是能够有条件完成的开发工程。

引洮工程的失败给我们引出的教训是什么呢？我想以下几点应是不能忘的：

一是反科学必须碰壁。引洮工程从设想到停工，许多程序和作法是违反科学常识，藐视科学精神的。边施工、边勘测、边设计这是引洮工程的作法，把施工放在勘测和设计的前面或同时，这在工程项目中是绝无仅有的。这是把“实践出真知”用到滑稽可笑的地步，是主观蛮干的极端行为。引洮工程伊始就在大面积黄土层上挖渠挖洞，拦河堵坝，但对黄土层的渗漏，黄土梁的滑坡，以及架桥、凿洞中可能出现的技术问题一无所知，而且不愿

知道。这些作法是同科学常识，是同任何工程必须遵循的科学程序背道而驰的，最终不能不碰得头破血流。

二是“运动”群众必然遭殃。1958年兴办引洮工程的唯一条件是党和政府有能力搞群众运动。然而，这种群众运动没有对群众任何利益和愿望的尊重，没有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有效办法。而在组织群众过程中，充满着强制和奴役，实则视群众如草芥。组织民工是按上级命令摊派，只能服从，不能拒绝，即令妻离子散也不能有任何疑义。工地上的劳动是军营式，一声喇叭响，所有民工都得立即投入战斗，工时可以延长到最大限度，对劳动消极者可用打骂、斗争、减粮及其他五花八门的方式予以迫害。对强征来的民工想要就要，想不要象驱逐鸟雀一样赶回农村。农民的劳动力和命运是很不值钱的，领班的叫民工干什么就干什么，许多人的劳动白白损耗在无任何收益的挖山挖洞中。民工的伤亡可轻易用“已善后处理”几字而了结，对饥饿致死者用“非正常死亡”或管理不善“活活胀死”而予以搪塞。这样的群众运动实则运动群众，奴役群众，其结果必然是群众遭殃，人民的事业遭殃。

三是否定物质条件的存在必然失败。1958年的引洮工程不是建立在物质条件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胆量”、意志和“人定胜天”的比喻上。当时甘肃的经济实力、交通运输水平、施工水平、技术力量，都离搞引洮这样的大工程相距很远。可是，就是在这样“特穷特白”的省份，要造“人间银河”。这条银河的建造过程是一次违反经济规律的过程。把客观实际置之脑后，把取胜的希望放在“民众”、宣传鼓动、大轰大喻上，把取胜的方式放在拔白旗、插红旗、掀起阶级斗争风暴上。自然规律、经济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违背了就要受惩罚，这是“老天爷”的惩罚，是看不见的一只巨掌的惩罚。

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加强党对人民公社的领导的指示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四日)

目前全省人民公社运动，正在蓬勃开展，进入高潮，党必须积极加强领导。

一、在建立公社过程中，必须迅速地以公社为单位建立党的领导机构。人民公社是一乡一社，乡社合一，根据这个情况，应改原来的乡党委为社党委，实行社党委领导下的社委会负责制。社党委应设组织、宣传和办公室等部门，在各耕作区、生产队、工厂、学校建立总支、支部或小组，并建立共青团委员会和妇女工作委员会。

二、社党委必须积极领导建社工作。在建社过程中，领导干部和群众进行大辩论，辩深辩透，打好思想基础。公社建立后，积极领导群众，恰当地解决公社组织机构，耕作区的划分，生产队的调整和各种具体问题的管理，以行动战斗化的姿态，掀起新的生产高潮。

三、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群众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将进一步高涨，新的积极分子将会大量地涌现出来，必须把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做好建党、建团工作。同时，也应当批判资本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道路，注意揭发打击那些不愿接受改造、继续进行造谣破坏的地、富、反、坏分子的活动，必须看到，他们人数虽然很少，但是，危害性却很大，必须进行斗争，抓紧改造。

四、建立公社，应该将原有乡社干部集中调配，统一安排，只能加强，不能减弱原有脱产干部，除个别犯有严重错误应予以处理外，都要安排适当的工作，其工资待遇也暂不改变。公社管理机构，要执行中共中央决议，“在组织精干和干部不脱产的原则下，建立若干分工负责的部门”。这一条要在干部中进行教育，努力创造经验，待后作统一规定。

五、做好秋收、冬麦播种工作，正确地处理积累、分配问题，坚持生活集体化的主要措施（食堂、托儿所等），切实规划并进行准备明年生产，是当前巩固人民公社的四件大事。各地市州委、县（市）委，应该指导和帮助社党委执行中央指示，在群众中深入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基础上，做好这四件事。并注意随时总结经验，报告省委。

中共甘肃省委（58）791号

原件现藏甘肃档案馆 编号：1—办1—2—302

《甘肃日报》社论：欢呼全省 实现人民公社化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在伟大的国庆9周年前夕，我们甘肃广大农村胜利地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这是全省人民的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喜事。消息传来，万众欢腾。

自从党中央和毛主席倡导举办人民公社以来，在我们甘肃，同全国各地一样，广大群众欢欣鼓舞，兴高采烈，纷纷要求建立人民公社。由于省委的积极领导，各级党委的迅速行动，在短短两个月期间，一个小社并大社、建立人民公社的群众运动就猛烈发展起来，声势之大，进展之快，前所未有。到9月27日，全省农村已经建立773个规模不等的人民公社，入社的达到194万多户，包括13700多个农业社。平均每社有2500户左右。敦煌、榆中都是一县一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甘南自治州的牧区已经实现人民公社化，广大牧民从封建压迫剥削下彻底解放出来，一跃而进入了社会主义。

全省农村人民公社化这样迅速地实现，绝不是偶然的。这是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跃进和广大农民政治觉悟日益提高的必然结果。应当看到，农业生产合作社比之小农经济有着极大的优越性，而且对于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去冬以来农业的大跃进，几十户、几百户的单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了。在大跃进中，许多地方打破了县、乡、社的界限，打破了山、川的地区界限，不计较个

人和本单位的得失，进行共产主义大协作；同时，全民炼钢铁和多种经济的发展，农村大办学校和文化福利事业的发展，不少的县已经实际超出了一乡一社的范围。这种情况说明生产的大跃进，迫切要求调整原有的生产关系，迫切要求更高级的组织形式，也就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同时，经过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以及农村中两条道路的大辩论，粉碎了右派分子和地、富、反、坏的进攻，战胜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在甘肃的主要表现形态——“甘肃落后论”，根本改变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在今年大跃进中，农民群众不但看到了农业生产的高速度增长，而且看到了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幸福前途。这一切，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空前提高了，使群众更加迫切地要求迅速建成社会主义，并且为将来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党指到哪里，干部就干到哪里。党的一切号召，立即化为群众的实际行动。群众政治觉悟的空前提高，正是迅速实现人民公社化的思想基础。

广大群众对欢迎人民公社的热烈情绪，远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许多地方都是彻夜不眠，突击生产。敲锣打鼓，庆祝公社成立。庆阳县李家堡一位70多岁的老汉李维汉听到办公社后，一晚上担了30担粪，他说：“听到要办公社，我老人心里发热呀！”敦煌县的群众这样歌颂着人民公社：

迈步走进桂花园，一枝更比一枝鲜；
人人都说农业社好，谁知公社更非凡。
上天梯子立得牢，一步更比一步高。
生产思想齐跃进，共产主义早来到。

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决不是农业社所能比拟的。在人民公社里，更便于统一领导和全面规划，更便于有计划地使用人力、物力和财力，更好地促进生产建设的全面大跃进。由于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和工农商学兵密切结合，也就有利于缩小工人和农

民、城市和乡村以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特别是由于彻底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实现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人们的精神面貌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将大大发扬起来。因此，人民公社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最好基层组织形式，而且也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组织形式。人民公社化的实现，标志着我们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在通向共产主义的大路上，向前跨了一步。

人民公社的建立，对于广大群众和干部实际上是一次深刻的思想革命。一切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都受到了又一次严肃的批判；对于地、富、反、坏、右的破坏活动则给予了严厉的打击。人民公社成了衡量人们思想觉悟的试金石。从各地情况来看，贫农、下中农坚决拥护，兴高彩烈，积极行动；而富裕中农除部分人表现积极外，多数是观望徘徊，看风势，随大流；一部分还有抵触情绪。在广大干部中，也是绝大多数表现积极、热情，他们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积极站在运动前面，领导群众前进。但也有少数人不够积极，个别的还顾虑重重，担心自己的收音机、自行车会归公。当然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性变化中，这种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只要绝大多数群众和干部都充分发动起来，这就是我们的胜利。目前应当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拔掉白旗、灰旗，巩固贫农、下中农的领导优势，并且将生产中和办社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吸收到重要岗位上来。

人民公社的建立，大大解放了妇女劳动力。现在，全省农村已经普遍建立了公共食堂和托儿所，实现了家务劳动社会化。几千年来，压在妇女肩上的烦琐的家务劳动重担，终于解除了，这就大大充实了我们的劳动大军。同时，儿童进托儿所，对于培养和教育下一代的集体主义精神，也将发生巨大的作用。老人进幸福院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只有党领导的新社会里，老人才能得到幸福的晚年生活。

人民公社的建立，大大地提高了群众的生产热情，促进了生产的更大跃进。榆中县在实现公社化后，立即响应县委的号召，调集了2.7万人大搞钢铁生产。永昌县宁远乡原来因任务繁多，劳力没法调配，建起公社之后，即将全部劳力划分为抢收撞田、打碾夏田、保秋、炼钢铁、深翻地、积肥和支援兄弟社等7路大军，分头并进，十几天当中，就抢收撞田4000多亩，积肥7万多车，炼铁5000多斤，收废铁3万多斤，深翻地3000多亩，并且普遍施了基肥，登场的小麦全部打碾完毕。事实证明，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首先应该表现在生产上。搞好了生产，人民公社就能更加巩固起来。

人民公社化的实现，是我们甘肃1959年更大跃进的最有力的保证，我们应充分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大踏步地前进。这里，还应该看到：由于运动来得猛，进展快，思想准备不足，缺乏经验，目前还有不少工作需要迅速赶上去。譬如，有些公社在建立过程中，思想辩论还不够深透，全面规划也搞得还不够细致；有些社还是刚刚搭起架子，具体问题还没有处理。因此，各级党委必须进一步加强对人民公社的领导，深入下去，具体解决问题，保证把人民公社办好。从当前情况来看，主要应该抓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搞好全面规划，合理安排调配劳动力，紧紧抓住当前生产中的主要环节，如钢铁、秋收、冬麦播种、深翻地、积肥等；特别是秋田一定要保证丰收，防止霜冻风灾，避免可能遭受的损失。第二，继续开展思想大辩论，主要把建立人民公社的意义和好处辩深辩透，发扬共产主义思想，继续批判各种错误思想。第三，依据省委的指示结合实际情况合理地处理各种具体问题。第四，加强经营管理，根据公社的特点，建立各种制度，无论是生产或生活方面，都要作周密的研究，妥善的安排。

办好人民公社的关键就是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贯彻群众路线。目前农村中的工作任务是繁重的，但是，抓住了办

好人民公社这个中心，就会带动其他方面，推动全面大跃进。我们相信，随着人民公社化的实现，广大农村一定会很快掀起一个新的生产高潮，为 1959 年更大的跃进创造极其有利的条件。

原载《甘肃日报》1958 年 5 月 29 日

省委关于徽县工作问题的报告

(1958年4月23日)

省委四月十三日检查了徽县的工作，发现了不少严重问题：

(一) 粮食工作问题。根据我们在银杏、石柱两乡几个村子的了解，农村确有一部分人缺粮，个别村缺粮户占百分之五十。石柱乡滩子社许多人因缺粮而吃树皮、草根。

(二) 浮肿病问题。从去年十二月以来，浮肿病蔓延，根据县委四月八日统计，全县患浮肿病者一千六百二十一人，死亡者七百四十四人，问题比较严重的有石柱、江洛等八个乡。滩子社五十八户，二百六十八人，已死四十三人，占人口百分之十五以上，病情发生后，省卫生厅曾组织医疗组前往防治，但因医疗组主要成员的观点不对，方法错误，虽搞了三个月，没有制止疾病蔓延。肿病我省其他地区也有，什么原因，尚在调查，但根据初步分析与粮食供应不够或很不及时有影响，在个别地方还是主要原因。

(三) 生产问题。凡是肿病严重，死人较多的地区，群众情绪不安，麦田无人锄，秋田无人种，生产近于停顿，病情不严重的地区，生产也受到很大影响。

(四) 地、富、反、坏分子乘机制造“无头命案”进行破坏活动，江洛乡发现“打倒共产党，打倒毛主席”，“蒋介石万岁，国民党万岁”等反动标语。县委、县人委门前亦相继发现两个被弃的赤身婴儿（一直无人认领，真象尚未查清）。在这一时期还发生抢案七起。省医疗组刘凤岗（兰州医学院教授，中右分子）

亦制造种种论据，说：肿病是“营养不良”“劳动过度”，用以攻击粮食政策和生产运动。

省委认为徽县的情况是严重的，各方面斗争的焦点是粮食问题。粮食工作方面确实有问题，但不是缺粮问题，不是购粮过多，销量不足的问题，而是工作问题。徽县去年是丰收年，粮食留量在三百斤以上，一九五八年计划在农村供应五百万斤，四月上旬只销了七十万斤，还有四百三十万斤，即使以全县人口百分之五十缺粮计算，也可供应两个半月，因此指标是宽裕的。就以目前问题最严重的滩子社来看，也是不应该发生问题的，该社一九五七年计划产量三十一万斤，帐面决算十八万零八百四十五斤（实产绝不至此），除去公粮、购粮、种籽、饲料共五万一千零七十斤外，群众口粮八万九千九百六十一斤，大小每人平均留粮三百三十八斤，这个标准是不低的，同时，当我们检查时，这个社还存有二千多斤粮食。但是群众饿肚子，是什么原因呢？很明显，是工作问题，干部问题。首先是乡社干部不纯，把粮食压住不给群众供应，循私舞弊，贪脏枉法，据我们查帐结果，有六千斤粮食没有下落，有两万斤粮食支出需进一步查对，总支书记、会计都不干净，社主任闹粮，但群众在他家里就查出粮食七百斤。其次在工作上有很多错误，如秋粮不分配，供应不及时，不合理（如余缺界限不清，平均供应量少），供应指标不安排到户，甚至不让群众知道。特别是县委领导上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对群众切身利益漠不关心，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斗争不力，粮食工作中的问题和群众死亡现象早有发现，省委也有过多次指示，但未引起警惕，抓紧解决。滩子社就在大路边，离县委只有几里路，情况非常严重，一直到省委检查时，还不了解，错误是严重的。为了扭转徽县情况，省委意见：

（一）目前粮食工作是关系全局的问题，必须做好，县委委员应分片包干，动员一切力量，星夜工作，迅速改变情况，对于

有吃代食品的、浮肿病多、死亡多、还有外流情况的地区，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检查，具体指导，切实扭转局势。

(二) 粮食问题严重的地区，首先解决吃粮问题，情况一时搞不清的，可少发一部分，“先安后辩”，同时公布全县指标，发动群众开展大辩论，出大字报；算粮食帐，评定余缺户，把是非辩清，余缺摸清，好坏辩明，敌我划清。好干部给予鼓励支持，揭发出的贪脏枉法分子要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要依法惩办，通过这些工作整顿组织，改进工作，清除坏分子，克服官僚主义，从而把坏事变成好事。

(三) 结合上述工作，抓紧防治浮肿病，省、专、县医务人员应在县委统一领导下，分片包干，深入群众，确实查明病因，抢救病人，制止死亡，结合治病逐步开展除四害、讲卫生运动。

(四) 在做好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发动群众讨论生产，播种秋田，管理好麦田。

(五) 为了加强徽县工作，省委除派干部帮助外，并责成监察厅副厅长胡成奎同志仍回徽县工作（胡系一九五七年下放徽县任第一书记，最近才调回省）。徽县目前工作上的困难是很大的，但有利因素还是很多的，只要相信群众多数，公开承认错误，虚心听取群众批评，切实改变领导作风，工作是完全可以搞好的。

(六) 徽县的问题对全省都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徽县过去的领导曾被右派所把持，在县级科部长以上领导骨干中就揭发出八个右派分子（还有六个未最后定案），四个县长中两个就是右派，在右派分子的阻扰下，一九五六年购粮只完成了百分之四十三，公粮只完成了百分之九十四。反右派斗争后，工作开始转变，去年公购粮都超额完成了任务。但是反右派斗争只大体解决了区、县领导骨干中的问题，乡社整风没有搞深搞透，部分落后乡社还是“富裕中农当家，地富掌权”，许多工作到了这一层就卡住了，但县委领导忽视了这一情况，骄傲了，只满足于反右派斗争

的胜利和完成粮食任务，这两件事对其它许多严重问题都看不见，不想了，以致发生多大的严重问题，也不重视，这就是徽县领导上犯错误的主要原因，因此，望各级党的组织很好的吸取这一教训，把整风搞好，彻底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认真的整顿基层组织，为了进一步做好当前的粮食工作，应立即用三、五天时间结合生产进行一次粮食大辩论的补课工作。是工作中的缺点要坚决改正，是干部问题要认真处理，是群众思想问题要耐心教育，有地富反坏分子的破坏活动就要严厉打击。总之，实事求是，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既要保证群众的粮食供应，又要严格防止浪费粮食或违犯规定大量的“倾销”。

如有不妥之处，请中央指示。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引自省档案馆 91—4—719 《省委关于粮食问题的指示、情况报告、通报、重要通知及文件汇编》卷

省委关于粮食问题向中央的报告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五日)

经过认真检查，我省粮食问题确实很严重。全省除兰州市外，共四十五个县、市中，完全没有问题的十九个县、市；部分地区有问题的十九个县、市；严重缺粮的有七个县市，即武威、民勤、通渭、陇西、岷县、静宁等县和张掖市。严重缺粮地区的人口共有一百五十四万。这些地区，一般的吃不到半斤粮，全省浮肿病九万六千多人，据初步统计因缺粮和浮肿病致死的有二千二百多人，非正常流入邻省的人口约有六万多人，本省境内各县互流的还有一万多人。有些地方生产陷于停顿状态。

发生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省委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去年全省大跃进、粮食大增产是事实，但我们估产偏高，对少数县跃进不大，了解不够。加之，“共产风”吹了几个月，吹乱了许多东西，财政等制度破坏，生产关系三要素都发生失调，基层干部、群众思想混乱，“一平二调三收款”造成了很多恶果。收获打碾都很粗糙，隐瞒、私分、贪污、经济手续不清、混水摸鱼大量发生。食堂管理不善，放开肚皮吃饭，损失浪费了很多粮食。部分地区征购畸轻畸重，对灾情照顾不够，有些地方购了过头粮，统销工作没有做好，粮食又没有管好。所有这一切，都是造成粮食紧张的原因。问题本来今年一月就露头了，但是由于对上述情况分析研究不够，没有引起重视。从四月份开始，我们一直在抓整社，通过全民算帐改善关系，解决了很大问题，也解决了一些粮食问题，但是，由于有些地方缺粮问题并未解决，特别

是有些地方帐算的不好，关系没有改善，闹粮之风并未停止，有些还在扩大。总之，我们对于部分地区确实存在的实际缺粮问题解决的迟了，恶果很大，教训很多，错误严重，我们正在做进一步深刻检查。

六月底，我们检查了全省粮食工作状况，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扭转这种局面。从七月起，农村缺粮人口一律按每人每天十二两供应，重点工矿地区的供应量也略加提高。现在已给定西、张掖专区的严重缺粮区紧急调运粮食二千三百万斤，于七月一日到六日，陆续运到供应地区。这些地区，正在按照新的指标突击安排粮食供应工作。此外，我们已派专人，到陕西等省去组织外流人口回乡生产。全省粮食供应状况，经和各地、市、州委具体计算，城镇人口七、八两月的供应量，加上农村缺粮人口，从七月份起到接上新粮的供应量，共需粮食三亿三千三百多万斤。截止六月底，我省实有库存三亿二千万斤，其中有些偏僻地区的粮食是很难调运出来的，能够就地供应和调出供应的约有两亿多，不足之数，天水、平凉地区的麦子已经收了，加紧组织征购和调运，大体是可以解决的。

我省粮食总产量，经过再三研究，去年数字可能有一百二十亿斤（原定一百八十五亿斤）。今年粮食计划总产量，也暂定为二百二十亿斤（原定为二百七十亿斤）。由于今年粮食供应安排得不好和其他原因，有些地方夏秋作物生长情况不如去年，今年粮食产量要赶上年，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一定鼓足干劲，努力工作，力争粮食总产量能够赶上去年或者略有超过。根据今年粮食计划产量，并参照去年经验，征购粮总数拟定为二十四亿斤（比省上原定三十亿斤减少六亿斤，比中央下达任务二十六亿斤减少两亿斤，比去年实际完成数二十一亿二千万斤增加两亿八千万斤）。这些数字，现在正和各地、市、州委同志具体研究，尚未最后确定。因为征购计划比中央下达任务减少两亿斤，一九

五九年度上调中央的六亿斤粮食也要求有所减少，我们意见按照一九五八年度数字上调四亿二千万斤，请求中央批准。

以上报告，请中央批评、指示。

省委关于粮食工作给主席和中央的报告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一日二时)

自从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反右倾、鼓干劲，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精神以来，我省各项工作都飞速发展，变化很大，粮食问题上也是如此。

全省夏田普遍丰收，绝大部分地区已经收割完毕。夏粮总产量初步估算约为五十四亿二千万斤。比去年夏粮核实产量四十八亿三千万斤增加百分之十二。秋田生长很好，丰收在望。反右倾以来，干部、群众心情极为舒畅，生产情绪普遍高涨，劳动效率大大提高，群众运动热火朝天，真是一片新气象。

夏粮征购进展迅速，截止九月八日，已经完成七亿五千余万斤，占计划的百分之六十四。其中公粮已经超额完成，购粮完成百分之三十五点八。征购入库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一倍以上。现在各地正在抓紧这个大好时机，乘胜夹击，一鼓作气，争取于九月底全部完成夏粮征购任务。根据夏田丰收、秋田生长良好以及当前征购情况看，全年征购二十四亿斤的计划，是可以完成的。

现在城乡供应已经本着“瞻前顾后，以丰补歉，细水长流，计划用粮”的精神作了安排。城市每人每月平均按三十三斤供应，农村一般每人全年平均留原粮四百斤上下，最低不少于三百六十五斤，经济作物地区保证每人全年口粮四百二十斤。当前供应情况良好。全省粮食销售量从五月以来逐月下降，八月份销售一亿零三百多万斤，比四月份二亿八千多万斤下降百分之六十

四，比去年同期销量下降百分之二点一。农村销量下降幅度较大，比去年同期下降百分之二十一，城市由于人口增加，比去年同期供应量增长百分之四。

总的看，我省粮食生产、征购、供应情况都是好的，前途是光明的，今年部分地区在粮食问题上存在的困难，早在六月底七月初已经解决。并不象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七、八月间所叫喊的那样严重，前途也绝不是那样悲观。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我省粮食获得特大丰收，最后核实产量为一百二十亿斤，比一九五七年的八十五亿斤增产百分之四十。但是，去年秋田收割粗糙。冬天多吃了一些。粮食的分配、管理方面有些缺点。又加上刮了一阵“共产风”，引起普遍的深藏密窖。到今年二三月间，有些地方就叫喊缺粮，要求供应。“肥猪瘦猪都哼哼”。真相一时搞不清楚。有些地方就盲目供应，以致四月份全省供应数字增至二亿八千多万斤。到五月底，农村供应面不断扩大，全省城乡日销量竟高达九百七十万斤。照这样供应下去，全省库存粮食只能吃到七月二十日左右。那时大部分地区夏粮还接不上。在这种严重形势下，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吃尽库存，全省大乱大散；一条是向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把粮食底子和当前所遇到的困难说清楚，号召大家勒紧裤带，渡过难关。毫无疑问，应该走第二条道路，在这紧要关头，省委根据仲良同志的建议，转发了张掖地委提出压缩农村粮食供应和降低城镇、工矿区供应量办法的报告，决定在全省范围内推行张掖的办法，从六月份起，农村平均按百分之二十的人口计算，每人每月供应原粮三十斤，城市和工矿区每人每月供应成品粮三十斤。这个紧急措施，得到了全省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切支持，各级领导都亲自抓起粮食工作，向群众说明情况，号召大家团结一致，渡过难关。同时全民算帐工作在各地大力开展，干部层层下楼，党群关系迅速改善，广大群众为党分忧解

愁，共同挑起了这个担子，克服困难，紧张局势很快扭转。但是在武威、民勤、通渭、陇西、岷县、静宁、张掖等七个县市的部分地区，由于全民算帐运动搞得不好，农村粮食供应工作又安排得不够及时、不够具体，所以在五、六月间曾发生逃荒、浮肿病和死人现象。省委发现这种情况后，于六月底七月初又给问题较严重的几个县发粮二千一百多万斤，并突击运送，几天之内一次安排到户，解决了这些地区的缺粮问题，至此，全省粮食问题就已经解决，人心安定，生产情绪高涨。今年我省在粮食工作上的确出了一些问题，现在检查起来，是我们对粮食工作管得不好，具体问题抓得不紧。三四月间，对农村粮食供应控制不严，供应量过多。六月份压缩供应量时，对少数真正缺粮的重点地区情况了解不够，没有及时照顾，以致发生了一些问题。这是应该引为教训的。

我省粮食问题上的情况就是如此。但是，这些情况为什么未能向中央如实反映，是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霍维德同志抓住粮食问题攻击省委。庐山会议期间，霍维德同志在家主持工作，他以省委名义，于七月十五日发出的“关于粮食问题向中央的报告”和以省人委名义于七月二十三日向国务院“关于甘肃省春荒情况的报告”，有意夸大逃荒、浮肿病和死人数字。……

中共甘肃省委批转《张掖地委关于检查 纠正“平调”现象、浮夸现象和强迫命令 作风的情况报告》

(一九六〇年三月八日)

各地市委、自治州委，各县（市）委：

现将张掖地委《关于检查“平调”现象、浮夸现象和强迫命令作风的情况报告》转发各地，张掖地委认真进行检查的作法很好，从报告中所反映的材料看，新的三风在某些社队是相当普遍和严重的。这说明郑州、上海会议精神在这些地区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一平二调三收款”的教训没有被他们所记取，这种新的三风，如果不及早制止，人民公社进一步地巩固，1960年的继续大跃进，都将要遭受严重影响，因此，请各地务必按照省委2月9日关于检查和纠正某些“平调”现象、浮夸现象和强迫命令作风的指示，认真进行检查，将发现的问题切实研究解决，并将检查结果报告省委。

原件为发电稿 现藏甘肃省档案馆

编号：1—办1—2—703

中共张掖地委关于检查纠正 “平调”现象、浮夸现象和强迫命令作风的 情况报告

(一九六〇年二月二十四日)

省委并发各市县委、直属党委：

2月11日，地委在武威、张掖分片召开的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上，对某些“平调”现象、浮夸现象和强迫命令作风，认真的作了讨论检查，县委书记会议后，各市县委在召开的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又作了检查。大家一致认为：目前整风、整社取得了伟大胜利，正在掀起新的更大的生产高潮。在这胜利前进中，省委指示检查纠正工作中的一些不健康的侧面，是非常适时正确的。

从各地初步检查反映的材料来看，经过贯彻八届八中全会、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的决议精神和开展全民算帐运动以来，各级领导作风和广大干部的民主作风，都有很大改进，浮夸作风大大减少，各地都注意“一平二调三收款”偏向的再次发生，某些新的“平调”现象发生后，大体上都是随时纠正，没有让偏向蔓延下去。因此，党群关系更加密切，群众的生产情绪大大提高，绝大多数的基层干部都是勤勤恳恳，积极工作的。目前农村形势极为良好，整社运动进展是健康的，取得了两条道路斗争的决定性胜利，彻底粉碎了富裕中农代言人和“冒尖”人物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资本主义思想已被搞臭，农村中社会主义阵地更为巩固，粮食安排比往年更加扎实，干部群众干劲足，热气大，

春耕生产已经形成高潮，十分有利于今年继续大跃进。

但是，在某些地方，某些方面，新的“平调”现象、浮夸现象和强迫命令作风确实露出了苗头，个别地方还表现得非常严重。

关于“平调”方面，有以下几种形式：

(1) “平调”劳力和牲畜：有的公社无偿调回劳力，用于公社基本建设。民勤双茨科公社以顶交公共积累或社经营的办法调各队骆驼 240 峰，羊 309 只。张掖乌江公社从生产队抽调车 40 辆，骡马 52 头，并带车辆所需劳力，组织公社专业运输队。

(2) 粮食问题上采取余粮队支援缺粮队，进行余缺“平调”。酒泉临水公社党委召集了大队书记、队长会议，要余粮队支援缺粮队，议定等价交换，会后二大队给八大队调了 1 万斤，四大队给九大队 1 万斤（均未付现款）。永丰公社六大队有 5 万斤余粮，公社给社办工厂数次调去 4000 斤，周围的大队，哪里闹粮就往哪里调，结果这个大队也出现了闹粮的苗头；民勤县羊路公社以折价付款方式从各队给社办工厂调粮食 2 万斤；不少队将社员自留地和庄前屋后增产的 50 斤粮食顶了社员口粮，有的付了价，有的未付价，甚至有个别地方直接“平调”，张掖市乌江公社五星生产队干部在社员家中进行搜查，将高兰秀家中自留地生产的 120 斤粮食，800 斤菜，就拿走粮食 90 多斤，菜 600 多斤。

(3) 社队调社员个人的奶牛、猪、羊、鸡，集中社、队举办奶牛场、猪场、牧场、鸡场。张掖二十里堡公社上秦大队以顶公积金为名，将各生产队的奶牛 12 头，集中办了奶牛场，调各队大小猪 12 只，办了猪场，饲草饲料仍由生产队负担；敦煌县调各大队 1 万只羊，拟办两个牧场（羊还未集中）；天祝金强公社华尖大队收了社员的鸡 999 只，办了鸡场，占该队社员自养鸡的 72%。酒泉市永丰公社以多积肥、不啃树、节约劳动力为借口，将 10 个大队自留羊 951 只集中公养，群众议论说：“早知道要公

养，倒不如杀着吃了”，“分了又集中，养羊吃了亏”。引起宰杀，据统计已宰杀 170 只。

关于浮夸现象，大体有以下三种：

(1) 工作缺乏具体检查，统计数字有粗估冒计。永昌各公社在省六千会议期间统计肥料时，有不少生产队粗估冒计上报，各公社又未具体检查，向县委汇报共积肥 900 亿斤，检查结果只有 300 亿斤；

(2) 为了争先进，以少报多。安西桥湾公社四道沟生产队，总支委员魏占奎为了表现自己领导的队先进，给公社汇报开荒 800 亩，实际未开一亩荒；民勤三雷公社张马生产队，整社开始，工作组向县委汇报出售棉花 6000 多斤，实际只出售 90 多斤；山丹四坝农场向县委汇报说：创造平田整地机，可提高工效 40 倍，大大推动了整地工作，经检查只做一件，未加推广，使坏了也无人管。酒泉鼎新公社国光大队工作组干部和大队书记到公社汇报时，怕数字小挨批评，便在路上给每户社员捏造了瞒产私分粮食 120 斤，共 7480 斤；

(3) 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武威永昌公社沈郁生产队在粮食问题上，由于支部书记秦魁是个坏分子，曾在 1 月 3 日公社党委召开的大搞副食品和代饲料、开展节约用粮运动的现场会上介绍了他们复打、抖麦秆等收回各种粮食 1903 斤，收回洋芋 9167 斤，寻找根、茎、叶、皮、籽等 14 种代食品、代饲料 29955 斤，制作成品 5455 斤，晒干菜 55540 斤，腌菜 252700 斤，平均每人储备冬菜 122 斤的经验，并由公社批转各总支、支部并报县委。1 月 16 日公社党委给县委的分配情况报告中说：该队运动中揭发并核实瞒产私分粮食 463195 斤，总产达到 1583633 斤，除公粮、籽种、饲料、口粮还有 871127 斤，每人平均 344 斤分配到户，广大社员，意气奋发，斗志昂扬。后经县委检查，事实并非如此，瞒产私分粮食 463195 斤，实际落实的只有 341381 斤，社

员口粮 236074 斤，每人平均只分到 113 斤，储备冬菜实际只是 45140 斤，每人平均 17 斤，代食品也只有 17300 斤，劳动出勤率在 2 月 14 日统计只有 20% 多，外流从 1 月 1 日至 2 月 14 日达 49 人，致使问题由小到大，由少到多，越来越严重。

关于强迫命令作风，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分配任务和自报公议搞瞒产私分。高台县平川公社四坝生产队在核实产量中，互相评议，报瞒产私分，达不到 533 斤的定产，不分配，社员舍应芬假报他一户瞒产私分粮食 1.5 万斤。

(2) 乱斗乱罚。酒泉西峰公社香庄大队，在核实产量时，工作组干部陈鸿景召集了 32 人的会，其中积极分子 12 人，会议连续进行了两天两夜，共斗了 18 人，其中小队长 10 人。他们斗的方法是，交待问题的坐在房子里，不谈问题的拉到院子里，抹掉帽子，脱掉棉衣，结果无一人交待问题，在院子里排下了 17 人，并把这些交给红专队，五更天上地，人拉大车，每车跟一名积极分子看守，吃过早饭又集合起来进行斗争。小队长于家康有病向支部书记请假，休息片刻，被陈拉下坑打了几个耳光，并将该小队长叫到庄外，手枪对准于的胸口威胁说：“你不交待问题，就让你死到这搭”，该小队长吓倒在地。

(3) 搜查粮食。山丹林阴农场生产股长朱贤庆（已撤职）带领群众以查卫生为名，向第一机耕站的 184 户社员逐户翻箱倒柜，搜查粮食，查出粮食 4000 多斤，制造了粮食上的人为紧张，群众说：“家已查过，绝无存粮”。武威古城公社上堡生产队，支部书记兰青，核实产量中违法乱纪，带领干部到社员家中搜查粮食，2 月 8 日把全队党团员组织起来分几路挨门逐户搜查，到社员家里到处翻腾，给房子门、米面箱柜上共贴封条 687 张，地上、院内挖坑 417 个，并让社员自报，还打了 20 多个人，全队 368 户，2160 人，搜出粮食 58000 斤，代食品 3700 多斤，麸皮 2500 多斤。由于这种违法乱纪的作法，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

社员贾海5口人，全家外流。贫农徐生元报了7斗粮食，拿不出来上吊自杀。社员吴宝奎抹了脖（未死），（兰青已交群众斗争，决定依法惩处）。

（4）捆打群众。山丹牧场三分场、七分场，先后捆、绑、打骂三堡、民乐镇、花寨三个公社拾田群众43人。三分场代场长公开在职工中说：“拾田群众挡不住，就拿棒打。”助长了职工蛮横粗暴行为，先后在元月21日、2月1日工人王秀义（坏分子已法办）、顾文枯、沈友等骑马横跨，持棒乱打，捆绑群众3人，破坏了党群关系。

上述问题虽然是个别现象，大部分地区刚刚露出苗头，有的随发现，随作了纠正，个别地区问题已很严重，给党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了很大损失，通过检查，县、社领导思想上明确了认识，并进一步检查思想，分析原因，防止再次发生。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

（1）从思想上检查，大多数干部是好心肠，为了把工作搞好，但是，他们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不够，领会不深，有的同志搞农村工作还是第一次，工作生疏，在作法上背离了党的政策；但有少部分同志，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决议指示不认真，不严肃，随心所欲，致使党的政策不能正确贯彻。

（2）工作不深、不透、不细，布置、听汇报多，具体检查少，下面有问题不反映，领导上不能及时掌握情况，问题不能及时发现，在某些方面，对已露出的苗头，发现的问题，分析原因研究不够，没有下决心彻底解决，工作上包办代替，不去作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群众工作，而采取了简单粗暴的办法，结果越搞越被动，脱离了群众。

（3）有的同志没有很好接受“刮共产风”的教训，又重复了“平调”的错误，还有的人甚至怀疑去年3月份党中央郑州会议精神的正确性。由此也说明，贯彻党中央、毛主席在郑州会议、

上海会议的指示，不是一两次会议就能使所有的干部深刻理解的，而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检查，经过几次反复，才能贯彻实现。

(4) 少数不纯分子，乘机乱搞，有意破坏党的政策，造成了不良影响。

为了彻底纠正和防止上述问题，采取的措施是：

(一) 认真贯彻省委关于检查和纠正某些“平调”现象、浮夸现象和强迫命令作风的指示，对我区在某些方面存在的“三风”进行深入检查和彻底纠正，并教育全党同志和干部认真学习人民公社十八个问题和郑州会议有关方针政策，结合学习对各方面的政策，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并在干部中开展必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全体干部认识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严肃性，认识到“三风”对革命事业的危害，如果不彻底检查纠正是十分危险的，必须彻底检查和纠正。

(二) 对已检查发现的问题，必须彻底纠正，认真处理。

(1) 对于公社因办猪场、羊场、创办工厂或帮助穷队已经平调了的，给群众说明原因，承认不对，可以从支援人民公社的投资中按市价付款退还。

(2) 平调了的粮食，由粮食调入单位，按统购价格付款。

(3) 社抽用了的劳力付给合理报酬。

(4) 对于社员自留地，凡未退给自留地的单位，都应按照高级社时留给社员自留地标准，及早分给社员，发动社员种植早菜和早熟作物，安排生活，并发动社员利用庄前屋后，开展一个百斤洋芋百斤瓜运动。

(5) 对已发生错误的干部，应分清性质，属认识问题、工作方法问题者，应加强教育，使其认识错误，主动向群众检讨，有严重损失或坏分子蓄意破坏者，应严肃分别处理。

(三) 彻底改变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今后工作中必须深入实际，具体指导，研究分析，检查落实。为使检查纠正彻底，整

社验收组，把此项工作列为检查内容之一，检查政策执行情况，群众的生活安排是否扎实，收益分配的各项扣留比例是否适当，分配、积累是否实在，领导工作是否深入等，召开干部会、群众会宣传政策，访问座谈，发现一点苗头立即纠正。

（四）在检查纠正过程中，对于地富反坏造谣破坏活动和有意制造假象的主谋分子，应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予以打击和批判斗争。

不妥之处，请省委指示。

张仲良同志在西北局 书记处会议上的检讨（节录）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五日）

这次西北局会议，检查甘肃工作，确实是救了甘肃 1400 万人民，挽救了省委，也挽救了我个人。同志们对我个人错误的耐心帮助，分析批判，对我帮助很大，我是感激的心情。在中央检查组各同志讲各地情况过程中，我是越听越寒心，越想越痛心。从这些材料中，我检查了自己在农业上错误，确实造成了罪过，在党领导下 10 年的成绩，去今两年给了很大的破坏。农民遭到很大损失，伤了元气，大量死人，妻离子散，绝了后代。过去也听到过一些这方面的材料，但不是象现在的心情去了解的。现在我确实很痛心。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基础动摇了，就影响到其他一切方面。铁的事实已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因为我的思想作风恶劣，确实带坏了许多干部，对工作损失之大，难于用数字计算。说老实话的受到打击，浮夸成风，说假话成风，封锁成风，是非不清，界限不明，党内思想混乱，干部队伍很乱，很烂。对这些问题今年上海会议后，已经开始察觉到了，但没有想到根子在自己身上，认为是下边干部的问题。在这次省委常委检查时，才开始意识到政策贯彻不下去，是省委和自己的责任。三干会着重讨论贯彻政策的问题，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对我的思想作风的检查，是这次常委会议才开始的，我这样大的错误的根子究竟是什么？我同意同志们对我的错误根子的分析，是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并且已经走到了危险的边缘。

1943年冬，延安党校整风时，对我检查了3天，主要是个人主义。自那次检查之后，个人主义思想压缩了一下以后是时高时低。过去还有时看看个人检讨，这10年来就忘记了。到甘肃后，自己的思想是不愿落于人后，不服人，急于求成，对光山秃岭就见景生急。建设事业发展了一下，有了些成绩，就好大喜功，个人主义随之发展，眼也就被蒙蔽了，也不多考虑客观实际了。1943年的检查，只是对个人压缩了一下，没有克服掉，因此，几年来个人主义思想一直是时隐时现，时高时低。对到甘肃工作，开始不愿意来，感到情况复杂，有困难，怕犯大错误，以后又把这些都忘记了。现在看来是旧病复发。1958年至1959年我的个人主义发展最为突出，为什么？（1）因为1958年是个大发展，在经济上成绩比较大，认为农业过了关，没有问题了，有200亿、224亿斤粮食（1959年春订180亿斤），因此大炼钢铁后就未管农业。胜利冲昏了头脑，个人主义随着浮夸而发展了。这是经济原因。（2）政治原因是二次党代表大会反右派斗争胜利。1957年五六月以后，当时处境有困难，事情很难办，一反掉右派就取掉了阻力，在当时党内两条道路斗争的对立面就没有了。×××为了投机捧我的场，于是就骄傲了，个人主义就大发展了。个人主义发展的规律是：在困难的时候就收缩，顺利的时候就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工作中的许多严重问题，当然就不能去正视。没有把成绩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自己背上成绩的包袱，因为多顾了自己的荣誉，便很少考虑群众的生活。听到有人说甘肃干劲大，粮食产量高，就很高兴，一听有人说发生死人，自己不虚心，听不进去。我认定1959年粮食产量一定要超过1958年。不增产就是右倾，所以就逼下面接受任务，不顾客观实际的可能性。

因为个人主义严重，对人从好恶出发，合乎口味的亲近，不合乎口味的就厌恶。……

现在看来，我对中央确实是不忠实的，请示报告很少，有些报告也未如实反映真实情况。对死人数字总是要分开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生怕暴露自己的弱点。对国务院派马永顺来检查工作，也是不满意的。

不愿意借陕西的粮，不愿意让天水、平凉的人到陕西赶麦场，觉得陕西不给甘肃顾面子。我对过去甘肃工作是不服的，有错误的看法，认为德生同志过于小心谨慎。

特权思想是封建剥削阶级的思想，我过去就有。

“左”的思想根子由来已久，1957年前，“左”的右的都有，但是“左”的多。下边干部“左”的思想受我影响很大。1957年林校学生闹事，捕了10个学生，中央批评了。从这个事件中未真正接受教训。

对中央二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的决议、指示贯彻得不好。对主席的六条指示只是印发下去了，但省委未很好地讨论。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也贯彻得不好。批判冒尖人物、镇反多捕人、多杀人等，凡是“左”的东西不是自己提出来的，就是同意别人意见的。

经过这次会议，要下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当前最紧急的任务是下水救人，舍己赎过，向地、县、社干部作检讨，公开承认错误，调动干部积极性。我总是个共产党员，我总是要革命的。党挽救了我，这样和风细雨地批判我，我还能不下决心改正错误！我犯了这样大的罪过，请求西北局和中央给我纪律处分。

甘发（60）265号

原件藏甘肃省档案馆 编号：1—办1—2—640

中共甘肃省委关于省委领导工作中 严重错误初步检查的报告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西北局并中央：(发各地市、州委、各直属党委)

西北局兰州会议以前，专门开了两天常委会，对于省委的领导作风，特别是对张仲良同志的领导思想作风，提出了好些意见。西北局书记处会议，给了我们很多指示和亲切的帮助。这几天来，各地传达和讨论西北局会议精神，又陆续有所揭发。因为当前情况是全党动员，大抓安排人民生活，来不及展开讨论。执行政策中间的问题，已向中央作过一次报告，也来不及作更进一步的检查。现在先就省委领导工作中执行中央方针政策和思想作风方面的严重错误，作初步的检查。

这几年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省委在中央的领导下，执行党的路线、政策，做了很多工作，有一定的成绩。但是，省委领导工作中，也产生了很多错误，这些错误一直是在不断发展，不断扩大，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正如西北局兰州会议所指示的，甘肃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应该由第一书记张仲良同志负主要的责任，张仲良同志的错误主要是“左”的错误，包括执行中央方针政策上的错误，违犯组织原则的错误和干部政策上的错误，各地传达和贯彻西北局会议精神以后，问题暴露得更多了。粮食产量愈核实愈少。口粮安排过低（6两以下）的面，有陆续扩大的趋势。很多地方，不断发生外流谋生、疾病甚至严重的死人现象。干部封锁成风，不说老实话成风、不关心群众疾苦成风，

饥、病不报、见死不救、达到难以容忍的地步。违法乱纪现象，不仅在张掖地区是极为严重的，在定西、天水地区，也是极为严重的。如果不是西北局、中央工作组及早检查，揭开了错误的盖子，再发展下去，是不堪设想的。这次西北局会议，真是挽救了甘肃党，挽救了甘肃人民。

我们工作中的严重错误，现在大家批评、揭发比较多，初步认识到的，是以下几个问题：

一、严重的浮夸。这几年来，省委工作中，发展了严重的浮夸。1958年的粮食产量，公布过222亿斤、200亿斤，最后定为185亿斤，去年秋季落到120亿斤，今年才落到110亿斤。1959年的粮食计划产量，最初提出过400亿斤，后来定为370亿斤，再后又修改为270亿斤。曾经设想过，全省到1962年，生产铁760万吨，钢630万吨，并要各地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引洮工程，提出民办公助，一面施工，一面设计，两年完成。要求从1960年起，两三年内，完成兰州十大建筑，已作了设计的5项工程，建筑面积共达16万平方公尺，已动工的中心广场，拆房子7000多间。这些想法和作法，充满着主观主义，违背了我们党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从实际情况出发。我们口头上常常讲，甘肃的特点是“更穷更白”。但只注意了它的有利方面，即群众思变心切，干劲更大；却完全丢开了它的不利方面，既然承认“更穷更白”，就更应该在建设中精打细算，节约民力；更应该抓紧近期收益，以逐步实现长远利益；更应该贯彻勤俭建国的精神，少搞非生产性的东西；更应该注意发扬艰苦朴素作风，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避免特殊化；更应该重视困难，认真克服各个具体困难。只有这样，经过大量的艰苦的工作，才能克服不利条件，发挥有利条件的作用，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我们的工作，却完全不是这样，一味夸海口，讲硬话，无视具体困难。结果，所谓把握特点，抓有利条件，都成了空洞的口号。这在全省干部中造成的影

响是很坏的。

二、群众观点很差。甘肃人民生活发生问题已经连续几年了。1958年春天，几个地方就发生过外流、肿病、死人等现象。1959年、1960年，发生问题的面愈来愈大，时间愈来愈提前，情况愈来愈严重。可是，省委特别是张仲良同志对这个重大问题一直重视不够，而且对问题的认识有严重的错误，即片面夸大群众闹粮事件中阶级斗争的因素，而忽视实际存在的粮食不足的困难。牵涉到的具体问题，有以下几个：（1）1958年徽县发生浮肿病，卫生厅派医务人员检查，结论是由于“营养不良，劳动过度”。省委则认为与粮食营养无关，批判上述观点是“攻击党的粮食政策和生产运动的”。（2）关于对人口盲目流动的看法，去年11月30日省委出版的“内部通讯”上，登了一篇文章，“金山公社为什么人口外流？”是这样说的：“在人口外流问题上，曾有过各种各样的叫嚷，说什么‘粮食问题’、‘干部作风问题’、‘社员生活安排不当问题’等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利用人口外流问题，恶毒地向党进攻，诽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武山金山公社深入调查的结果，又一次地揭穿了这个谜，原来是少数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和没有改恶从善的五类分子乘机破坏。”（3）对于人口死亡，在发生事故的地方，省委要求下边分开正常死亡与非正常死亡数字，这是很难分清楚的。去年7个县发生事故，报上来的非正常死亡数字是2200多人。这个数字是大大缩小了的，但还有人认为是夸大了。今年元月公安厅报告发生了11起吃人肉的“怪案”，不加重视，不作深入了解，即判断为反坏分子搞的鬼，要公安厅再查，就没见下文。（4）1957年天水地委发现干部搜粮，造成群众心里紧张现象，就发了个纠正这种现象的指示。报到省委后，省委批评地委的指示方向有错误，指出首先没有看到两条道路的斗争，只看到干部中的缺点，是错误的。以后，省委还一再批判了对反瞒产成绩表示怀疑的各种意

见，支持反瞒产是“方向正确”。正由于省委在这些问题上，是非不分，进行了错误的批判、错误的斗争，在全省广大干部中造成了思想混乱。关心群众生活，反映粮食困难，是很容易被戴上“右倾”帽子的。而无视人民疾苦，惯于吹牛浮夸，倒会赢得“方向正确”的头衔。群众观点大大减弱了，劳动人民的感情非常淡薄了。基层干部对外流、肿病、死亡三不报，是普遍现象，层层封锁，真实情况反映不上来。反瞒产、搜粮、挖粮、逼死人，打死人的现象不少，一直没有得到有力的纠正。这种情况，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使我们严重地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达到了危险的边沿。这是一种极为沉痛的教训。

三、反右斗争是有成绩的，但是，没有严肃地贯彻政策，产生了严重的错误。总的情况，是批判不准确，斗争过火，处分面宽，有些是完全批判错了，整了好人。从省到县、社，程度不同，都有问题。详细情形，现在还来不及作全面的检查。天水地区，已作过一番复查，情况是，原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党分子617人，定性准确的仅55人，原定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195人，定性准确的仅18人，原来宣布开除党籍的824人，处理正确的仅91人；原来给予留党察看处分的226人，处理正确的仅44人。另外，原定天水市委、秦安县委两个反革命集团，都系假案，已予平反，但还未作正式处理，天水地区可能是缺粮错误最严重的。但是，各级各地，包括省级机关和省委直接领导的批判、斗争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当然程度有所不同。这些缺点错误，已经在干部中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另外，省委在经常工作中，自我批评很少，对下面责备很多。不注意方式，很少个别谈话，耐心帮助。多是大、小会点名，甚至是群众会上点名。既伤感情，又乏实效。经常工作中对干部的批评、处分，也有不少不准确之处。对右的东西，批评得多，批评得严厉。对于“左”的东西，则批评很少，轻描淡写，甚至姑息、迁就。最近这次三

干会上，还说“刮‘共产风’的同志，是坚决革命的，是拥护三面红旗的”。这种错误，是和省委特别是张仲良同志领导思想上有“左”比右好的框框直接有关的。这些做法，在干部队伍中造成了很不正常的情况。多数人明哲保身，沉默寡言，表面积极，内心惴惴不安，耽心“不知道什么时候犯错误？”有些人，则以风为准，迎合上级领导的口味，不考虑人民群众的利益。有的人，则兴风作浪，抓辫子、扣帽子，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干部撤换、更动频繁。工作受到影响，坏人也钻了空子。这种情况，妨碍了我们团结全党干部，大家心情舒畅地、斗志昂扬地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这个问题，牵涉到各个方面，关系极大，必须进行彻底的深入的检查。

四、为什么产生上述严重错误，就是因为张仲良同志，骄傲自满，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破坏组织原则，实行政长式的领导。很多错误决定，都是在仲良同志直接主持下作出的，又是在他的一再坚持之下，使有些严重错误不断发展，不断扩大，而得不到及时的纠正。

由于张仲良同志思想作风上的严重错误，使得省委内部、常委内部、书记处内部，生活极不正常。不能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仲良同志，已经检讨了“存在有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私心很大，不公正”、“不能平等待人，对干部顶、碰、骂，有特权思想”，“不顾人民死活、主观蛮干”、“对中央不老实，隐恶扬善”、“偏听偏信”、“破坏了组织原则”等等。大家对于张仲良同志的初步检讨是热忱欢迎的。在讨论中，很多同志提出，仲良同志的“偏听偏信”、“个人专断”，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本来，每个人都有长处、有短处、有正确、有错误、有比较专门的知识，有独到的见解，这正是建立集体领导的基础。可是，仲良同志对同志的看法，是很不全面的。对于多数同志，常常过分夸大他们的缺点，忽视甚至抹煞他们的优点。对于少数自己喜爱

的同志，却又过分夸大他们的优点，忽视甚至抹煞他们的缺点。仲良同志，经常不注意倾听多数人的意见，而惯于依靠少数人为自己的错误方针寻找理论根据，为自己的错误判断寻找事实根据，依靠少数人去进行过火的斗争，依靠少数人去制订缺乏根据的计划、方案，甚至也喜爱听少数人对自己的无原则的颂扬。而省委大多数成员的处境是困难的。很少机会和仲良同志详细谈心，交换意见。在会议上，仲良同志的意见一提出来，差不多即成定论。正确的事情大家当然赞成。明明意识到有问题的事情，往往没有经过认真讨论，也不得不勉强地表示同意。讲说不同的意见，不是迎头顶、碰、就是拦腰插断，顶好的情况，不过是吞吞吐吐，转弯抹角地说一下，很难展开辩论。不表示态度，会遭受指责，少有差错，或者意见不合口味，即遭受批评。有时平常随便谈话，也会成为批评的材料。同志间的关系，是相互戒备，公事公办，会议以外，很少接触，表面团结一致，实际很不一致。仲良同志所造成的这种情况，真是自己封闭在一个孤陋寡闻的小圈子里了，带坏了一些同志，也害了自己，害了党，害了事业。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开始有所改变。还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坚决地、彻底地加以改变。建立和健全集体领导，是我们彻底纠正缺点错误，改变局面，继续胜利前进的决定关键。

我们的缺点错误，是从人民生活问题上、从农村工作问题上大暴露的。这个方面谈论得比较多，但还揭发得不深不透。至于工交、财贸、文教、科技、计划、政法、思想工作等等方面，基本上没有触及到，可以肯定问题都是很多的。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个向错误作斗争的任务，这是一个严肃的艰苦的战斗任务。遵照西北局的指示，在明春，要召开一个大的干部会议，彻底检查省委工作的缺点错误，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工作，教育全党。张仲良同志和我们大家，都有勇气、有决心、有信心在中央和西北局的领导下，坚决地改正自己的所有缺点错误，团结全省人民，

经过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作艰苦的努力，补偿党的事业所受的损失，保卫三面红旗在甘肃地区继续胜利前进。我们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关于各地传达和贯彻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的情况，当前正在传达和讨论西北局第十次、十一次书记处会议指示的情况，容后另报。

甘发〈60〉272号

原件现藏甘肃省档案馆 编号：1—办 1—2—640

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讨论 甘肃工作问题向中央的报告（节录）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九日）

西北局书记处会议……一致同意中央和主席关于国内工作的指示，特别是主席对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示，对到会同志启示教育极深，我们将在今后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会上大家对甘肃省委特别是张仲良同志的严重错误进行了总结发言。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甘肃省各项工作，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全党全体人民的艰苦努力，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当前人民生活严重困难，几百万群众处于饥寒交迫状态，肿病死亡现象还没有停止，农村生产受到严重破坏。这种局面，主要是近三年来，省委领导、特别是张仲良同志犯了严重错误的结果，甘肃省委的严重错误，张仲良同志负有主要责任。

会议对张仲良同志的错误，开展了严肃认真的批评和诚恳热情的帮助。发言的有张德生、王恩茂、汪锋、高峰、张达志、李景林，和甘肃省委书记王世泰、高键君、陈曾固、何承华、王秉祥、王耀华等同志。绝大多数同志都指出：张仲良同志个人主义极端严重，私心甚六，特权思想突出，“左”倾蛮干，对群众生活漠不关心，严重违反党的方针政策；作风恶劣，使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从个人好恶出发使用干部，违反党的干部政策；骄傲浮夸，隐恶扬善，对中央不忠诚、不老实。总之，一私，一“左”，是张仲良同志严重错误的主要

特征。

他不仅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中央、主席历次指示，切实纠正“共产风”；而且由于他突出的“左”倾蛮干作风，使本来已经相当严重的“共产风”更加发展。除了经验不够的原因外，他为了急于求成和显示自己，提出了一系列的过大过高不切合实际的建设计划。他根本不考虑许多同志关于粮食问题的意见和下边的实际情况，只要下边出了粮食问题，就往往说成是政治问题，就搞反瞒产，搞两条道路斗争。年年这样搞，就大大助长了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人为地加深了粮食和人民生活的困难。特别难以令人容忍的在农村发生了肿病死亡事件之后，他还漠不关心。由于这种恶劣思想的影响，一些人在群众大量饿病死亡的情况下，还坚持“即使每天吃3两粮食，也要完成征购任务”。后果极为严重。

他在干部政策上，重才轻德，常常从个人好恶出发使用干部。他信任的，有些是对他逢迎捧场投其所好的人。他认为好的干部，“干劲大”的干部，不少是吹牛皮、说假话的人。现在犯了严重错误和少数有罪行的人，不少是他原来认为很好的干部。而一些比较实事求是、说真话的人，不少被他认为是“右倾”、“保守”。

在过去几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去年庐山会议后的反右整风运动中，对于许多犯有党内性质错误的同志，不是耐心帮助教育，而是无情打击，斗争面过大，处分过多、过严。结果把一大批不应该批判的批判了，不应该伤害的伤害了。甘肃省属于中央管理的干部，参加整风运动的有246人，其中受到批判的107人，占43%。天水地区原来在反右整风运动中决定开除党籍的有824人，经重新审查有733人不应该开除，错了90%；劳动教养的378人中，除1人外，都搞错了。在过去拔白旗、反瞒产等错误的斗争中，也不同程度地发生了类似问题。特别是在反瞒产和两

条道路斗争中，成批斗争、撤换，以至逮捕基层干部，致使不少地方的基层干部，撤换了一茬又一茬，反坏分子乘机打击报复。党内斗争的错误，造成了不少假案和冤狱。比如把原秦安县委第一书记宇文荣等 14 人当作反革命集团，把原天水市委书记刘书银当作反革命分子，都已证明是错误的（已做了初步纠正）。相反地，对一些应该严肃处理的坏分子、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则反而未能及时处理，或处理得不够严肃。结果，是非不清，损害团结，严重地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

张仲良同志去年在庐山会议后，为了试探省委各负责同志是否支持他，就说他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写了十条假检讨，让省委常委讨论提意见。这种恶劣手法，起了极坏的作用。

在党的生活和领导工作中，张仲良同志有非常突出的特权思想。他对自己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从不认真检讨。对一起工作的同志，从不以平等态度对待，动辄训斥挖苦，拿大帽子压人。在省委领导核心中，不少同志因为受不了他的“顶碰”，不愿意向他汇报情况，交谈问题。有些省委书记和常委，在会上发言时，也得看他的情绪和脸色行事。他对省委主要领导成员有亲疏之分。……

张仲良同志同兄弟省、区的关系也搞得很不正常。他对别的地区的成绩不是高兴，而是非常“不服气”、嫉妒。本来甘肃和陕西毗连的一些地区的群众，历来就有到关中赶麦场的习惯，因为陕西省民政厅去年曾向国务院反映过甘肃人口外流到陕西的情况，而他却认为这是“告了他们的状”，伤了他的面子，便决定不许甘肃群众到陕西地区赶场。去年夏天，甘肃省缺粮，部分地区发生了严重疾病死人问题，省粮食厅向陕西提出借粮，陕西省已答应。后来甘肃省委知道了，竟认为向外省借粮“不光彩”，制止了借粮，还批评了粮食厅的负责干部。这种只顾个人荣誉、面子，不管群众死活的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是实在不能容

忍的。

在张仲良同志极端错误的思想作风的影响下，带坏了一大批干部。很多干部浮夸成风，说假话成风，封锁成风，“宁左勿右”成风，对群众死活漠不关心，严重脱离群众；干部队伍很滥、很乱，党内民主窒息，是非不清，思想混乱，党中央的政策不能贯彻执行，党群关系很坏，群众积极性受到很大的挫伤。

(二) 经过到会同志的热情帮助，张仲良同志作了第二次检讨，他表示欢迎大家的帮助，接受大家的批评。认为自己的错误十分严重，不是一般性的错误，而是罪过。他的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已经走到了危险的边缘。他的个人主义思想是一贯的，不服别人，好大喜功；有特权思想，在同志关系上态度恶劣。对于干部是从个人好恶出发。他承认对中央不老实、不忠诚，请示报告很少，有些报告没有真实地反映情况，怕暴露缺点，怕影响名誉。由于自己个人主义的发展，对群众死活就不可能那么关心。他自己检讨，“左”的情绪，由来已久，下边干部中“左”比右好的思想同他有关。他表示愿意在党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下，作进一步的检查，有决心下水救人，舍己赎过。并且愿意在适当时机，向干部公开检讨。同时，他请求中央给以应得的处分。他的第二次检讨比第一次有进步，看起来态度还好，到会同志欢迎张仲良同志初步检讨。这个问题虽然揭开了盖子，但要彻底解决问题，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省委有的同志反映，他的检讨不深不透，缺乏人民感情。

(三) 甘肃省委同志，一致认为，中央、主席的指示和西北局这次会议，挽救了甘肃省委，挽救了张仲良同志，挽救了大批干部，是扭转甘肃严重局面的关键。其他省、区的同志也认为这次会议，不仅教育了甘肃的同志，也教育了自己。应当把甘肃的教训作为全西北党的财富，作为一面镜子，经常鞭策自己。进一步改进思想作风，兢兢业业地做好工作。同时表示，甘肃的困难

也是各省、区共同的困难，一定要从各个方面尽力给以支援。

(四)会议认为，甘肃地区救灾工作时机紧迫，形势逼人，省委必须坚决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用下水救人的精神，首先把肿病死亡现象停止下来，切实安排好群众生活，迅速地扭转严重局面。决不要丢下救灾工作，关门检讨。因此，省委应当即刻在适当范围内讲清当前严重形势和省委的要求，动员全党团结一致，同心协力，战胜困难。至于全面、系统地检查工作、总结经验教训的事，需要推迟到明年情况许可的时候再进行。

为了加强领导，拟由中央工作组、西北局和甘肃省委的负责同志组成工作组，在省委统一领导下分片负责，切实安排好群众生活，深入生产小队和食堂进行工作。在工作中，要把安排好生活的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组织措施密切结合起来。采取各种有效办法，使广大群众了解我们党一定同他们站在一起克服困难，坚定群众生产自救渡过灾荒的信心。特别注意强调：一切工作都要按照党中央的政策办事，按照党的章程办事。不准反瞒产，不准反偷盗，严禁一切贪污浪费和违法乱纪的行为。除了对现在仍然干坏事、违法乱纪的，必须坚决处理，并向群众公开宣布外，对于犯有一般性错误的干部，都要鼓励他们积极工作，在同人民共患难中改正错误，即使错误严重需要处理的，也不急于作组织结论，可先行调开，集中学习；对于一些不称职、不能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干部，要适当调动。同时，表扬好人好事，鼓励一批人，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在处理这些问题时，要深入细致，方法适当，严格执行批准手续，防止产生混乱现象。至于过去处分错了或处分不适当的干部，暂时一般不动，其中问题十分明显的，特别是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应当按照规定，经过审查，予以纠正。这类问题只能一案一案的处理，不能搞运动。

在全国粮食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中央决定调给甘肃省5亿斤粮食，这不仅是使我们克服困难有了物质保证，更重要的是，将

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产生无穷的力量。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些粮食，用好这些粮食。目前灾区先按每人每天6两（16两秤）安排，明春再逐步增加一点。调派最优秀的干部，担任管理工作，办好食堂。继续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大搞代食品，防止依赖思想，不开空头支票。

在灾荒严重的地区，把向困难作斗争、向错误作斗争，同向敌人作斗争，在方法、步骤上加以区别，是很重要的。首先集中力量安排好生活，改进作风，把群众巩固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不怕反革命露头，也不要把一些有小偷小摸的群众当成坏人，或者给一些有怨言的群众乱戴帽子。同时，要加强必要的保卫戒备工作，安定社会秩序。

以上报告如有不当，请指示。

西北局附注：我们这个报告写好后，也送给张仲良同志看了。他表示，报告上所提到的西北局书记处会议上大家对他错误的批评，有些是他应该负有全部责任的，有些问题，如执行政策，干部问题等，他应负主要责任，但不能负全部责任。对于这个问题，经过我们召集有关同志和张仲良同志共同研究的结果，同意把这个问题留待将来省委全面检查工作时再加以解决。

汪锋同志注：

张仲良同志的保留意见，在1961年4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时声明取消。（1962. 11. 1）

原件现藏甘肃省档案馆 编号：1—办2—1—1334

中共甘肃省委转发《汪锋同志关于农村 食堂等问题向主席的报告》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

各地、市委、自治州委：

汪锋同志5月9日关于农村食堂等问题向主席的报告现发给你们。报告中提出的问题，都是当前农村中最紧要的问题，望根据这个报告的精神，切实走群众路线，真正按照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去办。

不论是农村食堂或是城市居民食堂，都应当坚决贯彻利于生产、利于生活和群众自愿的原则，绝不应当把食堂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强使群众非在食堂吃饭不可，凡是群众不愿意办下去的，经过群众讨论，做好散食堂以后的准备工作，解决好散食堂后的各项具体问题，散而不乱，食堂就可以散。粮食分配到户。过去因反对食堂而被批判斗争或被戴了帽子的，如果没有别的错误，应该给予平反。

甘发(61)0296号
原件现藏甘肃省档案馆
编号：1—办1—1—858
附件同此。

汪锋同志关于农村 食堂问题向主席的报告

(一九六一年五月九日)

主席：

4月27日，我带了5个同志来到临夏。28日听了自治州党委同志的汇报，并且选定新集公社新一号生产大队作为调查研究的重点。29日我回兰州参加西北局召开的澜涛同志传达你和小平同志指示的电话会议，于5月1日返回，其他同志则比我先两天到达这个大队开始工作。

新一号生产大队是一个二类队（新集公社是一个三类社），是才在中央工作组的帮助下整顿过的。这个大队是在临夏最早的一个高级社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这个大队的自然条件是很好的，今年的生产情况也不错。州、市机关的工作人员经常在这里进行试点。它的组织规模，于省的三级干部会议之后，很快即作了调整：原为570户，3327人，现为439户，2523人；原有土地4592亩，现有土地3738亩；原有13个生产队，划出去4个，又分出4个来，现仍为13个生产队。

按照我们原来的设想，这次调查本来是打算从摸清两个平均主义入手的。但是，当我们一接触到群众，经过向群众反复地宣读六十条，讲解党的政策，请他们发表意见的时候，立即发现这里群众最关心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别的，却是食堂问题。

我们重点地摸了两个食堂：一个是第九生产队的食堂，大队

的和上面来这个大队工作的干部都在这个食堂吃饭，大队对这个食堂有许多照顾，因而这个食堂办得比较好。社员在这个食堂吃饭的，共有40户，196人。除过一个50多岁的单身汉表示“家里吃也成哩，食堂里吃也成哩，我一个人随大家”的意见外，全体社员都主张打粮回家吃饭，停办食堂。这个单身汉的名字叫尚贤，贫农成份，在食堂散了以后的第二天，他专门找到我们的干部说，他讲这个意见的时候，思想上还有顾虑，不敢说不在食堂吃饭，而实际上他是最不愿意在食堂吃饭的。另一个是第六、第七生产队的食堂，这个食堂没有什么特殊的照顾，办得不好。在这个食堂吃饭的共有61户，313人。除只有一个人主张在食堂吃饭外，其余全部主张打粮回家吃饭，停办食堂。这位主张在食堂吃饭的人，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是食堂管理员马合买的老婆。

群众对食堂真是怕极了，恨透了。群众说：“交朋友交个管理员，吃馍喝汤不作难”；群众说：“炊事员的肚子，饲养员的热炕，队长、管理员没定量”；群众说：“勺把子上有刀子”；群众说：“食堂是饭厅（打饭的地方）、法庭（灶管人员不顾群众困难，甚至打人、骂人态度恶劣）和花厅（队长、管理员专找漂亮年轻的妇女作炊事员，就在食堂里乱搞）。”例如，六队队长马培继和食堂管理员拜景义，贪污多占，克扣社员口粮，利用社员口粮诱奸、强奸妇女13人之多；1960年在这个食堂吃饭的共死了39人。群众对这些事情愤恨最大。这两个食堂已成为破坏社会主义、阻碍生产发展和党群关系中的疙瘩了。

根据群众的要求，在社员学习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之后，又经过了4个白天和3个晚上的访问、座谈和讨论，我们帮助生产队的干部分别召开了生产队的社员代表大会，通过了停办食堂的决议。社员对这次社员大会的评价很高，人人兴高采烈，他们说：“开这样的会开个整夜也行。我们这才是真的贯彻六十条，开社员代表大会来解决我们自己的大事情呢！”大会

除了对于食堂停办以后的问题都一一根据社员意见作了决定以外，还在贫、下中农小组的基础上选出代表（一个食堂选了10人，一个食堂选了11人），负责具体办理。以第九生产队的食堂断例：该食堂有菜地6亩半，社员一致主张由原来的专人经管，将来按粮食定量标准比例分菜，或卖菜分钱。食堂养猪3口，社员一致主张由种菜的人兼管起来，由生产队供饲料，公猪育肥吃肉，母猪生仔卖仔。食堂有兔子3只，折价卖给社员。食堂有糖萝卜和干菜8000斤，提出1000斤作为生产队的贮备，提出600斤补助进城积肥运肥的社员，提出170斤补助生产队的5个干部和两个看守母根的人，所余全部随粮食定量标准比例分配给社员。食堂有柴草4万斤，除留足牲口饲料，完成军草征购任务和留下一部分贮备草外，全部分给社员。食堂的炊具，借来的归还原主，平调来的退给原主，购置的折价优先卖给缺炊具的社员。食堂有现金390.50元，连同上述的猪肉款、仔猪款、兔子折价款、炊具折价款等均交生产队作为生产基金。食堂租用的房屋，决定退还原主，在租用期间化了些补修费，决定同房主协商从租金中扣除一部分。由于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在社员选出的代表的帮助下，社员应分得的东西，很快就分到手里，井井有条，散而不乱，大家都愿意。

食堂解散，大快人心。群众说：“这下可把勺把拿到我们手里了，他们再也卡不住我们的脖子了”；群众说：“回家做饭，锅也热了，炕也热了，我们的心也热了”；群众说：“过去3年食堂，两年糊糊汤，现在回家吃饭，天天过年（吃得花样多）。停办食堂，在我们开始酝酿的时候，一些基层干部是有思想顾虑的，他们怕群众不会计划用粮，吃过定量，怕群众自己做饭耽误劳动时间，怕把柴草分到每家每户不够烧用……等等。当把这些顾虑提交群众讨论时，群众的意见恰恰相反。事实也证明，这些顾虑是完全不存在的。两个食堂都是从5月6日停火的，三四天

来，我们了解到以下的情况：一位 70 多岁的老太婆（何成海的外祖母）把面粉打回家以后，全部用小碗量了一遍，干部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说：“尢娃说打回来 56 天的粮，我分一下好知道每天吃多少。”在两个食堂吃饭的社员，群众提出只有 3 户可能计划不好，一致同意给这 3 户 10 天打一次，其余绝大多数社员都是会自己安排得很好的。这几天来，男女老幼的心情特别舒畅，有的说：“家里有粮，心就放下了”；有的说：“都是那些定量，在食堂里吃把人饿下了，在家里吃把人饱下了”。参加劳动的人越来越多。本来不参加劳动的老太婆、小孩子也抱娃、送饭、挖菜、拾柴了。人人挖拾野菜，过去社员挖野菜要交食堂，有的自己挖到一些，还被管理员搜查没收，但是，食堂却把野菜不是扔掉，就是烂掉。做也做得很难吃。看来在家里作饭才能贯彻低标准、瓜菜代。饭食不那么单调了。5 月 7 日中午，第九生产队 34 名锄草妇女家里送来的面食，就有疙瘩、穷穷、棋花、菜面、馍馍、饼子六种，比起过去食堂的饭菜是好得多也干净得多了（群众反映在食堂吃饭时常吃出羊粪蛋子老鼠屎）。对于停办食堂，社员群众开始顾虑更大，他们主要是怕戴“反对政策”、“反对社会主义”的帽子，怕食堂解散不了，过后遭受干部的报复……等等。当社员大会宣布了食堂停办，并且把粮食、蔬菜、柴草真的领回家以后，一切顾虑都解除了。六队食堂在召开社员大会宣布停办食堂的时候，群众跑到炊事员的家里，把他们偷去的面粉和做下的馍馍、油拌干面等，连盆带锅，全部端来。并且当场对管理员、炊事员进行了斗争，这在过去是不敢做的。干部反映：“这下子把我们背上的包袱卸下来了，以后可以集中精力好好搞生产了”。群众说：“工作组的干部好象诊脉的先生，真正找到了病根”。

我们还粗算了第九生产队的两笔账：一是劳力账，一是燃料账。这个食堂 196 人吃饭，有固定大师傅 3 人，固定烧火的 1

人，种菜的1人（本为两人，因他们约有一半时间搞其他生产，折为1人），磨面、喂猪、打柴的1人（作这些事的有3人，按他们的劳动天数折为1人），这些都是头等的劳力，此外还有经常在食堂洗菜、削萝卜、打零杂的两人，加上管理员，就有9个整壮劳动力，占全队整壮劳动力74人的12.16%；根据第九生产队的情况，1960年每个整壮劳动力平均所做工日为240个，全队实做工日为16406个，食堂所用的工日，占全队实做工日的13.16%。这个食堂，原来平均每天烧麦草202斤，社员打饭回家，重做一道和烧开水需麦草220斤（根据3户、25人的调查推算出来的），两项合计422斤。食堂停办以后，全队每天共烧草282斤（根据上述调查推算的），比食堂未停办前节省33.1%。

从上述的情况看来，这两个食堂是势在必散的。我们也想在这个大队找一个能够继续办下去的食堂，看来是找不到的。在甘肃，比上述两个食堂不如的，还很多很多。因此，对于食堂问题，应当坚决地贯彻利于生产、利于生活和群众自愿的原则，绝不当把食堂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强迫群众非在食堂吃饭不可。特别是在象甘肃这样的粮食斗争极其尖锐的灾区，目前办好食堂的困难更多，而食堂又往往是坏分子借以违法乱纪、压制群众的工具，看来只要真正按群众的意见办事，解决食堂是没有什么害处的。

除了食堂问题以外，我们还摸了粮食、夺权、退赔和农村支部等几个问题。现在也简单地向你报告一下：

（一）粮食问题。三定落实和口粮划出个最低的线是群众的普遍要求。群众说：“只要再不编屁谎（指一次又一次地增加征购任务），口粮订得低些，我们也有办法”。群众说：“只要心里有个底，做起庄稼来，劲头就大了”。

（二）夺权问题。这里的夺权问题很复杂。中央工作组在这里整社时撤掉的坏分子和选掉的有错误的干部，新集公社共有

208人（撤掉的161人，选掉的47人）。现在发现又复职的21人。其他地区也有这个问题，这是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对此我们已决定进行认真的查处。

（三）退赔问题。退赔得普遍不彻底，退赔的原物很少，退赔的价格很低。拆掉一间房子只赔25元（盖一间房子实需200多元），平调一付屋门只需两元，平调一个水缸只赔几角钱。从退赔的面来看是百分之百的退赔了，但是，从退赔的价格看，却又百分之百的没有赔够。这也是全省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我们将重新加以处理。

（四）农村支部问题。我们摸了一下新一号生产大队支部的情况。这个支部共有党员32人，27名是现任队干部，有两名是被选掉的，只有3名是不担任职务的党员；7个支委都是队干部，并且是支部书记指名选举的。这个支部的党员1959年以来就没有召开过支部会和小组会，说不上党员的权利和义务，还有的作风很坏，违法乱纪严重地脱离群众。对农村支部进行整顿，加强对农村党员的教育，健全农村党支部的生活，是我们当前一项迫切的任务。

（五）妇女病和生育情况。我们调查了新一号生产大队4个生产队的妇女病和妇女生育情况：第九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25人，闭经的12人，占48%；在通经的13人中，今年1月后才通经的8人；一贯通经的两人，1个是女队长，1个是炊事员；1959年以来只有脱产干部的家属生了1个小孩。第五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26人，闭经的21人，占81.2%；全队1959年以来没生一个小孩。第六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19人，闭经的13人，占68.4%；在通经的6人中，3个是炊事员，两个是女队长，一个是脱产干部的爱人；1959年以来生了两个小孩，1个是大队保管员的爱人生的，1个是生产队长爱人生的。第七生产队有青壮年妇女24人，闭经的16人，占66.6%；在通经的8人中，有4

人是今年1月后才通的；一贯通经的4人，1是炊事员，1是生产队长的爱人兼炊事员，1是脱产干部的爱人，1是生产小组长的爱人；1959年以来只有管理员的爱人生了1个小孩。从上述这个调查材料中，可以看出许多问题。

我们还就一些具体问题，召开了专门的座谈会，征求了许多社员的意见。并且作了记录。有些问题我们还正继续深摸，待后再给你报告。以上是否妥当，请予指示。

通渭县委关于通渭的 历史经验教训

(一九六五年七月五日)

地委并报省委：

(一)

通渭县位于甘肃的东南部，地处丘陵地带，是个纯农业山区。总面积 2880 多平方公里，地区辽阔，居住分散，地多人少，土地瘠薄，气候差别大，自然灾害多。年平均降雨量 350 毫米，蒸发量 140 至 160 毫米。现有总耕地面积 204 万亩，其中山地 189 万亩，占 93%。总人口 210352 人，劳动力 9.89 万多个，每人平均耕地 9.7 亩。牲畜 3.92 万多头，其中役畜 3.19 万多头，每头平均负担耕地 64 亩。主要出产为小麦、洋麦、莜麦、豌豆、扁豆、糜、谷、洋芋、胡麻等。

解放前由于剥削阶级高租重利的盘剥，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压榨，劳动人民常年过着食不充饥，衣不蔽体的悲惨生活。1949 年解放后，通渭和全国各地一样，翻开了历史上新的一页。全县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减租、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推翻了封建统治，紧接着走上了合作化道路。生产逐年发展，人民生活日渐改善，各项建设事业有了很大发展，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农业生产上，到 1957 年，粮食总产由 1949 的 11111 万斤增长为 16423 万斤，增长了 48%；亩产由 55 斤增长为 85 斤，增长了 55%，大牲畜由 54728 头增长为 70379 头，净增 28.5%；羊由 102835 只增长为 122183 只，净增 19%；猪由 12106

口增长为 63483 口，净增 4 倍多；兴修水利工程 3700 亩，植树造林 8.9 万亩，控制水土流失面积 220 平方公里。工业方面，建立了毛纺、印刷、被服、铁器等 17 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产值由 52068 元增长为 441458 元，增长了 7 倍多；乡乡都通了电话，邮路总长度增长了 60%，兴修了吉川、陇山、马陇等 5 条公路。财贸方面，建立了为人民生活服务的贸易、百货、花纱、服务等 4 个公司和供销合作社。由于生产的发展，人民群众收入的不断增加，购买力大大提高了，社会商品零售额由 110 多万元增长为 683.3 万多元，增长了 5 倍多。文教方面，除原有一所中学外，小学由 73 所增加为 297 所，中小学在校学生由 3309 人增加为 23869 人，增长了 6 倍多；还扩建了医院，建立了文化馆、剧团、电影队等。总之，通渭 7 年来的发展变化是突出的，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这些巨大的变化和成绩的获得，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胜利，是广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的结果。

(二)

1958 年全县人民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照耀下，实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各个战线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从 1958 年后期到 1960 年两年多的时间里，由于违背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毛主席的指示，在工作中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使已经取得的成就受到了严重破坏，给通渭人民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使党的政治威信受到了极为严重的损害。主要错误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农民问题上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全县从 1957 年到 1959 年，在大辩论、拔白旗、批判富裕中农冒尖人物中共错批判斗争农民 10360 多人。一个时期大平大调、大刮“共产风”，使农民受到了很大损失，从土地、劳力、畜力、农具、树木、房屋、家禽家畜，以至盆盆罐罐及其它财物，平调总值共达 990 多

万元。农民群众气愤地说：“这几年剥夺了农民的发言权、选举权”。“共产党变了，和以前不一样了”。“东西都被拿得一干二净，有啥心思搞生产，有啥信心活下去”！这样，就严重地破坏了生产，严重地破坏了工农联盟。

二、生产上瞎指挥，盲目蛮干，造成生产连年下降，粮食严重减产。从1956年起，瞎指挥就露头了，到1958年、1959年，发展到极为严重的程度。一方面是，不顾条件、地点，不经过试验，盲目地改革耕作制度，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使土地大量荒芜。全县耕地面积，1959年比1958年减少了20万亩。另一方面，不顾实际可能，要求提倡一切大办，齐头并进。在大搞工业、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中，不顾当年生产，大批抽调劳动力，1958年春，抽调劳动力17900多人大办工业，5月抽调1.8万多劳动力投入引洮工程；8月正当田黄在地，不顾收割，为迎接中央水土保持检查团的检查，以十多天的时间集中5万多劳动力，从刘家埂到华家岭公路沿线，摆了一条120华里的长蛇阵，扎彩门，飘红旗，大字报满山，锣鼓喧天，搞形式主义，突击进行培地埂、打坝等水土保持田间工程；10月又抽调2.5万多劳动力，大战华家岭、史家山。1959年又抽调5万多劳动力，兴修6个大、中型水库。这样接二连三地反复大量抽调劳动力，使农业第一线的劳动力由1957年的54%减少为35%。这一系列的瞎指挥、盲目蛮干，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造成了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1957年总产16423万斤；1958年总产11576万斤；1959年总产8386万斤；1960年总产只有3632.4万斤了（数字看来不实，但减产是肯定的）。

三、大计划、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上面逼、下面吹、弄虚作假，以致人口大量死亡和外流。1958年粮食计划亩产200斤，总产3.8亿斤，实际亩产61.5斤，总产11576万斤，而上报为2.6亿斤，征购4360万斤，实入库4154万斤，占总产量的

36%；1959年计划亩产140斤，总产2.4亿斤，实际亩产49斤，总产8386万斤，而上报为1.8亿斤，征购5400万斤，实入库3958万斤，占总产量的47.2%。由于产量逐年下降，征购任务逐年增加，实际上两年没有给群众分配什么东西，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坏，人口外流和饥饿死亡一年比一年严重。早在1957年征购粮入库中，有些地方粮食就已经很紧张，动员群众卖陈粮、吃陈粮，只分现金，不分粮食。1958年春季，碧玉、第三铺、义岗等地就发生了人口外流和死亡现象，到1959年情况就更严重了，当年冬季，全县162个大队中，有102个大队3个月没有给社员打过口粮，有些地方社员40天没吃到过粮食，以草根、衣草、剥树皮充饥。但是以席道隆同志为首的县委领导，一直不敢正视实际问题，哪里反映实际情况，缺粮、要求供应便扣上“在粮食问题上打小算盘，以粮食攻击县委，向县委闹粮，是富裕中农、怕死鬼”，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坏分子”、“放炸弹”、“动摇人心”等等政治帽子而顶了回去。把粮食问题一律看成是：“富裕中农和五类分子捣鬼，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敌我问题”，“剥树皮是冒尖人物的破坏，反革命分子有意把死人拉到路上”，“没粮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当前粮食赶不上去，主要是富裕中农和五类分子在一起捣鬼，要进行打击”。开全县电话会议，要求公社召开“万人斗争大会”，生产队召开“千人斗争大会”，以开展两条道路斗争和打击敌人名为名，大批地斗争要求供应粮食的群众和反映真实情况的基层干部。提出“对富裕中农要来个双倍打击、加倍赔偿，算清不劳动、破坏生产、不合法收入三笔帐，压在泰山底下，叫他几辈子翻不过身来”，结果不仅使中农受到打击，而且许多贫下中农被批判斗争。接着又组织“千人整社团”，在农村大搜大查，拷打群众，大挖粮食，挨逐户，翻箱倒柜，普遍搜查，斤两不留。一直到1960年，问题已经发展得十分严重了，县委领导同志和

地委工作组的一些同志，仍然不顾群众死活，只顾个人得失，搞假安排，写假报告。说什么：“闹粮凶的地方，查了一下，都有反革命集团”，碧玉公社赵河生产队已死亡 50 多人，生产处于停顿状态，他们却报告说：“社员情绪饱满，牲口体力壮，生产搞得较好”。给领导上建议：“思想要坚定，思想上要有粮食，要有最大的决心”。“装病、闹粮、剥树皮、要统销，不论要什么花招，玩弄什么手段，我们心中有底。顶住了这股歪风，丝毫没有被假象所迷惑，这是保证安排好生活的关键”。还将这些报告批发全县，实在害人不浅。

四、漠视人命，严重地违法乱纪。早在 1957 年农村大辩论中，部分地方对群众就有轰斗、推撞、毒打的非法行为，特别是 1959 年则发展到十分惊人的地步。全县在粮食入库、“万人斗争大会”、“举办劳教队”、“千人整社团”的过程中，普遍发生捆绑、吊打、扣押群众的严重违法乱纪行为。在粮食入库中，上面逼，下面就压，说什么“完不成任务，提头来见”。这样子就大大助长了基层干部的违法乱纪。有的公社领导干部提出“一个会场，十个战场”，“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完成粮食任务就是血的斗争”；“决心要大，刀子要快，哪里挡住，哪里开刀，向小队长要粮，向资本主义要粮，为全县争光，为公社争光”。有的公社开万人斗争大会时，由民兵携带机枪、步枪、马刀警戒助威。马营公社党委书记张学圣亲自主持斗争，毒打群众 160 多人，当场扣押劳教的 66 人。在大轰大斗中，对被轰斗的干部群众滥施刑法，有竹签戳指头、站冰块、雪里埋人、打夯、拔胡子、戴纸帽子游街等 120 多种，有的人被整残、整死。全县在大搜查中，搞出粮食 1100 多斤（大部分被“千人整社团”的人吃喝挥霍浪费了）。打死、逼死 1300 多人。群众对干部的违法乱纪，比作为“秦始皇”、“活阎王”、“黄世仁”、“活剥皮”、“狼狗”等等。这种违法乱纪行为，使党的政治威信、党群关系受到了极严重的损

害。也使敌人钻了空子，进行阶级报复。地富反坏分子逼死、打死人的案件不断发生。什川公社组织 200 多人进行搜粮，其中有四类分子和四类分子家属以及由于民主革命不彻底混在基本群众内部的阶级敌人 30 多人，占 15% 左右。义岗公社文化大队段家西坡生产队漏划富农分子段汝西打死、逼死社员各 1 人。囊南公社干部、右派分子袁玉乾（开除留用）打死逼死 3 人。碧玉公社赵河大队姚家嘴生产队坏分子姚世禄活活打死了 4 人。

五、在党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好干部动辄就批判、斗争、撤职、开除、法办，以此来作为推动工作的手段，在斗争中普遍推、撞、斗、打，进行人格侮辱，肉体摧残，使有些人神经失常。造成了相互戒备，人人自危的紧张状态。从 1958 年开始，共批判、斗争、处理脱产干部 541 人，其中错案占 71%；基层不脱产干部 2062 人，其中错案占 36.2%。仅在 1959 年有 1109 名干部，因反映了农村实际情况而被整掉了。原县长田步霄同志因县委基建和城市建设用钱上与张峰同志有争执，这本是工作上的正常现象，但在反右倾运动中，以“1956 年未选上县委委员对党不满”，“历史未作结论，对审干不满”，“大办工业钱卡得紧，不满大跃进”等罪名批判斗争，致使自杀。商业局干部张国珍因不同意县委提出将该局负责人 × × × 选为县党代会代表，就以反映了农村死人的情况是“丑化农村，不满领导”等批判斗争，下放劳动改造。但对于能迎合他们的一些人，不问政治情况如何，则受到提拔重用。因此，有许多部门和公社的领导权就落到了坏人手里。152 名公社主任以上领导骨干中，有敌伪党、团、军、警、宪骨干，特务、一贯道等 24 名，占 15.2%。30 名县委委员和侯补委员中，有各种政治历史问题的 8 名，占 22.6%，原财贸部长 × × ×，家庭是恶霸地主，本人曾因破坏我扩军运动，被判处徒刑 1 年，释放后混入我革命阵营，并包庇、窝藏他父亲、反革命分子 × × × 10 多年。商业局负责人 × × ×，

1947年当过伪保长，隐瞒了参加三青团，而他们竟以该局“是红旗单位”，“出席过全国群英会，给县委争了口气”，“听县委的话”为理由，要提选为县委委员，经商业局支部连选两次没有选上代表，则又指示组织部长在城关公社主持选为县党代表，就这样在1957年选为县委侯补委员了。计委副主任×××，历史上参加过三青团、国民党、复兴社、防共团，并怀疑参加过情报小组，其父曾杀过人，叔父系恶霸，均被我法办，但将×选成县委委员。农业局副局长×××是阶级异己分子，又一个副局长×××，是潜伏军统特务。义岗公社党委副书记×××，家庭是一贯道坛主，本人是站礼，有复道活动，而席道隆同志则称赞×××是“有政治头脑”、“肚子里有钢”的干部。席道隆同志还个人代替组织在陇川召开支部书记会议上一次宣布开除18名党员的党籍，撤销了公社书记和主任的职务。党内过火的斗争和重用纵容坏人，不仅干部队伍被打乱了，骨干被打掉了，组织被打散了，思想被打糊涂了，而且严重地破坏了党内斗争的原则、组织原则和民主生活的准则。

上述错误给通渭人民带来了一场大灾难，使通渭已经取得的成就，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和破坏。全县人口死亡60210人；死绝了2168户，1221人孩子失去亲人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土地荒芜36万多亩；牲畜死亡3.3万多头；羊被宰杀4万多只，猪、鸡、猫、狗等家禽畜几乎绝了种。拆毁房屋5万多间；砍伐树木27万多株；农业生产处于停顿状态，学校、工厂关门，干部、群众思想非常混乱，社会秩序动荡不安。

为什么会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呢？除了执行了张仲良、窦明海等同志的一套错误主张外，主要是当时的县委领导同志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只顾个人得失，不顾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按毛泽东思想、党的政策办事，在许多方面还发展了张仲良、窦明海等同志的错误。当然也有些错误是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发生

的。

(三)

1960年12月西北局兰州会议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它给通渭党的组织和人民重新带来了毛泽东思想和党中央的政策，纠正了错误，挽救了人民，使通渭的工作离开了错误的道路，重新回到了正确的道路上，它在通渭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是全县人民和子孙后代永远也不能忘记的。

西北局兰州会议后，我们在党中央、西北局和省委的正确领导下，认真地贯彻了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向困难、向错误、向敌人作斗争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首先，集中全力，抢救人命，安排生活。全县近20万人没有饭吃，处在饥饿死亡线上，疾病蔓延，当时中央、省、地委派了250多人的工作组，128人的医疗队，调来医药136吨（价值47万元），食糖、蜂蜜、红枣、花椒两万多斤，粮食3370多万斤，救济款330多万元，棉布110多万尺，棉花6万多斤。迅速安排了群众生活，医治了8万多病人，把群众从死亡线上抢救下来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党中央和毛主席对通渭人民的关怀，永远不能忘记各兄弟地区和单位对通渭人民的支援，永远不能忘记工作组干部赴汤蹈火，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的好作风。特别是医疗队王俊、刘春华（女）两同志辛勤工作，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是永远值得通渭人民纪念的。其次，恢复和发展发农业生产。由于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劳畜力严重不足，农具残缺不全，籽种缺乏，土地大片荒芜，在此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国家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进行了大力支援，先后发放各种贷款和补助款142万元，无偿投资270多万元，购买了牲畜4700多头，添置补修农具4万多件，这对组织生产是个很大的鼓舞和支持。我们始终教育干部和群众，长志气，鼓干劲，挺起腰干，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战胜困难。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深入生产第一线，和群众同甘苦、同

劳动，没有牲畜，就组织人挖地、人拉犁耕种，就这样一个一个地克服了困难，有力地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第三，开展了整风整社，进行了夺权斗争。对犯有各种错误的 363 名干部，分别进行了处理。免于处分的 171 人，给予各种纪律处分的 167 人，给予刑事处分的 25 人。从而纯洁了组织，制止了“五风”。第四，贯彻执行了“十二条”、“六十条”、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减轻农民负担等一系列政策，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第五，贯彻了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停办了基建项目 4 个，地方工业厂矿由原来的 7 个调整为两个，学校由 437 所调整为 104 所。精减职工 947 人，压缩吃商品粮人口 1200 人，加强了农业战线。第六，大抓了政治思想工作，向党内外干部进行了党章、政策、形势、阶级、群众观点、自力更生等方面的教育，大大提高了政治思想水平，改进了作风。第七，纠正了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状况，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活跃了党的民主生活，坚持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健全了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一切重大问题都由集体讨论决定。为了健全党内民主生活，还作了 25 条规定，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党的民主生活趋于正常了。第八，认真进行了甄别工作，对过去错批判处理的 2164 名干部，逐个作了甄别、安置和恢复了工作。对错批判的群众 10360 人，也作了甄别平反。改善了关系，加强了团结，大大调动了积极性。几年来，在向困难、向错误作斗争的同时，对阶级敌人的各种破坏活动，进行了有力的打击，破获重大政治案件两起，刑事案件 466 起，有力地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1962 年冬季以来，贯彻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突出地抓了阶级斗争。在农村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城市开展了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取得了显著成绩。

三年多来，正是由于高举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高举了

三面红旗，大力纠正了过去工作中的错误，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政策，大抓了阶级斗争，加强了调查，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生产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1963年粮食亩产85斤，达到1957年水平，1964年虽然遭受病、虫、雹、洪等灾害，粮食亩产仍达71斤，总产1.09亿斤。3年净增牲畜9970头，羊2.2万只，1964年每户平均达1口猪，并出现了亩产百斤的公社3个，生产大队25个，生产队290个。每人粮食达到千斤以上的生产大队7个，生产队27个。并且有相当一部分队有了储备粮。其它各方面的工作也获得了显著的成绩。目前，全县的形势很好。农业生产今年种得多，种得细，生长良好。工交、财贸战线都超额完成了上半年计划。城乡人民的生活安排是扎实的。物价稳定，市场活跃。社会秩序是安定的。一个群众性的比、学、赶、帮社会主义竞赛运动正在深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在不少地区已形成热潮。县委认为，虽然我县破坏严重，损失很大，底子薄，生产才恢复，人民生活穿的、用的、住的等方面还有不少困难，工作任务很艰巨。但是我们相信只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就会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发展，一定由胜利走向胜利。

(四)

我们从通渭过去的错误中应该吸取些什么教训呢？

一、必须老老实实地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党的政策办事。无数的事实证明，凡是按毛主席的思想、党的政策办事的时候，革命事业就无往而不胜，凡是离开了主席的思想、违背党的政策的时候，就会犯这样和那样的错误，给革命事业招致不应有的损失。通渭过去工作中之所以犯这样大的错误，就是离开了主席的思想、违背了党的政策的结果。西北局兰州会议后，我们纠正了不按照主席的思想办事、违背党的政策的错误，工作就获得了成绩。因此，我们必须教育干部，要老老实实地按照毛主席的思想

和党的政策办事。认真学习主席的著作，把主席的思想真正学到手，用主席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头脑，用主席的观点、立场、方法彻底改造自己，把毛泽东思想贯串到一切工作中去，力求避免不犯或少犯错误。要教育干部，一切行动都要以党的政策为准则，老老实实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绝不能在党的政策之外乱立规章、乱出主意，绝不能违背党的政策。

二、必须彻底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百病之根，万恶之源，它与我们共产党人的世界观是水火不相容的。通渭以席道隆同志为首的县委领导人，当1958年以前，工作中做出了些成绩，就沾沾自喜，他们不是把成绩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相反地记在个人的名下，骄傲自满。当1958年以后，工作中出了问题，发生了错误，就不顾党和人民的利益，顾个人面子，一味地保“红旗”，说假话，掩盖错误。当情况发展到了已经包不住的时候，一直考虑个人得失，又没有勇气起来揭发检查和纠正错误，仍然不顾人民的死活，大轰大斗，大搜大查，强迫交粮，漠视人命。事实证明，有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不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也就不能关心党和人民的利益。因此，我们要教育干部，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彻底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任何时候都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抛弃个人得失，要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工作中有了缺点和错误，要敢于正视和揭露，尽快地改正错误，如果考虑个人得失，不检查改正就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损失。

三、必须坚持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坚决反对主观主义。毛主席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

主观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通渭过去的工作恰恰和主席的教导相反，他们在领导工作中不实事求是，主观臆断，虽有调查研究，但都是先入为主。特别在指导农业生产上，不因地制宜，不顾自然条件，盲目改革耕作制度，不顾粮食生产，大调农业劳动力进行非农业劳动，延误了农时，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结果吃了大亏。因此，我们必须教育干部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就必须经常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强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坚决克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

四、必须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毛主席说：“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通渭过去的工作中，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真正的敌我矛盾又没有抓住，因此，打乱了阶级阵营，这个沉痛的教训，我们要牢牢的记住，永远不要忘记它。今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共同对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顺利进行。

五、必须严格的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通渭过去以席道隆同志为首的县委领导人，在党内实家长式领导，作风极不民主，个人随意决定重大问题。只喜欢听好的，听成绩，不喜欢别人批评和提出不同意见，谁要不同意他们的主张，就戴帽子、抓辫子、打棍子，进行过火的党内斗争，这样不仅堵塞了党内的正常言路，而且破坏了党的组织

原则，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因此，我们必须严格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严格执行党章，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开展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鼓励和支持党员与党的各级组织自下而上的批评，使他们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提出批评，对党的领导机关实行严格监督。在高度发扬民主的时候，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反对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自由、不要纪律的倾向。同时，还要反对和纠正不识大体、大顾大局的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倾向。要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健全党委制，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经过集体讨论决定，反对个人擅自决定重大问题。要经常检查党的政策执行情况，加强请示报告，反对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无组织无纪律的坏现象。

六、要正确地进行党内的斗争。党内斗争是社会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矛盾在党内的反映，是不可避免的。党内矛盾、原则分歧和不正确思想意识的存在，只有经过党内斗争，才能解决和克服。采取敷衍了事和回避态度是错误的。我们在党内斗争的时候，要反对过去过火的党内斗争。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严格贯彻党的“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待犯有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批评教育的方法，一看二帮，既要严肃，又要认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分清是非，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目的。

通渭的错误是严重的。给我们的教训十分深刻，我们必须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牢牢记住这一沉痛的教训，并且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教育子孙后代，永远不重犯类似性质的错误。

通渭的错误已经得到纠正。几年来，在恢复和发展生产建设上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我们必须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贯彻党的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奋发图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兢兢业业地做好各项工作，以争取通渭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新胜利。

张仲良同志关于平凉市洪岳、下甲积峪 两个农业社进行大鸣大放辩论 试点的情况报告

(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省委：

现将平凉洪岳、下甲积峪两个农业社进行大放大鸣大争的情况和初步认识简报于下：

这两个社都是川塬地区，产量高、收入多。去年分配的结果，两社增收户都达到 93%。洪岳社的政治思想情况较好，是一类社，下甲积峪社政治思想状况都很不好，我们把它列为三类社（县委原定为二类社）。这两类社的政治状况虽极不相同，但共同的地方是把富农和其他坏分子都放在合作社里了（监督生产在内），他们中有的就利用合法地位千方百计地进行各种破坏。首先集中在粮食问题上，说每人 450 斤留量不够吃（实际他们去年分得的粮食都在 500 斤以上），说什么：“人走三角步”、“女人闹离婚”、“家庭不团结”、“娃娃哭闹”、“姑娘不嫁农民”、“出勤率低”、“农活质量不高”、“人吃洋芋拉稀屎”等等。有的同志说这是“天下河流归大海”，敌人抓住粮食问题企图攻倒我们，我看这话是有道理的。其次是诬蔑“合作社不如劳改队”、“合作社是二次土改”，把社员分领粮食说成是“算盘一响，烂鞋提上，站到门上”。洪岳社地主分子吕世勋去年每人分得口粮 720 斤，还经常闹没粮吃，每见上级干部和参观的人来了就哭穷。下甲积

峪社的流氓分子赵宗州每人留量 483 斤（除去统购粮），也常嚷闹不够吃，今年 5 月间曾暗地和四人商定，企图开仓分粮，当乡支部书记路遇劝阻而被围打，直到县长到该村后才回来。这些阶级敌人经常去社内闹，逼得社干无法，给有些人又供应了粮食，但还是闹得不休。为什么他们竟敢这样猖狂呢？主要是领导干部认为这些都是人民内部矛盾，而忽视了阶级斗争。也有些人认为粮食的确不够吃，人家闹得对。因此，对赵宗州等行凶打人一案，一直拖到大放大鸣前还未处理（现正斗争法办）。专区检察院干部刘正杰（本人伪保长，家庭富裕中农），对此案调查数次都以粮食不够吃结论无罪。这样严重的右倾思想是普遍的。

在农民阶层中，上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也表现严重。据洪岳农业社的调查，上中农由合作化前的 66 户上升为 215 户，占总户数的 64%（全社 334 户），其中有 23 个（占本阶层的 24%）反对合作化，吵闹粮食，最突出的有 3 户，有些个人主义较严重的农民也跟上喊 450 斤的留粮不够吃。问题的性质并不是吃饱吃不饱的问题，而是要求多分小麦、要吃得更好。据对上中农吃粮调查，在解放前小麦仅占 40%，杂粮占 60%，去年小麦就占到 73%，杂粮仅占 27%。这样的增长速度他们还不满意，更说明了思想斗争的重要性。必须通过大辩论才能加以克服。再从购粮中看乡社干部的思想动态；平凉县共 5 个区，购粮任务共计 512 万斤，清福、白水两个区（都是川塬区、产量高）要购 400 万斤，清福区要购 147 万斤，该区最近召开了全区乡长、支书和 8 个社主任参加的会议，研究购粮问题，与会干部情绪很不好，越富的乡（共 5 个乡）对统购粮的抵触情绪就越太（两个山区乡一共只购 18 万斤），事实上都程度不同的隐瞒产量，但喊叫无余粮，只提出认购 4 万斤，这与 147 万斤相差多么悬殊，国家没有漫天讨价他们竟就地还钱。这就可以看出干部中的右倾思想，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严重性。粮食问题既然是这样的情况，不首

先解决思想问题要完成统购任务是困难的。但据王扶邦同志（县委书记）谈：有不少干部对大辩论不敢进行。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一）有不少干部家庭就是余粮户，所以下不了手；（二）有不少干部认为这个大辩论不是一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他们缺乏斗争锻炼，没有勇气，企图单从粮食着手解决粮食问题，这是对大辩论的意义认识不足，因而执行不力的表现。

因此，我认为在全省农村中必须努力开展大放大鸣大辩论，特别在产量高、粮食多、统购任务大的地区。在这些地区要敢于放手对农村问题开展大放大鸣大辩论，这样才能整好社、提高干部，完成统购任务。

根据洪岳、下甲积峪两社的初步经验，农村中的大辩论在经过大放大鸣阶段以后，可分三个步骤进行：

第一，以政治斗争为主，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其他坏分子的破坏活动。三类社必须先要这样作，下甲积峪社（193户），历史上就是一个富村，土改时中农就占22%，敌伪军政人员多，但土改、镇反都不彻底，这是三类社的病根子。该村当土改初原拟定16户地主，结果只定了两户，第一期镇反运动中根本未捉人，直到第二期镇反时才捉了4个人，其中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全村至1955年没有发展一个共产党员，在合作化后猛吸收了21个，现在还都是预备党员，现在只有5个比较好。虽然合作化了，去年增收户达到93%，除社主任尚好外，实际上被恶势力所统治，正派农民不敢说话，干部去该村连饭都吃不上。在这样的社，如不先发动群众打垮恶势力，就根本谈不上大辩论。

第二步，以思想斗争为主。洪岳农业社，生产政治情况都较好，敌对阶级分子虽有些破坏活动，但不严重。社干也较强，党团都有支部。他们是一面打击敌人，一面进行思想论战。

第三步，以改进工作为主。洪岳农业社在辩论中对社干的批

评意见归纳起来有六条，都是正确的，他们已研究改进，待辩论到一定程度时再对改进整个工作着重进行辩论。现在看来全部辩论过程需要 25 天多的时间。

敢不敢大放大鸣，斗争能不能取得胜利，从上述两个农业社的情况看是肯定的。他们的具体经验有以下几点：（一）说通社干，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二）边斗争、边训练，不断的集结壮大和提高战斗力量；（三）思想斗争必须要结合政治斗争，先要孤立敌人，打垮敌人，才能分清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两类不同性质；（四）调查摸底弄清我们依靠的阶级力量。洪岳农业社地主、富农共 18 户，占总户数的 5.6%，其中最反动的有 3 户；流氓、坏分子 9 户，占总户数 2.48%；上中农比例虽大，但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只有 23 户（新上中农 6 户，老上中农 17 户），占总户数的 6.61%，其中最坏的有 3 户。从这个社看来，在农村就有 86% 以上的户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不过这个社确有些特殊，上中农已达到总户数的 64.37%（215 户），下中农 24.25%（81 户）贫农只有 5.9%（20 户）。所以对上中农的团结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五）依靠群众就地取材，以群众的事教育群众，才能把问题说得清楚、透彻，才能争取与团结多数群众，得到斗争的完全胜利。他们在各队组织了调查研究小组作用大，收效好。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初步认识，供省委参考，特报。

摘自《甘肃省农业合作制重要文献汇编》第一辑
(1952—1962)

甘肃省农业合作史编写办

甘肃档案馆合编

甘肃出版社出版 1988 年 8 月版